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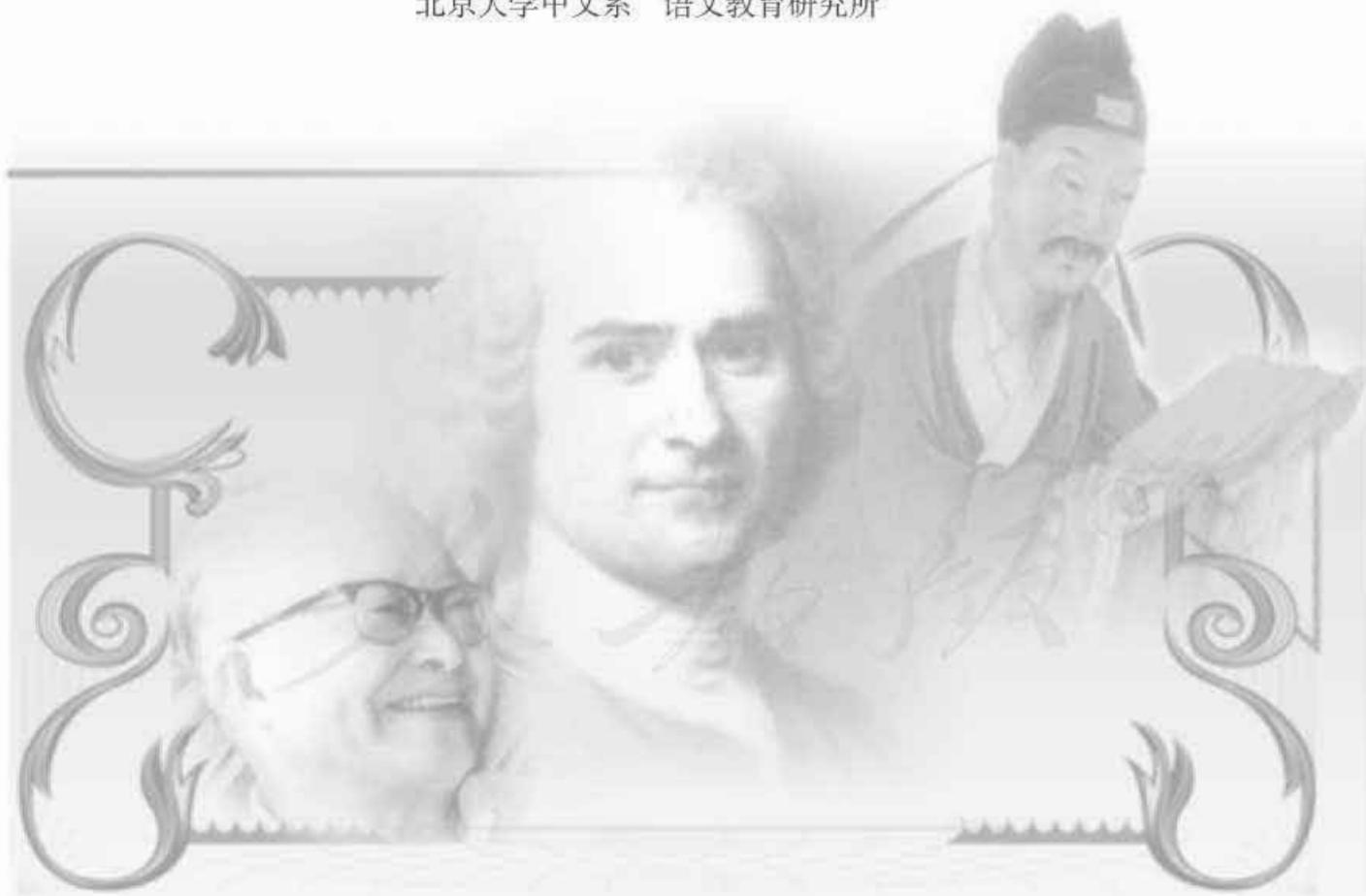
选修

中外传记作品选读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中外传记作品选读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出版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22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7-18714-8

定 价 元

价格依据文件号：京发改规〔2016〕13 号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使用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请登录中小学教材意见反馈平台：jcyjfk.pep.com.cn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联系。电话：400-810-5788

绿色印刷 保护环境 爱护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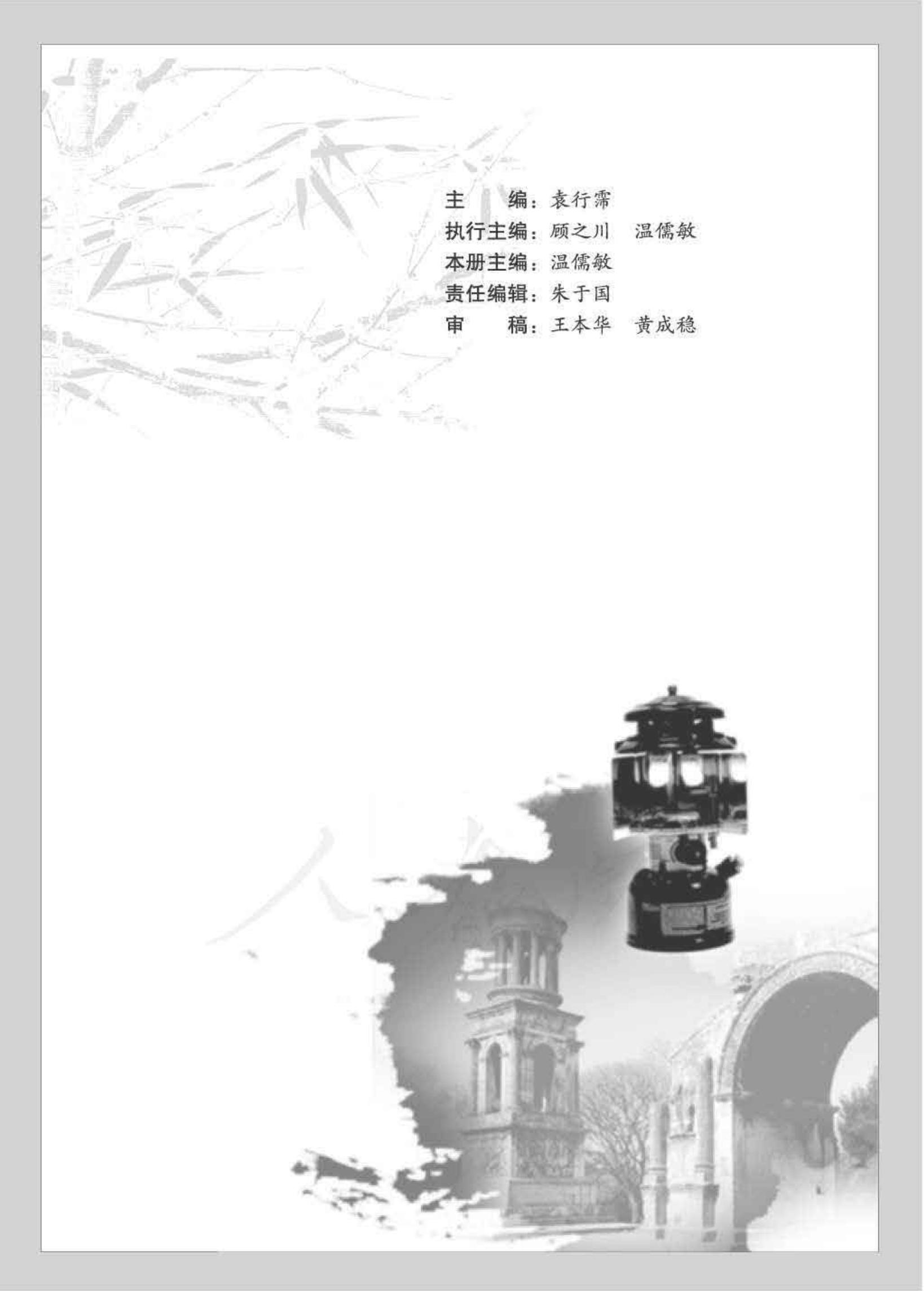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手中的这本教科书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在它的封底印有“绿色印刷产品”标志。从 2013 年秋季学期起，北京地区出版并使用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科书全部采用绿色印刷。

按照国家环境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板印刷》，绿色印刷选用环保型纸张、油墨、胶水等原辅材料，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支持绿色印刷，选择绿色印刷产品，共同关爱环境，一起健康成长！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主 编：袁行霈
执行主编：顾之川 温儒敏
本册主编：温儒敏
责任编辑：朱子国
审 稿：王本华 黄成稳

致 同学们

ZHI
TONGXUEMEN



亲爱的同学们：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你们已经顺利完成了高中语文必修阶段的学习任务。与刚刚踏进高中学校大门时相比，相信一定有不少收获。现在，我们将进入高中语文学习的另一个阶段——选修课的学习。与必修课相比，选修课将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对于雄心满怀的同学们来说，这些选修课无疑是雨露与甘泉，是知己与希望，是理想与桥梁，你们尽可以在其中一展身手，发展特长。

我们提供给大家的选修课程是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侧重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注意语言知识的积累运用，同时重视高尚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养成。在必修的基础上，我们将深入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外国诗歌散文、中国小说、外国小说、中外戏剧名著。涵泳这些古今中外名家名篇，将极大地拓展你们的语文视野，使你们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都能得到提高。而阅读中外传记作品，将拉近与仁人志士的距离，启迪你们的智慧；先秦诸子的犀利论辩、深沉哲思，将引领你们走近先贤圣人，领略这些思想家的不朽风采；语言文字应用，将把你们带到一个奇妙的汉语世界，让你们进一步体会汉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

语文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既包括精神的充实、情



感的完善与人格的提升，也包括读写听说能力的培养。在这里，教科书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种资源、一个平台，你们完全不必受此局限，而应尽可能将教科书与社会生活中的语文学习资源整合起来，拓展视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学习语文，运用语文，享受语文。这样，你们的语文水平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提高。

祝同学们愉快地踏上新的语文学习之旅！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2005年6月

前 言

传记阅读真是饶有兴味的事。

在令人心旷神怡的传记林苑中，触摸古今中外伟人大师非同寻常的生活轨迹，体味他们的苦恼与欢乐，思索他们的经验与忠告，细察各种人生况味，会给我们增加多少见识与乐趣！和那些杰出的人物“约会”，总是能感受到精神的提升——迷惘中得到启示，寂寞中领略抚慰，失意中获取鼓舞。开设《中外传记作品选读》这样一门语文选修课，也许能满足同学们这些愿望。

读传记常常让人陷入沉思：我们该怎样设计自己的人生？从杰出人物和成功者那里吸取经验，可能是最好的途径。年轻人大概都有自己的偶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充实而有意义，不妨就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偶像的选择不是追逐时尚，而是“取法乎上”，把那些真正能在思想、智慧和人格上不断激励我们、完善我们的人物，作为精神上的良师益友和学习的榜样。青少年时期多读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在接触人类精神高端的过程中张扬我们的灵性，塑造我们健全的人格，那会终生受益。这就如同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过的：“用伟人的事迹激励我们，远胜一切的教育。”

选收在这本教材中的9篇传记，传主有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等。其中许多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在以往学习中多少已有所了解，那么现在可以通过传记阅读步入这些伟人的生活空间，和他们有更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可以具体感受他们坚韧的意志、伟大的人格、真挚的情感以及走向成功所付出的艰辛。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另外的收获：初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评价人物，养成对传记阅读的兴趣，尝试对人物进行观察、描写与评述，提高读写能力。这样，我们就把传记阅读与语文课学习结合起来，是另一种更生动有趣的语文课。

传记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一种纪实文学形式，注重史实，可视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传记写作主要根据调查研究与传主个人回忆等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叙述与说明。作者在材料的选择与编排、叙述中可能融入自己的观察、想象与感受，或者强化了作

者自己所理解的题材意义，使传记常常带有文学性。我们学习的《中外传记作品选读》这门课，实际上兼及语文与历史等不同学科，是综合性较强的课程。传记的种类很多，有比较标准的纪实性传记，有作者自述的自传，有注重学术性的评传，还有人物小传、回忆录、传记小说，等等。本教材选收的传记，尽可能兼顾到不同的传记体式，多数为经典的作品，也有一些是比较贴近现实又有可读性的作品。限于篇幅，有的传记收入本教材时做了节选。如果要更完整地了解传主的经历，最好找传记全文来读。为了体例的统一，我们给多数传记取了新的标题。

青春时代是充满幻想、激情和纯真的时代，也是生命枝叶正旺盛地伸展，最需要精神光照的时代。多读一些优秀的传记吧！让我们仰望星空，拓展想象，沐浴人类文明之光，在与伟人大师的对话中探寻未来之路，逐步建构自己健全、充实、美好的精神家园。

编 者

2004年12月





目 录

精读

- | | |
|-----------------------------|-----------------|
| 第一课 鲁迅：深刻与伟大的另一面是平和 | 萧红 (1) |
| 第二课 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埃德加·斯诺笔录 (24) |
| 第三课 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 | 罗曼·罗兰 (42) |
| 第四课 达尔文：兴趣与恒心是科学发现的动力 | 欧文·斯通 (61) |
| 第五课 马克思：献身于实现人类理想的社会 | 海因里斯·格姆科夫等 (80) |

略读

- | | |
|---------------------------|------------|
| 第六课 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 | 沈从文 (101) |
| 第七课 杨振宁：合璧中西科学文化的骄子 | 吴学东等 (116) |

精读

第一课

鲁迅



深刻与伟大的另一面是平和

——萧 红



在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上摄
(1936年)

- ◆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 ◆ 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 ◆ 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 ◆ 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

阅读提示

鲁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在初中和高中，我们已经学过鲁迅的许多作品。但我们是否喜欢鲁迅？有些同学为什么会对鲁迅敬而远之？也许由于时代的隔膜，加上我们毕竟年轻，对鲁迅作品及其为人还不能充分理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对鲁迅高度评价的定论，先入为主地框定了我们的头脑，反而阻碍了对鲁迅精神丰富性的认识。如果读一读这篇回忆鲁迅先生的传记，相信这种状况会大有改观。我们会看到一个热情、幽默、深刻的鲁迅，一个睿智而又平和的鲁迅。原来我们完全可以很轻松地走近这位文化巨人。

这篇传记写于1939年，原篇名为《回忆鲁迅先生》（生活书店1946年版）。作者萧红（1911—1942），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曾经得到鲁迅直接的关怀和提携，与鲁迅先生有很深的交往。萧红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不但在其朴素优美的文字，更在于萧红作为女性作者对生活的细腻而又深情的体悟。阅读时我们会感到，这篇作品与一般传记不同，文学性很强，作者感情的融入非常多，文笔随意而又抒情。作为一篇回忆录，作者并没有完整地展示鲁迅先生的一生，而是捕捉了许多鲁迅生活的细节，随意写来，就像一些印象的片段回放，但这些印象组合起来，凸显出一个生活化、人情味十足的鲁迅。这是萧红心目中的鲁迅，也是真实的鲁迅。原来，深刻的社会批判者鲁迅，他的另一面是这样的平和。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儿，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



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使人显得长，横的使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筒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宴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儿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来了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的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儿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①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① 范爱农（1883—1912），浙江绍兴人。曾与鲁迅同在日本留学，后成为朋友。1912年7月10日范爱农与友人游湖时溺水身亡。鲁迅在1926年12月25日的《莽原》第1卷第24期上发表了《范爱农》一文以示悼念。

“周先生看这本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一过12点电车就没有了，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11点半了，11点45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12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儿。”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静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1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喝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儿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和许先生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谈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得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儿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月薪金10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鲁迅先生的明朗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①，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

^① 瞿秋白（1899—1935），现代作家、翻译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苏常州人。1935年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海上述林》是由鲁迅等人收集出版的瞿秋白遗文集，共两卷。



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儿。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①，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

^① ×先生，即冯雪峰（1903—1976），现代文艺理论家。1936年4月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上海工作，与鲁迅等情谊甚笃。

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次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珂勒惠支^①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莱^②，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

^① 珂勒惠支（1867—1945），德国女画家。鲁迅曾编印过她的版画集介绍给中国读者。

^② 史沫特莱（1890—1950），美国女作家、记者。1928年后来华参与进步文化工作，与鲁迅等来往密切。



着点儿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儿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①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围巾，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15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

① ××书店，即内山书店。店主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先生，与鲁迅是朋友。

魂灵》的原稿^①，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拿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②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50支的价钱大概是4角到5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

^① 这里是作者误记。作者所得到的其实是鲁迅翻译《表》的原稿。请参看许广平著的《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2页。

^② 听子，用镀锡或镀锌的薄铁皮做成的装食品、香烟等的筒子或罐子。



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儿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大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儿走，轻一点儿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儿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老板是犹太人也许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一两个钟头。

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那茶座里边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

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就用眼瞪着她，很生气地看了她半天。而后说：“是做什么的呢？”

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戴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

鬼到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上，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30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得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须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所以对于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儿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说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的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睛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



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煞是不对的。”

……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儿或扁一点儿，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这包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得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么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地玩着。

鲁迅先生家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1935年10月1日。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儿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儿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总说再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地送是应该的吗？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吗？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

‘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①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望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缸，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缸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也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儿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桌子的其余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了，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在这台灯下写的。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时婴孩的油画像。

^① ××老板，即李小峰（1897—1971），曾参加过新潮社和语丝社，后开办北新书局，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等均由该书局出版。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间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里，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罢，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慢地在讲一些什么。

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喊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佣人。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儿，自来水哗哗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嚓嚓地响，洗米的声音也是嚓嚓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面有朵斯托耶夫斯基^①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都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 50 烛光^②，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了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意。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地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候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得和大鱼池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做屋瓦，整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① 朵斯托耶夫斯基，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白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

② 烛光，旧时指灯泡的额定功率，50 烛光即现在 50 瓦特。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地好像从棚顶一直垂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3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得溜明。

1936年3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鼻子和胡须在扇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快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儿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哗啦哗啦地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友去了，弄堂里来去地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光染红了一点儿。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地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

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对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地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就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缕，慢慢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阖一阖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1936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太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晚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儿。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京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

近年来没有这样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花花地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谈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鲁迅先生睡在二楼的床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气喘虽然停止，但每天发热，尤其是下午热度总在 38°C 、 39°C 之间，有时也到 39°C 多，那时鲁迅先生的脸色是微红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没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有的时候张开眼睛看看，有的时候似睡非睡地安静地躺着，茶吃得很少。差不多一刻也不停地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而仍很远地蹲在书桌上，若想吸一支，是要请许先生付给的。

许先生从鲁迅先生病起，更过度地忙了。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吃药，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试温度表，试过了之后还要把一张医生发给的表格填好，那表格是一张硬纸，上面画了无数根线，许先生就在这张纸上拿着米度尺画着度数，那表画得和尖尖的小山丘似的，又像尖尖的水晶石，高的低的一排连地站着。许先生虽然每天画，但那像是一条接连不断的线，不过从低处到高处，从高处到低处，这高峰越高越不好，也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度越高了。

来看鲁迅先生的人，多半都不到楼上来，为的是请鲁迅先生好好地静养，所以把客人这些事也推到许先生身上来了。还有书、报、信，都要许先生看过，必要的就告诉鲁迅先生，不十分必要的，就先把它放在一处放一放，等鲁迅先生好了些再取出来交给他。然而这家庭里边还有许多琐事，比方年老的娘姨病了，要请两天假；海婴的牙齿脱掉一个，要到牙医那里去看过，但是带他去的人没有，又得许先生。海婴在幼稚园里读书，又是买铅笔，买皮球，还有临时出些个花头，跑上楼来了，说要吃什么花生糖什么牛奶糖，他上楼来是一边跑着一边喊着，许先生连忙拉住了他，拉他下了楼才跟他讲：

“爸爸病啦。”而后拿出钱来，嘱咐好了娘姨，只买几块糖而不准让他格外地多买。

收电灯费的来了，在楼下打门，许先生就得赶快往楼下跑，怕的是再多打几下，就要惊醒了鲁迅先生。

海婴最喜欢听讲故事，这也是无限的麻烦，许先生除了陪海婴讲故事之外，还要在长桌上偷一点儿工夫来看鲁迅先生为着病耽搁下来的尚未校完的校样。

在这期间，许先生比鲁迅更要担当一切了。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盘，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盘中摆着三四样小菜，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



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着楼梯上了楼。

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动筷，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嘱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儿。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下，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许先生用着波浪式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一个面包，是在客厅后边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

“劝周先生多吃些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用的。”

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

“这也是对的。”

而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桌子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

那已经送上去的一碗牛奶又带下来了。

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强，欢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欢喜吃硬饭……”

许先生楼上楼下地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儿就问许先生：

“有什么人来过吗？”

看鲁迅先生精神好些，就一一地报告过。

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

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

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先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

这样的病，为什么鲁迅先生自己一点儿也不晓得呢，许先生说，周先生有时觉得肋痛了就自己忍着不说，所以连许先生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怕别人晓得了又要不放心，又要看医生，医生一定又要说休息。鲁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①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 20 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

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 X 光的。

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查病去了。照 X 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

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

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热度仍高，若再这样热度不退，就很难抵抗了。

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

须藤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所以每天来，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热的药，还吃过停止肺部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

在楼下的客厅里许先生哭了。许先生手里拿着一团毛线，那是海婴的毛线衣拆了洗过之后又缠起来的。

鲁迅先生在无欲望状态中，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想，睡觉是似睡非睡的。

天气热起来了，客厅的门窗都打开着，阳光跳跃在门外的花园里。麻雀来了停在夹竹桃上叫了三两声就又飞去，院子里的小孩子们唧唧喳喳地玩耍着，风吹进来好像带着热气，扑到人的身上。天气从刚刚发芽的春天，变为夏天了。

楼上老医生和鲁迅先生谈话的声音隐约可以听到。

楼下又来了客人。来的人总要问：

“周先生好一点儿吗？”

许先生照常说：“还是那样子。”

但今天说了眼泪就又流了满脸。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问：

“周先生又不大好吗？”

许先生说：

“没有的，是我心窄^②。”

过了一会儿，鲁迅先生要找什么东西，喊许先生上楼去，许先生连忙擦着眼睛，想说她不上楼的，但左右地看了一看，没有人能替代了她，于是带着她那团还没有缠完的毛线球上楼去了。

楼上坐着老医生，还有两位探望鲁迅先生的客人，许先生一看了他们就自己低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背转着身问鲁迅先生要什么呢，而后又是慌忙地把毛线缕挂在手上缠了起来。

^① 关于这次请美国医生为鲁迅诊察病情的经过，作者所记与事实颇有出入，恐是误记。请参看许广平著《关于鲁迅的生活》第 17 页。

^② 心窄，心胸不开朗。



一直到送老医生下楼，许先生都是把背向鲁迅先生而站着的。

每次老医生走，许先生都是替老医生提着皮提包送到前门外的。许先生愉快地、沉静地带着笑容打开铁门闩，很恭敬地把皮包交给老医生，眼看着老医生走了才进来关了门。

这老医生出入在鲁迅先生的家里，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医生从楼上下来时，娘姨若在楼梯的半道，赶快下来躲开，站到楼梯的旁边。有一天老娘姨端着一个杯子上楼，楼上医生和许先生一道下来了，那老娘姨躲闪不灵，急得把杯里的茶都颠出来了。等医生走过去，已经走出了前门，老娘姨还在那里呆呆地望着。

“周先生好了点儿吧？”有一天许先生不在家，我问着老娘姨。她说：

“谁晓得，医生天天看过了不声不响地就走了。”

可见老娘姨对医生每天是怀着期望的眼光看着他的。

许先生很镇静，没有紊乱的神色，虽然说那天当着人哭过一次，但该做什么，仍是做什么，毛线该洗的已经洗了，晒的已经晒起，晒干了的随手就把它缠成团子。

“海婴的毛线衣，每年拆一次，洗过之后再重打起，人一年一年地长，衣裳一年穿过，一年就小了。”

在楼下陪着熟的客人，一边谈着，一边开始手里动着竹针。

这种事情许先生是偷工夫就做的，夏天就开始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就做夏天的。

许先生自己常常说：

“我是无事忙。”

这话很客气，但忙是真的，每一餐饭，都好像没有安静地吃过。海婴一会儿要这个，要那个；若一有客人，上街临时买菜，下厨房煎炒还不说，就是摆到桌子上来，还要从菜碗里为着客人选好的夹过去。饭后又是吃水果，若吃苹果还要把皮削掉，若吃荸荠看客人削得慢而不好也要削了送给客人吃，那时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

许先生除了打毛线衣之外，还用机器缝衣裳，剪裁了许多件海婴的内衫裤在窗下缝。

因此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钮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件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他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捡起来做一件袍子，正说着，海婴来了，许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婴又要麻烦起来了，一定要说是他的，他就要要。

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

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一道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纽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

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

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现在许先生在窗下缝着衣裳，机器声格答格答的，震着玻璃门有些颤抖。

窗外的黄昏，窗内许先生低着的头，楼上鲁迅先生的咳嗽声，都搅混在一起了，重续着、埋藏着力量。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

许先生的手指把捉了在缝的那张布片，头有时随着机器的力量低沉了一两下。许先生的面容是宁静的、庄严的、没有恐惧的，她坦荡地在使用着机器。

海婴在玩着一大堆黄色的小药瓶，用一个纸盒子盛着，端起来楼上楼下地跑。向着阳光照是金色的，平放着是咖啡色的，他招聚了小朋友来，他向他们展览，向他们夸耀，这种玩意只有他有而别人不能有。他说：

“这是爸爸打药针的药瓶，你们有吗？”

别人不能有，于是他拍着手骄傲地呼叫起来。

许先生一边招呼着他，不叫他喊，一边下楼来了。

“周先生好了些？”

见了许先生大家都是这样问的。

“还是那样子，”许先生说，随手抓起一个海婴的药瓶来。“这不是吗，这许多瓶子，每天打一针，药瓶子也积了一大堆。”

许先生一拿起那药瓶，海婴上来就要过去，很宝贵地赶快把那小瓶摆到纸盒里。

在长桌上摆着许先生自己亲手做的蒙着茶壶的棉罩子，从那蓝缎子的花罩子下拿着茶壶倒着茶。

楼上楼下都是静的了，只有海婴快活的和小朋友们的吵嚷躲在太阳里跳荡。

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

有一天他站在走上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

“爸爸，明朝会！”

鲁迅先生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那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

“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

“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

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仍旧喊。

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

“明朝会，明朝会。”

说完了就咳嗽起来。

许先生被惊动得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

海婴一边笑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

“爸爸是个聋人哪！”

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婴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

鲁迅先生在4月里，曾经好了一点儿，有一天下楼去赴一个约会，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手下夹着黑花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地就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的，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7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画，老医生还是照常地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哪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倚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儿。”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儿？”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七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地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的体质是好的，若差一点儿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 30 年。

又过了三个月。

1936 年 10 月 17 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17 日，一夜未眠。

18 日，终日喘着。

19 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1939 年 10 月

思考与探究

1. 阅读课文，说说生活中的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有什么不同。请用课文中事例来说明。

2. 写作此文，作者融入了很多感情，这也是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特点。品味下面的句子，体会作者的感情。

(1) 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2)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3)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4)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5) 19 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3. 这篇传记是如何捕捉和描写鲁迅的生活细节，表现传主的个性的？作为一篇回忆录，这篇课文在语言和结构等方面有什么艺术特色？

拓展与实践

我们已经学过很多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他的作品风格及人格品质有了一定的了解。有的同学可能



喜欢鲁迅的个性，有的可能对其敬而远之。对他的作品，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请你和你的同学设计一个“关于目前中学生对鲁迅的接受情况”的调查问卷，在班级或者学校范围内展开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写出简要的调查报告。

有关资料

1. 相关传记作品

《人间鲁迅》，林贤治，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王晓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对传主的评价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是巨人。他不是帝王，不是将军，他无须挥舞权杖，作为旧世界的逆子贰臣，唯以他的人格和思想，召引了大群年轻的奴隶。他把对于民族和人类的热爱埋得那么深沉，乃至他的目光，几乎只让人望见直逼现实的愤怒的火焰。数千年的僵尸政治，“东方文明”，专制，强暴，虚伪，保守和蒙昧，都是他攻击的目标。他教奴隶们如何反抗，如何“钻网”，如何进行韧性的战斗。他虽然注重实力的保存，却不惮牺牲自己，必要时照例地单身鏖战。在一生中，他呐喊过也彷徨过，甚至在横站着作战的晚年仍然背负着难耐的寂寞，但是从来耻于屈服和停顿。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赢得众多的“私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招致密集的刀箭，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获得更为辉煌的战绩，他所凭借的仅仅是一支“金不换”，便在看不见的但却是无比险恶的战场里，建树了超人一等的殊勋。（林贤治《人间鲁迅·引言》）

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蔡元培）

国家事岂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断咒骂；悲痛中别无他说，只好劝大众继续战斗。（胡子婴）

3. 关于回忆录

回忆录主要记录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或所熟悉的历史事件，也有主要记述自己所交往过的他人的事迹的。《回忆鲁迅先生》属于后一种，主要记述作者与鲁迅的交往，以及对于鲁迅的印象。顾名思义，回忆录主要是回忆的整理和记录，和一般传记相比，不见得很连贯和完整，但作者常常带着某种感情来叙述，对某些事件或者生活细节的呈现可能更加生动、亲切。



第二课

毛泽东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笔录



- ◆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 ◆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 ◆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 ◆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阅读提示

近百年来，我们的前辈为了拯救灾难中的民族，曾经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奋斗，支持他们无私无畏的斗争的，就是坚定的革命信念。现在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作为一种不断追求人类进步、始终富于批判性的精神资源，这种革命的信念仍然非常宝贵。同学们虽然从小就不断接受革命传统的教育，对“革命”这个词，都耳熟能详。但理解可能更限于理性的层面，对于革命先驱的革命行为、革命信念都缺乏鲜活的感性认识。阅读革命伟人的传记，可能会弥补这样的缺憾。

1936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曾在陕北保安采访过毛泽东，根据他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这篇《毛泽东自传》。从中我们可以读到毛泽东的许多传奇的经历、睿智的哲思，以及对旧制度的批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最有威望的革命领袖，除了时代的呼唤，跟他自身的意志、性格、心理也都有关系：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献身理想的使命感，还有他的坚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都是成为一代伟人的重要因素。

阅读这篇传记时，除了了解毛泽东的革命实践，还应当细细体味这位伟人在回忆自己的成长以及革命历程时的情感指向，特别是他的幽默、自信与大气的风格。

《毛泽东自传》最初是斯诺《西行漫记》中的一篇。1947年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年表》一书中，附录了此文，署名“史诺笔录，汪衡译”，是影响较大的版本。2003年青岛出版社根据这个本子重加校订，出版了《毛泽东自传》。这里选收的即是这个版本，有删节。

一颗红星的幼年

我于1893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①是一个贫农，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儿钱，设法买回了他的土地。

这时我家有15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60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35担——这就是说，每人约7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25担。靠了这个剩

^① 毛泽东的父亲，名叫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一年多的兵。据《西行漫记》载，他的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母亲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母亲的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圫（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相距十余里。七妹18岁时和毛贻昌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有四人夭折，只余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兄弟三人。毛泽东的祖父叫毛恩普，是个敦厚的庄稼人，曾因家境窘迫，将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毛贻昌是毛恩普唯一的儿子。

余，父亲积聚了一点儿资本，不久又买了 7 亩田，使我家升到“富”农的地位。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 84 担谷。

当我 10 岁我家只有 15 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 7 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不过，我们每年仍有 45 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①。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一点儿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做耕田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他只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人。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吃饱的。

我八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 13 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②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 13 岁的时候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山谷里面。我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儿，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比以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成功的“罢课”。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的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里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文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工人们吃鸡蛋和白米饭，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的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里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的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工人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感情作用的显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 13 岁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

^① 毛贻昌除赎回父亲毛恩普典当的土地，还购买了一些，增加到 22 亩，每年能收 80 担稻谷。他善于经营，后来做稻谷和猪牛生意发家，还自制过一种叫作“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流行乡里。

^②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圫的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有个舅舅，那时正在开馆教读，故毛泽东有时也去听他讲书。八岁时，父母便把他接回韶山，入了私塾。至 16 岁前，他曾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读书。他后来风趣地把这段童年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这里说的“塾师”，是指教书先生，当是井湾里的一段往事。



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指责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①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青年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更多地做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明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斯诺原注〕^②。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13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咒骂他，我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旁边，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向前一点儿，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膝一下。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③。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儿；当我怯懦屈服时，他打骂得更厉害。

发现了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死硬派”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有许多的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尤其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酷诫^④，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⑤《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是害人的。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过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喜欢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13岁时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大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

① 为上的，对于长辈或位尊者的一种尊称，意思是“在上”的人。这里是指长辈的意思。

② 方括号中楷体字为斯诺原注（已注明）或原书引用的《毛泽东自传》最早的口译者吴黎平先生的译文和说明。下同。

③ 1906年12月23日，这天正好是冬至。父亲为了让毛泽东学生意，在宴请朋友时，曾让13岁的他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本不愿意做这些事，由此惹恼了父亲，故受到责骂，引出了一场“跳水风波”。毛泽东曾当着客人的面反驳父亲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这些话，表现了少年毛泽东的一种反叛的个性。

④ 酷诫，“严酷劝诫”的缩写。旧中国当时的私塾里是不容许孩子看一些与经书无关的课外书籍的，所以塾师对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酷诫”。

⑤ 《反唐》，应是《说唐》，也称《说唐全传》。另一说，指《隋唐演义》。



使要我读经书的父亲十分生气，尤其是当他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的窗门遮盖起来，所以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作《盛世危言》^①。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改革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②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想将之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读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助他打赢官司的，如同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旧传奇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和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以后，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作为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地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在宗教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但母亲则笃信神佛，她给予她的孩子们以宗教教育。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板起面孔讨论我的父亲对母亲的欠缺礼貌的问题了。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他向我们进攻得太厉害了。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我的读书渐渐地影响我，我自己愈来愈怀疑，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对于信仰鬼神的漠不关心而责备我，但我的父亲则不说什么。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及提防而马上惊逃，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回想老虎神秘逃去，感觉很奇怪，他开始想他是不是没有开罪菩萨。自那时候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然烧香，但是当我在另一个意义上堕落的程度增高时，这位老人并不管它，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盛世危言》继续引发我求学的欲望，我开始厌恨我在田里的工作。这自然是我父亲所反对的，我们发生争执，最后我脱离家庭。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在一位老学究面前攻读，又读了许多时事文章和其他的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了一个影响我的整个人生的事件。在我们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学生看见从长沙回来的许多豆商，我们问他们何以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一个大叛变，并告诉我们这回事^③。

那年有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荐了一个代表

^① 《盛世危言》，作者是郑观应（1842—1922），这是一本主张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著作，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

^② 积弱，即“长年积蓄软弱”的意思。那时老夫子们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也就是在寻找清政府腐败、软弱、落后的种种因素。

^③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社会问题，终于在他面前重现了。1910年4月，遇上灾荒年，粮价飞涨，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饥民暴动。有些饥民向巡抚衙门请愿，遭到枪击，有14人当场被打死。于是饥民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等。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20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

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都很发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了一次示威运动。他们进攻满清衙门，砍下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驱走巡抚。以后那布政使骑着马出来告诉老百姓，政府要设法救济他们。他说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①不喜欢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他被撤了职。一个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通缉叛党的领袖，他们许多人被砍了头。他们的头被悬挂在柱子上，以警告来日的“叛徒”^②。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造反的家伙”，但只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他们不认识这对于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作一个刺激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却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于是我深恨这样对待他们也是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③的会员和一个地主发生冲突，地主在法庭上控告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容易促成一个于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员失败了，但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④上去，在那里他们建筑了他们的要塞，官兵被派去打他们。那地主放出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孩童。“叛徒”的领袖叫“磨刀石彭^⑤”，“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他被捕砍头。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对造反表示同情。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经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缺少粮食，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一村运到城中去，虽然本村粮食缺少。他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怒发冲冠，我对他的同情。同时，我想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对于我另有一个影响，即某一个小学校有一个“激进”的教员，他所以激进，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我钦慕他，并与他的意见相同。

这些事件相连地发生，给予我的已经反叛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些政治认识，尤其是我读了一个谈到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甚至现在还

① 方括号内排宋体的文字是青岛版《毛泽东自传》编者所加。下同。

② 据吴黎平注释：这里说的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的具体情节和事实有些出入。饥民攻打巡抚衙门时，湖南巡抚岑春煊……被群众的势力吓倒，把巡抚的职务交给了湖南布政使庄廉良。庄在未上台时表示同情群众，所以曾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他在当上了代理巡抚后立即翻过脸来，严厉地镇压群众。群众风潮继续发展，清朝政府下令把岑、庄二人都撤职，另调官员担任湖南巡抚。

③ 哥老会，原本是清初由闽粤客家移民在四川建立的民间组织，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四川方言呼弟为“老”，故哥老会又叫“哥弟会”，是天地会的支派。首领称“老大哥”或“大爷”，互称“袍哥”。参加该会的人多为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和社会闲散人员。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会众相继参加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参加武装起义。后来，该会往往为反动势力所操纵和利用。

④ 据吴黎平记载，此山名叫“浏山”。

⑤ 磨刀石彭，一个名叫“彭铁匠”的工匠。

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①，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②。当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担心，开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我的父亲想要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钱店做学徒。最初我不反对，以为这也许很有趣的，但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的父亲反对，便考进那个学校。这学校是在我外公的县城里，我的一个老表^③是“激进”的一个学生，他告诉了我这个新“近代”学校的情形。那里经书是不大被注意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很多，教育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与我的老表进那个学校，注了册，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的学生，但后来我发现各地人都可以进，我才把我的真籍贯说出来。我付了14吊铜板，以做我五个月的膳宿费以及我读书需要的物件之用。我的父亲因他的朋友劝他说：这个“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的赚钱本领，最后让我入学。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50里，我当时是16岁了。

在这个新学校，我能够读自然科学和新西学课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的一位是日本留学生，他戴上一个假辫子，假辫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都笑他，称他是“假洋鬼子”。

我以前没有看见过那么许多的儿童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儿子，穿着奢侈的衣服，很少农民能够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的一个学校。我穿得比别的学生都蹩脚。我只有一套清洁的袄裤。长袍学生不穿，只是教员穿。除了“洋鬼子们”以外，没有人穿西装。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平常我穿破烂的袄裤。但在他们中我有两个朋友，而且是我的好同志。这二人中之一，现在是个作家，住在苏联。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欢，做一个湘乡人是很重要的。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常常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是要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哪一区的人，结果三个地方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觉得不舒服。

我在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欢喜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志不在经书，我读我的老表给我的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

^① 清政府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中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还有，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等。

^② “安南”即是越南。当时，清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保护责任。1883年，法国全面侵略越南，迫使越南签订了越法《顺化条约》，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6月，中法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从此，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缅甸同越南一样，在清代也曾臣服中国。1824年，英国发动侵缅战争，清政府曾多次交涉。英推说不知中国对缅甸的宗主权。1885年12月，英兵攻占缅甸首府曼德勒，缅甸并入英属印度。1886年7月，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了《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了英国在缅甸的特权。

^③ 《西行漫记》将此处记为“表兄”。毛泽东所说的表兄名叫文昌，他告诉毛泽东的新学校，即离韶山50里的湘县立东山小学堂。1910年秋天，毛泽东走出韶山求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的《新民丛报》^①，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等到我能背诵。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我很感激我的老表。〔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不喜欢“假洋鬼子”，因为他的假辯。但我喜欢听他谈到日本。他教音乐和英文，有一个歌是日本歌，叫作《黄海之战》。我记得当中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地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我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她战胜俄国，我觉得她值得骄傲〔这首诗歌所描绘的显然是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和俄日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的春节和全国欢腾的情景——斯诺注〕。她很有能力，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日所知道的日本。

这一切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

我又记得在这个时候，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两年，而我才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实在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的良好的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改革。我因读中国古代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而为之心醉，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我在一篇讲到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最初听到美国，那文里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②的书里，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③、彼得大帝^④、惠灵顿^⑤、格莱斯顿^⑥、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我起始想到长沙去。那是大城市，湖南的省会，离我的家140里。我听说这城市是很大的，有许许多多的人，许多的学校，巡抚衙门就在那里，这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很想到那里去，进一个湘乡人办的学校。那年冬季我请高小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他答应了，我于是走到长沙，十分地担心，怕不能进去，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而使我惊异的是，我被录取了。但是政局转变得很快，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① 《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2月8日，1907年11月20日停刊。该报提倡维新思想、公民道德和教育等，在当时影响很大。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昌曾将《新民丛报》借给他。毛泽东在阅读时，还在上面加过一些批注。如在“第四号”《新民说》一文旁边，即有这样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窃得国之列朝也。”

^② 《世界大英雄传》，即《世界英雄豪杰传》，是毛泽东从同学萧子暲（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那里借来的。

^③ 叶卡捷琳娜（1729—1796），指“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女皇，1762年继位，对内维护、发展农奴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谋求世界霸权。

^④ 彼得大帝（1672—1725），指“彼得一世”，俄国沙皇（1682—1721）和皇帝（1721—1725），在位期间，发动侵略战争，使俄罗斯版图大增。

^⑤ 惠灵顿（1769—1852），又译“威灵顿”。英国军事家、政治家，曾在滑铁卢一役中击败拿破仑。

^⑥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任英国首相。

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①，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湘人^②领导下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同时看到了《民力》里面充满了刺激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会纲。这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儿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咨议会”，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答应跟着剪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 10 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关于蓄辫，我和一个法律学校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各人执持了相反的理论。这法科学学生引用经书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话来辩论，可是我和反对蓄辫的人们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使他开口不得。

武昌起义 [1911 年 10 月] 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剧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每个人都专心一致地听着。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黎元洪的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向同学募了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大批地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 10 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冲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到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看守中了。

第二天^③，一个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满

^① 《民力》，指中国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和于右任主编的进步性报纸《民立报》。

^② 湘人，据吴黎平记载，这个“湘人”，即湖南人黄兴。当毛泽东在《民立报》上得知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思想震动很大。他后来在 1919 年 8 月 4 日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本会总记》一文中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1911 年 4 月 27 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

^③ 第二天，即 1911 年 10 月 22 日，湖南共进会领袖焦达峰与原新军排长陈作新率新军攻克长沙，捕杀清廷官吏，成立军政府，焦达峰与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



意他们。不到几天后，我去访问一个朋友时，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作为地主和军阀的代表，谭延闿（kǎi）^① 打倒了他们。〔在革命党人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的副本。原件是由徐特立用血书写的，他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当时他切断指尖，以表示至诚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呼吁召开国会，予断指以送（赴京代表）。”〕

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了。学生军已经组成了，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因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②，来帮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xiǎng）银是一月七元——不过，已经多于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因兵士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然而我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买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革命的报纸中，有一个《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首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们。剩下来的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又劝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我能写而且懂得一点儿经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我能够帮他们做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革命的结果还没有决定，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订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儿津贴。这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伟大的社会效益，可以富国富民。我变换进了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了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

^① 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父亲谭钟麟曾做过两广总督。他于1904年中进士，五年后任湖南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湖南起义时，任参议院长。他杀害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后，当上了湖南省的都督。后追随蒋介石，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② 毛泽东当时参加的是长沙革命军，即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他当了一名列兵。

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了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说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注册，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元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①。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个先生^②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了。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③。
〔汤芗铭接替了谭延闿，并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种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里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

^① 毛泽东考入湖南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为主题，论述教育在国民素质中的重要性。

^② 毛泽东提到的这位先生，是国文教师，名叫柳潜，是他借给了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116卷。他读后即产生了自学的念头。他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退学后，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多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很被称道的六百多字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柳先生的批语多达150字，称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③ 1915年1月，日本以承认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袁世凯表示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遂将一些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为《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即在封面上奋笔明志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①。我读了亚当·斯密^②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③所著的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④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⑤混合起来。

那时我住在湘乡县同乡会馆里，那里还有许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没有事做，也没有钱。会馆中的学生和兵士总是在吵架，有一夜他们之间爆发了武力冲突，兵士们攻打学生，并且要杀死他们。我逃到厕所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其实是他们要我帮他们做入学论文。我将自己的意志写信给家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两个朋友作了论文，自己作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录取了三次。那时我并不以为“枪替”^⑥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仅仅是一种友谊。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新校中有许多的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是我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别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我最讨厌的就是必须的静物描生^⑦，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日半山^⑧”，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圆圈来代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画图”得到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数却非常好，这样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说是报人的东西，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古文”。

① 舆图，即古之“地舆图”，现在叫“地图”。

②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译作《原富》）一书蜚声于世。

③ 约翰·斯·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功利主义》等著作。

④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有《第一原理》《逻辑学》等著作。

⑤ 史地，即历史和地理。

⑥ 枪替，即“替人当枪使”之意。古人称“代人捉刀”，现在称“枪手”。

⑦ 静物描生，即静物写生。

⑧ 半日半山，据《西行漫记》，当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诗句“半壁见海日”。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昌济^①。过后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这篇文章 100 分。

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大香炉^②”，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我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吧！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学生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欢迎和善遇。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一个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 1934 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

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广告登出后，我得到三个半答复。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未进而成为友谊。

但是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这个团体^③后来对于中国的命运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这种国家危急之秋，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我对于女人并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 16 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 20 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谈女人——普通在这时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极为重要——以外，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④”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⑤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

^①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长沙板仓人。教育家。1903 年留学日本，因心系中华而改名“怀中”。六年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矢志教书育人。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毛泽东很喜欢上杨先生的课，经常去他的家里请教、探讨问题。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1914 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杨先生还担任了指导老师。毛泽东对杨先生非常崇拜，1915 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昌济最欣赏的两个学生是毛泽东和蔡和森。1915 年 4 月 5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看来，杨昌济一直将毛泽东视为“异材”。其女杨开慧后来成为毛泽东之妻。

^② 大香炉，为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的俗称，有时也特指大昭寺等著名佛寺。另译作“打箭炉”。

^③ 这个团体，即后来成立的新民学会。

^④ 买肉，方言，即嫖妓。这里的“肉”，是指妇女出卖肉体。

^⑤ 用人，即佣人、仆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间、山坡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①”。在已经结霜的天气里，我还露宿田陌间，或是11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种种，都算是体格锻炼。也许这对我的身体大有裨益，后来我是何等依靠它，在我屡次横越华南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时候。

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我开始了解一个有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在1916年，我和几个友人成立了新民学会^②，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1935年）；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暲（萧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音），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会员的大部在1927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③。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作“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在天津的这种团体是觉悟社，它在组织激进青年的工作方面是领先的。周恩来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创始人中还有邓颖超女士等。——斯诺注），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做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① 浴风，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23日记里记载道：“今日早起，同蔡（和森）、毛（泽东）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

② 新民学会，这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于1918年4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革命组织，主要成员有何叔衡、张昆弟、李维汉、陈昌、罗学瓒、向警予、蔡畅、郭亮和夏曦等。

③ 互助社，成立于1917年10月8日。



我于 1913 年入师范学校^①，1918 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 160 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 1/3 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 1911 年到 1927 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切断我回家的心向^②。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在去国^③以前，这般青年预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我陪了几个湖南的学生到北京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是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 1927 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④。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 8 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到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高级的官吏，一个是中国苏

^① 师范学校，1913 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的妙高峰下，湘江岸边，东临粤汉铁路，与岳麓山隔江相望。学校创建于 1903 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和萧子暲等，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

^② 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在他 15 岁那年，母亲就病了，时常在外婆家养病。1918 年夏，他自长沙去北京前，还特意寄给舅舅一个药方，为母亲治病。1919 年春，他还把母亲接到长沙就医。这年秋天的 10 月 5 日，母亲终因患瘰疬（俗称“疬子颈”）而去世，年仅 52 岁。毛泽东在回家奔丧期间，还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母文》。后来，他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不损人的，损己利人的。他认为母亲属第三种。母亲去世后仅三个多月，毛泽东的父亲也于 1920 年 1 月 23 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是年 50 岁。

^③ 国，即“离开国家”，这里指出国。

^④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立即报考北京大学，主要是当时的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即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所以，他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管理着 15 种中外报纸。

维埃政府的副主席^①，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尼亚的“三K党^②”。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进。至于所以会如此的背景，则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③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平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④。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就是冯玉祥将军退隐时写爱国诗的地方。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的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中还有过这些游历：我曾沿着洞庭湖作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

① 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指张国焘（1897—1979）。

② 三K党，美国的一个恐怖组织，提倡种族歧视，迫害黑人及一切进步人士，并从事其他破坏活动。

③ 来到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中。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8个人挤住在一起。所以，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称当时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可见同学一处，求学艰难。

④ 孟子生地，指山东邹城。这里的孟府、孟庙和孟林，被称作“三孟”。



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大混蛋张敬尧^①。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来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平，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②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③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年我与杨开慧^④结婚。

思考与探究

- 节选的部分，毛泽东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他似乎天生就有着一种叛逆的性格，这种性格引导他去阅读更多的书籍，去见识更广阔的世面，并最终导致他思想的转变。阅读课文，找出体现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事例，说说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

^① 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② 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理论家，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③ 柯卡普（1844—1912），英国学者。《社会主义史》初版于1892年，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李季据此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④ 杨开慧（1901—1930），她自小随母亲住在长沙板仓。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1918年随父亲迁居北京。父亲病逝后，1920年2月，她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在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他们是花了六块银元置办的结婚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她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毛泽东辗转各地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被敌人杀害。

2. 这是一篇由传主人口述的自传，文章的语言带有很明显的传主人的特色。品味下面的句子，说说它们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什么精神品质。

(1) 我家里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的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工人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感情作用的显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2)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

(3) 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膝一下。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

(4) 我代两个朋友作了论文，自己作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录取了三次。

3. 这篇传记最使你感动的部分有哪些？读完课文，你对毛泽东这位伟人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拓展与实践

年谱和年表是用编年的方式记载某个人生平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有的采用表格的形式，有的则直接用文字按时间顺序分段表述。年谱和年表的文字表达都必须简明扼要，不作抒情、议论或艺术发挥。制作年表和年谱，是了解一个人物生平经历及思想发展最简捷的途径，也是传记创作前重要的准备工作。请在老师指导下，根据这篇自传，适当参考其他毛泽东的传记材料，整理一篇“30岁以前毛泽东生平与革命历年表”，字数为600字左右。

有关资料

1. 相关传记作品

《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美]史沫特莱著，三联书店1979年版

2. 关于自传

自传是由作者自述生平的一种传记形式。多采用第一人称形式，回忆和梳理自己的生平经历，特别是那些对其一生命运有重要影响，或者印象最深刻、最值得回顾的经历、事件或交往。传主在追述往事过程中往往融入自己的感情和对人生的思考，因而往往具有特别的真实感与亲切感。有的自传也称回忆录。还有一类是应用性的自传，要求在较短的篇幅中清晰地介绍自己以往的生活与工作履历，必须真实简明，不宜感情融入，一般不作艺术加工。比较有名的自传有：

《从文自传》，沈从文著，《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四十自述》，胡适著，岳麓书社1998年版

第三课

贝多芬



扼住命运的咽喉

——罗曼·罗兰



贝多芬像(木刻画)
马丁·泰切克(1823年)

- ◆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于无振拔的苦难。
- ◆ 扼住命运的咽喉！
- ◆ 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阅读提示

在西方，贝多芬享有至高无上的艺术地位。你要参加一场通俗歌曲演唱会，大可不必考虑怎么正式的穿着，可是如果要去欣赏贝多芬的古典音乐，就一定得打着领带，穿上最美的晚礼服，牛仔裤是万万进不了音乐厅的。人们对古典音乐就有这种特别的尊崇感。也许我们并不了解贝多芬，甚至不一定喜欢贝多芬，但应当知道，像贝多芬音乐这样高雅的作品，有着一般流行艺术所缺少的高贵的品质，她在陶冶人的灵魂、提升精神格调方面，能起到特殊的作用。

接触过贝多芬的作品的人，几乎都为他那种特别壮观的精神力量所感动。阅读这篇贝多芬的传记（原篇名为《贝多芬传》，收入《傅译传记五种》，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了解这位音乐家充满磨难而又始终挑战命运的奋斗的一生，除了对他的作品的背景和内容有更多的理解，还可能引发这样的思考：贝多芬“担当患难”的悲剧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和他的艺术创作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苦难和悲剧反而能成就真正深刻的有震撼力的艺术？这些思考会吸引我们进一步探究艺术与人生的关联。

这篇传记写于20世纪初，“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粗鄙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罗曼·罗兰有感于当时社会气氛的低迷，希望借贝多芬的人格精神来激励人生：“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傅雷在“译者序”中非常动情地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这些也许可以作为读这部伟人传的最重要的提示：我们不只是要通过传记进入迷人的音乐王国，更要体味那弥漫全篇的英雄气息，并学习那种敢于“扼住命运咽喉”的大无畏精神！

这篇传记采用评传的方式，抓住传主一生最重要的一些事件，特别是他的几个创作阶段与代表作，加以突出的评述，从而清晰地勾勒出贝多芬壮观的生命历程。评述时非常注重材料，如传主的有关书信和相关的回忆等，都经过精心的选择组织，支撑起传记的框架。罗曼·罗兰不满足于客观冷静的评述，他对贝多芬的崇拜和理解，不时充溢在文字之中，使传记带上诗一般的情韵。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



杜^①头上的乱蛇”。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嗑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希尔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1825年，雷斯太勃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勃罗姆·洪·勃隆太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于里于斯·裴奈狄脱说他无异“李尔王”^②。

鲁特维克·范·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篷恩^③，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弗拉芒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尔德^④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4岁时，他就被整天的钉在洋琴^⑤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运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11岁，他加入戏院乐队；13岁，他当大风琴手；17岁，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她是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17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金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篷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勃罗宁一家。可爱的爱莱奥诺·特·勃罗宁比他小两岁。他教

① 梅杜，又译“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直视其目光者就会化为石头。

② 李尔王，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主人公。

③ 篷恩，现译作“波恩”。本文译于20世纪40年代，所以有些地名、人名、术语与今天通用的译名不甚一致。

④ 莫扎尔德（1756—1791），现译作“莫扎特”，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⑤ 洋琴，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

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爱莱奥诺嫁了韦该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该勒、爱莱奥诺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篷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富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篷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阴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20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里，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pǐ）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篷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奥洛葛·希那哀特^①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篷恩得悉巴斯蒂狱^②攻陷时，希那哀特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③，鼓起了学生们如醉若狂的热情。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④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1792年11月，正当战事^⑤蔓延到篷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⑥军队。无疑的，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1796与1797两年内，他把弗列特堡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阙是《行军曲》，一阙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还，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裴那陶德^⑦。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史丹霍塞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葛冷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那帕

① 奥洛葛·希那哀特，生于巴维亚邦，为斯塔斯堡雅各宾党首领。1794年，在巴黎被处死。又译作“奥洛格·施耐德”。

② 巴斯蒂狱，现译作“巴士底狱”。

③ 诗的开头是“专制的铁链折断了……幸福的民族！……”

④ 按从前著作法，印书时必须先售预约。因印数不多，刊行后不易购得。

⑤ 战事，指法国大革命后奥地利为援助法王室而发动的战争。

⑥ 黑森为当时日耳曼三联邦之一，后皆并入德意志联邦。

⑦ 裴那陶德，法国元帅，在大革命时战功显赫。又译作“贝那尔多特”。



脱^①充满着野心的火焰。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pìnì)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25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特·裴恩哈特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该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1796至1800年间，耳聋^②已开始它的酷刑。耳朵日夜作响；他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折磨，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1801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该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芒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愿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

他写信给韦该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③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最可怜的……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全集卷十三的《悲怆朔拿

^① 波那帕脱，拿破仑的姓，现在多译作“波拿巴”。

^② 1905年5月15日德国医学丛报上克洛兹·福莱斯脱的文章认为，这种病是受一般遗传的影响，也许与他母亲的肺病有关系。他分析贝多芬1796年时所患的耳咽管炎，到1799年变成了剧烈的中耳炎，因为治疗不善，随后成为慢性中耳炎，随后耳聋的程度逐渐增加，但从没完全聋，他对于低而沉的音比高音更易感知。在他晚年，据说他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内，一端咬在牙齿中间，用以在作曲时听音。1910年，柏林莫皮脱市立医院主任医师约各勃逊发表文章，说他可以证明贝多芬的耳聋是源于梅毒的遗传。

^③ 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作家。

大^①》(1799年)，尤其是全集卷十(1798)之三的朔拿大中的Largo。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1800)、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乐》(1800)，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体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乐》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的目光。那是鲍梯却梨^②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③的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该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尔德，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裘安^④》。他的密友兴特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地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的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琪丽哀太·琪却尔第，为她题赠那著名的全集卷二十七之二的《月光朔拿大》(1802)。他写信给韦该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1803年11月，她嫁了伽仑堡伯爵。——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

^① 朔拿大，现称“奏鸣曲”(sonata)，是一种多乐章的器乐套曲。由三四个相互形成对比的乐章构成，用一件乐器独奏(如钢琴奏鸣曲)或一件乐器与钢琴合奏(如小提琴与钢琴合奏的小提琴奏鸣曲，长笛与钢琴合奏的长笛奏鸣曲)。

^② 鲍梯却梨(约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又译作“波提切利”。

^③ 幼婴，指儿时的耶稣，故有未来悲剧之意。

^④ 唐·裘安，为西方传说中有名的好色之徒。又译作“唐璜”。



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①。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了！什么时候，噢！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25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点儿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2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曲的朔拿大（全集卷二十六）；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朔拿大》（全集卷二十七之二）；全集卷三十一之二的朔拿大，——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帝的提琴朔拿大（全集卷三十）；《克埒采朔拿大》（全集卷四十七）；依着伽兰尔脱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全集卷四十八）。至于1803年的《第二交响乐》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②。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乐》的Allegro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帝的朔拿大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③。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塞弗烈特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兴特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那帕脱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乐》波那帕脱^④（1804），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乐》（1805—1808）的终局，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阙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

^① 他的遗嘱中有一段说：“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又1810年5月2日致韦该勒的信中说：“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能完成善的行为时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于我自己的处决。”

^② 1802年霍纳曼为贝多芬所作之小像上，他作着流行的装束，留着鬓角，四周的头发剪得同样长，坚决的神情颇像拿破仑式的英雄，同时表现出一种拿破仑式的永不屈服的意志。

^③ 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指拿破仑于1793、1797、1800年数次战败奥地利，兵临维也纳城下。

^④ 《英雄交响乐》是以波那帕脱为题材而献给他的，最初的手稿上还写着“波那帕脱”这题目。这期间，他得悉了拿破仑称帝之事。于是他大发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愤慨之下，他撕去了题献的词句，换上一个含有报复意味而又是非常动人的题目：“英雄交响乐……纪念一个伟人的遗迹”。兴特勒说他以后对拿破仑的恼恨也消解了，只把他看作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伊加尔”。

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高丽奥朗序曲》（1807）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全集卷十八）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朔拿大》（全集卷五十七——1804），俾斯麦^①曾经说过：“倘我常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还有《哀格蒙》；甚至《降E调钢琴合奏曲》（全集卷七十三——1809），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全集卷二十六朔拿大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乐》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奥许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还屹立在科布楞兹与篷恩之间的山冈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实，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②。1805年11月，当《斐但丽奥》^③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是法国军佐于冷将军，巴斯蒂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勃高维兹家里，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的题赠。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军在勋勃洛。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侵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决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乐》，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乐》。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1806年5月，他和丹兰士·特·勃伦斯维克订了婚。她老早就爱上了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她的哥哥法朗梭阿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的。1806年，他在他们匈牙利的玛东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关于这些幸福的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特·勃伦斯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白斯打·罢哈^④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

“母亲和教士^⑤都已就寝；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充实。——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拣取石子，而看不见路上美艳的鲜花……’1806年5月，只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

^① 俾斯麦（1815—1898），德意志帝国宰相，执政期间执行“铁血政策”，故又有“铁血宰相”之称。曾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的劳白·特·葛台尔所著的《俾斯麦及其家庭》一书提到：1870年10月30日，葛台尔在凡尔赛的一架破旧的钢琴上，为俾斯麦弹奏这首朔拿大。对于这部作品的最后一句，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生的斗争与嚎恸。”他爱贝多芬甚于一切旁的音乐家，他常常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

^② 两次革命的胜利，指拿破仑曾两次攻陷维也纳。

^③ 《斐但丽奥》，又译作“菲德里奥”，是贝多芬唯一的歌剧。

^④ 赛白斯打·罢哈（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管风琴家。今译作“塞巴斯蒂安·巴赫”。

^⑤ 教士，欧洲贵族家庭，皆有教士供养。

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乐》，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她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塞弗烈特和葛里巴扎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浪漫底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乐》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量，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的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1810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乐》，那夏日的神明的梦——《田园交响乐》（1808），还有他自认为他朔拿大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狂风暴雨》感悟得来的《热情朔拿大》（1807），是他题献给丹兰士的。全集卷七十八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朔拿大（1807），也是献给丹兰士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朔拿大》：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能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的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吧……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①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丹兰士·特·勃伦斯维克还爱着贝多芬。

1816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阙“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内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



^① 贝多芬全名“Ludwig van Beethoven”。

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她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丹兰士曾把她的肖像赠与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地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忽儿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运命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1810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的？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又开始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1812年7月17日所写的说话。裴蒂娜·勃朗太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帝皇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1812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的浴场托帕列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①；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他。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威玛大公的枢密参赞^②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③。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纽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

^① 1811年2月19日他写给裴蒂娜的信中说：“歌德的诗使我幸福。”1809年8月8日在旁的书信中也说：“歌德与席勒，是我在奥雪安与荷马之外最心爱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幼年的教育虽不完全，但他的文学口味极高。在他认为“伟大，庄严，小D调式的”歌德以外而看作高于歌德的，只有荷马、普罗塔克、莎士比亚三人。在荷马作品中，他最爱《奥德赛》。莎士比亚的德译本是常在他手头的，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的《高丽奥朗》和《狂风暴雨》被他多么悲壮地在音乐上表现出来。至于普罗塔克，他和大革命时代的一般人一样，受有很深的影响。古罗马英雄勃鲁塔斯是他的英雄，这一点他和弥盖朗琪罗相似。他爱柏拉图，梦想在世界上能有柏拉图式的共和国建立起来。1819—1820年间的谈话册内，他曾言：“苏格拉底与耶稣是我的模范。”

^② 威玛大公的枢密参谋，这是歌德的官衔，指歌德。

^③ 全体的皇族，指奥地利王室，托帕列兹为当时避暑胜地，中欧各国王室贵族麇集之地。

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洛道夫^①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打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见，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而歌德也没有忘记^②。

《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是1812年在托帕列兹写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谐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采尔脱惶骇的爆发^③，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乐》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华葛耐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乐》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的庆祝会。在这阙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弗拉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务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乐》那么坦白，那么自由有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的欢乐。在《第八交响乐》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

1814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④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兴特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⑤的鼓动。1813年，他写了一阙《威灵顿^⑥战胜交响乐》；1814年初，写了一阙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许多君王前面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⑦写一曲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勃拉息斯·赫弗尔依着法朗梭阿·勒德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1813年法朗兹·克冷塑的脸型（Masque），活泼泼地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

^① 太子洛道夫，他是贝多芬的学生。

^② 歌德写信给采尔脱说：“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至极的人；他认为世界可憎，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聋子。”——歌德一生不曾做什么事反对贝多芬，但也未曾做什么事拥护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姓氏，抱着绝对的缄默。——骨子里他是钦佩而且惧怕他的音乐：它使他骚乱；他怕它会使他丧失心灵的平衡，那是歌德以多少痛苦换来的。

^③ 见采尔脱1812年9月2日致歌德书，又同年9月14日歌德《致采尔脱书》：“是的，我也是用着惊愕的心情钦佩他。”1819年采尔脱给歌德信中说：“人家说他疯了。”

^④ 维也纳会议，欧洲第六次反法同盟打败法国之后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名义上是为了维护欧洲和平，树立欧洲均势，其实是战胜国瓜分欧洲政治疆域和殖民地。

^⑤ 拿破仑于1812年征俄失败归后，1813年奥地利兴师讨伐法国，不久普鲁士也接踵而至，这被称为“独立战争”，亦称“解放战争”。

^⑥ 威灵顿，即惠灵顿。

^⑦ 攻陷巴黎，指第六次反法同盟军队于1814年3月攻入巴黎。



表现得最明显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法朗梭阿·特·勃伦斯维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①。”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这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华葛耐所痛恶的都城^②里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1808年，他很想脱离奥地利，到威斯发里亚王奚洛姆·波那帕脱的宫廷里去。但维也纳的音乐源泉是那么丰富，我们也不该抹煞那边常有一般高贵的鉴赏家，感到贝多芬之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1809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洛道夫太子、洛勃高维兹亲王、凯斯基亲王，答应致送他4000弗洛冷^③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地利。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在没有经济烦虑的时候才能整个地献身于艺术，才能产生这些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意使鲁特维克·范·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败坏了，时尚所趋的是洛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凯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李区诺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勃高维兹死于1816年。受贝多芬题赠全集卷五十九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斯基，在1815年举办了最后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爱莱奥诺的哥哥，斯丹芬·洪·勃鲁宁失和。从此他孤独了。在1816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从1815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还。最早谈话手册是1816年的。关于1822年《斐但丽奥》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说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

① 他在维也纳会议时写信给高卡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

② 华葛耐在1870年所著的《贝多芬评传》中有言：“维也纳，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全部的德国新教痕迹都已消失，连民族的口音也失掉而变成意大利化。德国的精神，德国的态度和风俗，全经意大利与西班牙输入的指南册代为解释……这是一个历史、学术、宗教都被窜改的地方……轻浮的怀疑主义，毁坏而且埋葬了真理之爱，荣誉之爱，自由独立之爱！……”——19世纪的奥地利戏剧诗人葛里巴扎曾说生为奥地利人是一桩不幸。19世纪末住在维也纳的德国大作曲家，都极感苦闷。那时奥地利都城的思想全被勃拉姆斯伪善的气息笼罩。勃罗克纳的生活是长时期的受难，雨果·伏夫终生奋斗，对维也纳表示极严厉的批评。——译者按：勃罗克纳与雨果·伏夫皆为近代德国大音乐家。勃拉姆斯在当时为反动派音乐之代表。

③ 弗洛冷，奥地利银币名，每单位约合1.5先令。

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友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 11 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两年以后，1824 年 5 月 7 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乐》^① 时，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员牵着他的手，把他面对着观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塞尔 1825 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丹兰士·勃伦斯维克说：“自然是他的唯一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1815 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顶着太阳，冒着风雨。“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安慰。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疲惫不堪。1818 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全集卷一〇六的朔拿大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斯普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 调弥撒祭乐》发售预约时，只有 7 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全部美妙的朔拿大，——每曲都得花费他 3 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 30 至 40 杜加。伽列青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全集卷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 1815 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心坎间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儿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品的弟妇争他的小卡尔，他写道：



^① 《合唱交响乐》，即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唯一的托庇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苦痛，你是鉴临的。请你听我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噢，神哪！救救我吧！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吧，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过活！……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摇撼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终了之日！”

然而，这个热烈地被爱的侄子，显然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弥盖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

“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无情义的酬报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吧！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回事以后，都将恨你……如果连系我们的约束使你不堪忍受，那么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实现！——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了；我已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之前……”

“像你这样娇养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决计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

但宽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也不必再说，——到我臂抱里来吧，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说话……我将用同样的爱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荣誉为担保，决无责备的言辞！那是毫无用处的。你能期待于我的只有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的忠诚的心上。——来吧，一接到信立刻回家吧。”（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写着：“如果你不来，我定将为你而死。”）

他又哀求道：“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植过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有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唯一的大路。你的忠诚的老父。”

这个并不缺少聪明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梦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经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由于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更为多见的怪现象，伯父的精神的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话语，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1826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不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件事情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而对于这伯父之死，也未始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竟没有在场。——几年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然而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为“儿子”的人。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 1793 年他在篷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响乐》内，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乐中去。我们应当注意《第九交响乐》的原题，并非今日大家所习用的《合唱交响乐》，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乐》。《第九交响乐》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束。1823 年 7 月，贝多芬还想给它以一个器乐的结束，这一段结束，他以后用在全集卷一三二的四重奏内。邱尼和仲拉哀脱纳确言，即在演奏过后（1824 年 5 月），贝多芬还未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要在一阙交响乐内引进合唱，有极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可从贝多芬的稿本上看到，他做过许多试验，想用别种方式，并在这件作品的别的段落引进合唱。在 Adagio 的第二主题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此可以很适当地开始。”但他不能毅然决然地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发现一个乐思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从未听见人声。”所以他把运用歌唱的时间尽量拖延；甚至先把主题交给器乐来奏出，不但终局的吟诵体为然，连“欢乐”的主题亦是如此。

对于这些延缓和踌躇的解释，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旋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的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摸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震撼了一刹那，这都城当时是完全在洛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势力之下的。贝多芬颓丧忧郁之余，正想移居伦敦，到那边去演奏《第九交响乐》。像 1809 年一样，几个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①，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给您的情操，渗透着您的心灵的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件作品，我们也知道您的伟大的交响乐的王冠



^① 新的圣乐，指《D 调弥撒祭乐》。

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近几年来的沉默^①，使一切关注您的人为之凄然。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艺术的产物之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竟默无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个的民族期待着新生命，新光荣，不顾时下的风气而建立起真与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使我们的希望不久实现……但愿靠了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加倍的繁荣！”这封慷慨陈辞的信，证明贝多芬在德国的优秀阶级中所享有的声威，不但是艺术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所想到的第一个字既非学术，亦非艺术，而是“信仰”。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撒祭乐》和《第九交响乐》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乐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蒙蒙眬眬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的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因此他已达到了终身想望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乐》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他未来的计划^②是：《第十交响乐》^③ 纪念罢哈的《前奏曲》，为葛里巴扎^④的《曼吕西纳》谱的音乐，为高纳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谱的音乐，《大卫与扫罗的祭神剧》，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代大师的清明恬静之境：罢哈与亨特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⑤。

史比勒医生于1826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葛里巴扎最后

^① 贝多芬为琐碎的烦恼、贫穷，以及各种的忧虑所困，在1816至1821的五年中间，只写了三支钢琴曲。1821年起他才重新工作。

^② 1824年9月17日致苏脱兄弟信中，贝多芬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得把精灵启示我而要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

^③ 《第十交响乐》，1827年3月18日贝多芬写信给莫希尔斯说：“初稿全部写成的一部交响乐和一支前奏曲放在我的书桌上。”但这部初稿从未发现。——我们只在他的笔记上读到：“用 Andante 写的 Cantigue，——用古音阶写的宗教歌，或是用独立的形式，或是作为一支追逸曲的引子。这部交响乐的特点是引进歌唱，或者用在终局，或从 Adagio 起就插入。乐队中小提琴，……等等都当特别加强最后几段的力量。歌唱开始时一个一个地，或在最后几段中复唱 Adagio——Adagio 的歌词用一个希腊神话或宗教颂歌，Allegro 则用酒神庆祝的形式。”由此可见以合唱终局的计划是预备用在第十而非《第九交响乐》的。后来他又说要在《第十交响乐》中，把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调和起来，像歌德在第二部《浮士德》中所尝试的。

^④ 葛里巴扎（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今多译作“格里尔帕策”。

^⑤ 贝多芬的笔记中有：“法国南部！对啦！对啦！”——“离开这里，只要办到这一着，你便能重新登上你艺术的高峰。……写一部交响乐，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天，为了旅费工作着，然后周游意大利，西西里，和几个旁的艺术家一起……”



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丧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葛里巴扎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箝（qián）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克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到。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1827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前面也是如此。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1826年11月完成的作品，全集一三〇的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希尔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1826年11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1827年1月3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该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①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1827年2月17日，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场”，——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

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1827年3月16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恶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地沟通之

^① 你的洛亨，即韦该勒夫人爱莱奥诺的昵称。

下，他竟感染了自然的深邃的力。葛里巴扎对贝多芬是钦佩之中含有惧意的，在提及他时说：“他所到达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犷野与古怪的原子混合为一。”舒芒提到《第五交响乐》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像，虽然时时发生，总教人充满着恐惧与惊异。”他的密友兴特勒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不错的：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怕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乎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们的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二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飙中重新出现。即是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犷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合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挟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乐》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给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那帕脱的哪一场战争，奥斯丹列兹^①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思考与探究

1. 传记结尾用诗化的语言总结了贝多芬的一生，认为他的一生是“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联系下面的句子，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 (1) 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 (2) 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
- (3)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 (4) 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 (5)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① 奥斯丹列兹，现译作“奥斯特里茨”，拿破仑1805年12月大获胜利之地。

(6) 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

2. 课文几次写到贝多芬的肖像，无论是直接的描写，还是转述画像，都很有特色，传神地刻画出贝多芬的精神气质。找出这些描写，认真加以体会。

3. 评传的特点是史述与评论紧密结合。这篇传记在叙述传主的生平经历时，经常引用传主的书信、自述以及朋友的回忆录等材料，把作者本人的情感与评价自然地融入历史叙事中的。试举其中某一段落细加分析。

拓展与实践

结合阅读传记中有关贝多芬几部代表性交响乐的评论以及作品写作背景的描写，欣赏一段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并把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写下来。

有关资料

1. 相关传记作品

《贝多芬：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秦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贝多芬传》，[英]大卫·温·琼斯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贝多芬百年祭》，[美]萧伯纳，《世界文学》1979年第6期

2. 关于作者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小说家、戏剧家和散文家。幼年就酷爱音乐与文学。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艺术史教员，同时开始戏剧创作，有《丹东》《七月十四日》等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作品。1902年以后转向名人传记写作，要“让世人呼吸到英雄气息”，有《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传记问世。尤其是《贝多芬传》，强调自由精神以及向命运挑战的勇气，由于作者在音乐方面有精湛的修养，真正能带领读者走进贝多芬的艺术世界，这部书成为世界传记史上的名作。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的又一部代表作，作品张扬英雄主义的主调，反映世纪之交风云变幻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后饮誉欧洲，在中国读者中也曾经赢得很高的赞赏。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母与子》、传记《甘地》等。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四课

达尔文



兴趣与恒心是科学发现的动力

——欧文·斯通



- ◆ 我习惯于勤奋劳动和专心致志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所思考和阅读的一切，和我所见到的和可能见到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训练，我才能在科学方面取得现在的成绩。
- ◆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后来对我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喜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阅读提示

“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世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这种看法长久以来一直作为不容置疑的信条，主宰着人类的思想。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如同一声惊雷，极大地动摇了这种神权统治的观念，打破了对生命探求的思想禁锢。达尔文用大量事实证明了生物变异的普遍性以及变异和遗传的关系，提出了物种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中不断变化，经历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这种进化学说，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虽然达尔文在当时也因为“亵渎神灵”而受到教会和偏执盲从的保守势力的围攻，饱经凌辱，但他毕竟是幸运的。他看到了通过自己千辛万苦建立的学说，终于把生物学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基础上；而一个半世纪以来，达尔文进化学说中最精要的部分，也已经成为一种通识。

达尔文早年学习成绩平平，父亲对他非常失望，指责他除了打猎、养狗，就是到处闲逛，收集动植物标本，担心这样下去他会一事无成，给全家丢脸。但达尔文在博物学方面找到了他的兴趣，便如痴如醉毕生投入其中。先是随探险船做了五年艰苦而又神秘的环球考察，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来又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的研究，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生物进化论。晚年的达尔文曾经坦言自己资质一般，那么他成功的秘密何在？在于兴趣与恒心。达尔文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喜欢思考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了解事物的真相，从中学到了许多“发现的快乐”和“创造的快乐”。他不怕任何困难的阻挠，也不在乎任何反对的声音，吸引他的只有科学的事实。

关于达尔文的传记不少。这里提供给同学们的是美国作家欧文·斯通《达尔文传》（叶笃庄、冷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一部分。原书分上、下两卷，篇幅较长，这里节选了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部分内容，主要记述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写作过程。标题为编者所加。和这本教材中所选的其他传记不同，欧文·斯通这部《达尔文传》是小说化的传记。他在史实的基础上有些合理的推测与想象，以更好地深入到传主的精神世界，描写达尔文的科学探究生涯，包括对生活、大自然和美的感受，让我们更全面了解这位科学巨人。

他把材料汇集在一起，这件麻烦事用去了他两个多星期的时间。5月14日他坐进他那张大椅子，把他的写作板横跨在两只扶手上。过去，他一向是顺手抄起一张纸就在上面写草稿的；现在要写的可是一份正式的原稿了。他从架子上取出一沓8英寸×12英寸的对开纸，把墨水缸放好，拿起笔来开始写道：



如果能正确地了解我们对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许多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无知，那么，对物种和变种的起源迄今仍得不到很多解释，我们就不应大惊小怪了。谁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物种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而另一个同源的物种却分布狭窄、为数稀少呢？这种关系具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决定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物当前的安乐，我认为，还决定着它们未来的成功和变异。至于许多过去地质时代中无数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所知的就更少了……

笔和纸迅速在飞动。他只在纸的一面写，但有时会翻回来一页，在其行间写。如果有哪个想法不合他的意，他就用笔把它划去。他用许多符号作为插入语，在页边的空白处加上一些短语，有时把纸页翻过来，在背面附上一段话。他还用铅笔草草写下一些提醒自己的话，如“让赫胥黎^①读这部分”等。他还把字条别在或贴在纸页上。

他的笔体，正如他所说的，是“一塌糊涂”，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思维和构句是严密的。一位文书将会给他誊写一份清样。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拼字和标点符号并不一致，但这也用不着担心。他的一项任务是要做出强有力的、清楚易懂的立论，同时还要承认它有欠缺、保留和难于说明的地方，以证明他的假想，哲学家们称它为“神秘中之神秘”。

在放松脑筋的时候，他就在地里干些杂活，如观察在大树根部周围生长起来的植物。他给孩子们看那29株从一大汤匙泥土里长出来的植物，——这一汤匙泥土是他从小池塘里挖来的——使孩子们大惊不已。

法国人说：“当吃的时候才有食欲。”英国人则说：“当写作的时候才有思维。”7月中旬之前，在他连续写了两个月之后，他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写信给赖尔^②说：

我刚刚完成了如下工作：非常详细地证明了在冰川时期热带地区的寒冷现象，因而引起的有机体的迁徙……它和物种的变异是一致的。

在给胡克^③的信中， he说道：

关于大自然这种笨拙的、浪费的、慌手慌脚的和极端残酷的工作，一位魔鬼的牧师可能写出怎样一部著作啊。

他和约瑟夫·胡克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他们互敬互爱，一有机会就在一起相聚，每隔几天互通长信，可是他们还继续攻击对方的信仰。现在，查理正蜷缩在书房中的那把舒适椅子上，对一向忍耐的胡克发起了一连串的轰击，他质问：

你十分郑重地谈到了在上帝直接行动下所产生的多重创造作用，以反对我的观点。只要有这样一个事例能够得到证明，我就要彻底被粉碎；但我试图尽最大努力找出那些足以驳倒我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例。

现在我要求你做一件事；这几乎是求助于别人的最大恩惠了：请你通读一下我写

① 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进化论的积极支持者。

② 赖尔（1797—1875），查理·赖尔，英国地质学家，他对于“均变说”的确立起了极大作用，而这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有很大影响。但他对进化论始终存有怀疑——特别是提到人类时。

③ 胡克（1817—1911），约瑟夫·胡克，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

的有关阿尔卑斯山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北极和南极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以及假想的寒冷的开天辟地时期，大约有 40 页！！但已缮写清楚。这对我确有极大裨益，否则，我肯定要在植物学方面出差错。

这 40 页几乎占据了他原来打算写的那“薄薄一卷”的一半。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注意到自己的那堆手稿一英寸一英寸地增高。

“很好，”他给自己找根据说，“我的材料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小薄本容纳不下的。”

赖尔写来的几封信表明，他“在物种的可变性方面，正在以火车的速度改变看法”。

7 月中旬，赖尔允许查理在其打算写的那本书的前言里表明赖尔赞成这项工作。查理对此欣喜万分。查理·赖尔爵士赞成探讨物种起源这件事本身，对科学界同行们该是多么大的震动啊！这一举动会使这本书的信誉大增。要知道，这一探讨的深入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医生^①、法国科学家拉马克^②和居维叶^③的探索性工作，当然也大大超过了罗伯特·钱伯斯^④写的那本已经问世 12 年却依然没有受到重视的《痕迹》。但是，他要待到何时才发表它呢？他已经写到一百多页了！

当查理再次遇见胡克时， he 说道：

“当我们都躺在坟墓里之后，那时进化的法则将被认为是博物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博物学该是多么伟大的一门科学啊。”

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这封信，他收到了阿萨·格雷^⑤的一封来信，邀请他赴美讲学，并给他提供来回乘汽轮的费用。

于是，他的研究工作一时被排除在思想之外，他的心思又回到了年轻时随“贝格尔”舰的那次航行；他躺在船尾舱的帆布吊床上，一点点地咬着他父亲指示他吃的饼干和无核葡萄干，滚滚波涛在他的身下起伏激荡。

查理哪儿也不去。他除了写稿之外，还把各种植物泡在盐水里，并研究鸽子和兔子。他注意到了家兔骨骼的差异，并暗想：以前竟没有一位动物学家认为家畜和家禽骨骼构造上的真正差异是值得注意的，这岂不是怪事。他越来越相信，人们以哲学精神从事植物学的研究远远胜于对动物学的研究。如果没有植物学家的赞同，他简直不愿相信动物学方面的一般意见。

他一直在全天工作，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不舒适的感觉。他身体上的唯一问题是腰部风湿痛的隐隐发作，这使他感到后背僵硬。他决定在春天到附近的慕尔公园里的水疗机构去治疗两个星期。他再也不想去莫尔文了，因为小安妮^⑥就埋葬在那里的墓地中。

^① 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医生，达尔文的祖父，虽为职业医生，但兴趣广泛，曾出版《动物生理学》一书，其中有对进化论诗一般的论述。

^② 拉马克（1744—1829），法国植物学家，较早的进化论者。

^③ 居维叶（1769—1832），法国自然学家、古生物学家、解剖学家。

^④ 罗伯特·钱伯斯（1802—1871），英国科学家、出版商，曾出版《遗迹》（又称《创造的痕迹》）一书，断言地球不是上帝专门制造的，并提出环境因素引起生物进化的理论。

^⑤ 阿萨·格雷（1810—1888），美国植物学家。

^⑥ 小安妮，达尔文的女儿，很小就夭折了。



在秋季的几个月里，他在继续写作。他已经堆积了好几百张经过仔细论证的纸页。此外，他还给饲养家、杂交育种家和旅行者们写了一封封的调查长信，其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仅通信一项，就足以使任何一个英国人精疲力竭。

他开始论述他最熟悉的题目：在家养下的变异。他指出了饲养者们如何在选择原理的指导下，改变了他们的牛、羊、竞跑马、扇尾鸽和凸胸鸽的品种。

植物界的情形也是一样。例如，玫瑰、大丽花、三色堇和其他花卉同其亲本相比，无论花朵的大小还是色泽都大大超过了后者。各种蔬菜、梨树、苹果树、草莓，由于园艺者们的精湛技艺，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只要有偶然发生的稍微好一点儿的变种，这些人就会把它们挑选出来加以培育。

10月13日，他写完了“在家养下的变异”一章和“地理分布”一章的一部分。为了保险起见，他带着这部分手稿去请教胡克，在他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9点30分匆匆赶到火车站，差点儿没赶上回家的火车。

他研究了一阵子鹰类，随后又把注意力转向种子漂渡大洋后的散布。在一只鹰胃里贮存了18个小时的一些种子，当被取出后，还是那样新鲜，以至查理把它们播种下去后，长出了两株橡树、一棵三叶草和一株甜菜。他在散步的时候，检查过小鸟的粪便，结果发现有6个不同种类的种子。他还发现，在一只山鹑的一只爪子上有许多干泥巴，大量的活种子可以裹在其中被带走。当他想到数以百万计的迁移性鹤鹑时，在他看来，如果某种植物的种子不会被这些鹤鹑横越海湾运走，那就真是奇怪呢。另外他还有一些种子是在一只猫头鹰的胃里待了两个半小时后被取出来的，也发芽了。他的几位鸟类学方面的朋友向他保证说，猫头鹰带着种子，“天晓得可以飞多少英里，在暴风雨中恐怕能飞四五百英里吧”。

他听完后，得意地大喊一声：“好哇！”

尽管他想竭力缩短篇幅，可还是把每一章都写得异乎寻常地长；他对这种讨厌的局面不满意，可是也无能为力。他目前写的是第三章，关于能育性和不育性的原因，还有自然界中的杂交，其篇幅竟达到100页稿纸；尽管这样，他并不觉得哪一页是多余的。

12月中旬，查理完成了第三章，这篇幅很大，题目是：“论一切有机体杂交的可能性——论生殖的易变性”。他之所以进展神速，其原因之一是他使用了写在1837年笔记本上的那些有用的材料，以及1838年2月到7月间写的第二个笔记本中那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这叫自我剽窃，”他沉吟道，“既然目前我不能把这些段落写得更好，何不就用原来写的呢？”

他用了1857年1月份的全部时间写完了第四章：“在自然状况下的变异”。由于是把材料按照严密的逻辑进行安排，这一工作的强度和紧张度把他搞得心力交瘁。他向埃玛^①坦白说：

“我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① 埃玛，达尔文的妻子。



“你太拼命干了。”

“有什么办法呢？这本书的篇幅将会很长。我的意思是尽可能把初稿写得完善一些。我就像大财豪克罗苏斯一样，被淹没在我的万贯家财里了。^① 我一直在服用书刊上介绍的几种无机酸；我认为有点儿效。”

埃玛建议他去距离这里只有 40 英里的慕尔公园的水疗胜地去度假，马上就去，而不要等到春天。

“我怎么能丢下我的写作和实验呢？”

她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

“查理，我的心肝，难道这一切不是有点儿自我主义的味道吗？你恐怕不是想通过这本书来追求声誉吧？”

查理把一侧的肩膀向下歪了一下，仿佛在说：“谁知道呢？”

他接着说：

“我不过是对我课题深深感到兴趣而已。尽管我希望不像现在这样地看重虚名，不论是今天的还是身后的，都不要看重。但是，我认为凡事都不要走极端。我心里明白，即使我知道我的书永远得匿名发表，我也会同样苦干下去的，虽然不会有那么高的热情。”

查理曾屡次邀请现任海军少将罗伯特·菲茨罗伊和他的妻子来“达温宅邸”做客。菲茨罗伊的前妻玛丽·奥布赖恩已经去世，给他留下四个孩子。后来，他又娶了一个表兄弟的女儿为妻。菲茨罗伊夫妇接受了邀请，查理期待着同他的老友共叙在“贝格尔”号上同甘苦、共患难多年的友情。但是菲茨罗伊很快就暴露出他是为另一个目的而来的。两个人来到书房，查理拉过一把阶梯式横档靠背的椅子请菲茨罗伊坐下。菲茨罗伊显得衰老多了，他的头发已经斑白，眼神看上去也很迟钝。但他仍然是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汉。

“达尔文，你还记得 1834 年 4 月，我们坐着捕鲸船式的救生艇，沿着圣克鲁斯河逆流而上的那次旅行吗？那里有些平原是由埋置在洪积层岩屑中的滚石构成的，当穿过这些平原时，我对你说，‘这绝不可能是一次 40 天洪水造成的结果’。”

“我还记得。这段经历出现在你的书的最后一章里。”

“那是由于我当时对《圣经》了解甚少；是由于我对经文一无所知。关于你的某些理论，我已经听说了。你在逐字否定《创世记》里面的事，是吧？”

“是大自然否定了它。我不过是把我的观察材料记录下来而已。大自然是从不会扯谎的。”

“那么，就是《圣经》扯谎啦，是吧？你的理论真是骇人听闻。”

“全世界范围内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这个星球有千百万年的历史。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进化了、变异了，并适应了个体过剩、食物来源、天敌、气候等环境条件。许多物种由于不能及时适应而灭绝了。你见过蓬塔·阿尔塔的化石骨骼吧。有些物种由于需要适应而变异得异常剧烈，以致它们的内脏——更不用说它们的外表了——在几千年的

^① 形容他占有材料之多。

岁月中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到今天面目全非了。目前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任何生物，都是生存下来的最善于适应者。”

菲茨罗伊的脸涨红了。

“而且你是不是得出结论说，人类在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处于幼稚或野蛮状态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可理解的。在无感觉地生存几个小时之后，人类肯定就要夭折了。我认为唯一合理的概念是，人类一被创造出来，就在身心两方面都是尽善尽美的，并且通过灵感知自己所必须履行的职责。”

菲茨罗伊接下去解释道：在文明状态下离开小亚细亚的第一批流浪者，不久之后就缺少纸笔和衣服，他们的后代只被教会维持日常的生活，于是就从他们最初的完美状态一步步地退化，最后变成了野蛮人！

他的面孔变得狰狞起来了。

“难道我们有丝毫的根据可以认为野生动物或野生植物自从被创造之后曾经有过改进吗？任何有理性的人能相信一个种族、物种或种类的最初状态是最低级的吗？要真是那样的话，那些冒牌的哲学家们怎么一下子就能设想出，各野蛮种族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被分别创造出来的呢？……”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摩西的创世纪叙述是同洪水的叙述密切相联的。摩西的知识是超人的。他宣称光的创造先于太阳和月亮，这是得到神的启示的。《创世记》的第一章不是说了吗？‘上帝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到了第十六节，不是这样说吗？‘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

查理无心同他的客人争辩，更不要说客人还是他从前的船长和现在的朋友。他用安慰的语气说道：

“朋友，我可不希望诋毁《旧约全书》中这些极妙的诗句。我同任何人一样珍视它在诗歌艺术上的价值……”

然而毫无用处。菲茨罗伊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他逐章逐节地引经据典，以证明《创世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正确的，上帝的造物是完美无缺的。查理深深地陷进他的座椅，把它当做暴风雨中的一个藏身洞。菲茨罗伊的前妻是笃信宗教的，莫不是他通过捍卫她的信仰来悼念她吧？

菲茨罗伊猛然中止了“布道”。查理跳将出来。

“来，先生，我们去散会儿步吧。肯特郡的这个乡村是全英国绿波荡漾的最好草场之一。回来后，我们可以坐在起居室的炉火前面吃点热奶油烤饼和茶。我很愿意更熟悉一下你的玛丽亚。”

他的亲切好客使这一天平安度过了。在吃茶和晚饭的过程中，他保持谈话不断继续进行。埃玛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头，于是她就在他们俩没说话的时候谈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第二天早晨，菲茨罗伊夫妇起程回伦敦，查理派人用他的四轮马车把他们送到附近新建成的贝克纳姆火车站。在大门前，菲茨罗伊绷着脸短促地握了握查理主动伸过来的手。他们走后，查理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有一种难过的预感：再也见不到我的这位至高无上的罗伯特·菲茨罗伊了。”

工作在进展着。1857年3月3日，他完成了第五章“生存斗争”。仅仅过了四个星期，他又完成了关键性的第六章“自然选择”。他对自己无法控制每天的工作量而感到烦恼。他对埃玛说：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决不知道在夜晚降临之前会完成多少材料。”

“为什么不采用你的‘沙径’计算法呢？”埃玛提议，“在开始工作之前，先决定你想完成多少页，再把一定数目的燧卵石放在一起；每当你完成了一轮工作，就踢掉一颗石子。当一颗石子都不剩了，就说明你一天的工作完成了。”

“埃玛，你真是个天才。但愿想透一个观点就像围着沙径绕一圈那样容易就好了……”

然而埃玛的主意至少还是暗暗地启发了他。每当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了一个问题，并对他所依据的参考材料做了脚注后，就把一颗小石子从他自我规定的工作堆上踢掉。

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查理来到萨里郡慕尔公园里的水疗疗养院就医，这里距奥尔德肖特不远。他很喜欢爱德华·莱恩医生、他的太太和他的岳母，那所疗养院就是他们开的。他们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治疗方法是和缓的，每天进行一次浅水冲洗和一次坐浴。

在乡间散步是惬意的。到了第一个周末，他惊异地发现，过去的几天对他的健康太有益了。他再次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能治愈慢性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水疗。他一本书也没有带，也没有在他的物种锦缎上绣过一针一线，于是他觉得身体很快好起来了，便决定在5月1日，也就是他在慕尔公园的第二个星期的第一天，给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斯^①写一封回信。华莱斯的信是去年10月10日在西里伯斯岛上写的，西里伯斯岛隔马卡萨海峡同婆罗相对。这封信经过了五个半月左右的辗转，在查理即将动身去慕尔公园之前，寄到达温。他在给华莱斯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我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想法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相似的结论。关于《年刊杂志》刊登的大作，我赞同其中几乎每一个字所包含的真理；完全赞同任何一篇理论性的论文，是很少见的，我敢说您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可悲的是，从完全一样的事实出发，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不同结论。关于物种和变种彼此之间是怎样地而且按照什么途径发生差异这一问题，自从我打开第一个笔记本以来，到今年夏天，已经研究20年了。目前，我正准备发表我的著作，我发现这个题目太大了，尽管我已经写了许多章，但我想，在两年内还不会出版的。我没有听说您打算在马来群岛待多久；我希望在我的著作问世之前，能够看到您的《游记》先行发表，这可以使我获益匪浅，无疑您会在书中列举大量事实的……

在他疗养的第二周，他经常生气勃勃地在萨里的乡间做长途徒步旅行，一路观察动物对植被的作用。早在八九年前，一部分苏格兰老冷杉树丛生的公地就被围起来了。在这部



^① 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斯（1823—1913），又译作“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英国博物学家和动植物标本收藏家，他也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原理。

分围地内，许多小树拔地而起，看上去好像是由人工栽种似的，因为其中大量的小树都是同龄的。而在那部分尚未围起的公地里，他在几英里范围内都找不到一棵小树。他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在石楠属灌木丛生的荒地里仔细观察了一阵，他又看到了数以万计的苏格兰小冷杉树；每平方码就有 30 棵，树顶已被偶然在这些荒地上漫游的牛群啃光了。他对约瑟夫·胡克发议论道：

“这是个多么奇异的问题啊；在一平方码的草地上决定每种植物的种类和比例的力量有多么巨大的作用啊。然而，当某种动物或植物绝灭的时候，我们还是大惊小怪的。”

在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他感到体力恢复了，精力也充沛了，于是他告别了莱恩大夫一家。

家里来接他回去的马车已经在头天晚上赶到了。不过当天晚上他一回到“达温宅邸”就感冒了。当他翌晨走进书房时，他感到的不适竟同他离家去慕尔公园之前一样严重。他开始呕吐了。他不得不向埃玛承认：

“我们的表兄，也是我们的反对者亨利·霍兰医生好像是对的。当我在令人愉快的疗养胜地度假，在礼貌好客的主人照料下，在乡间漫步时，显著地我感到身体好极了；可是当我一开始工作，我的健康就每况愈下了。”

“有什么办法呢？”

“只有发牢骚。我担心我的头脑再也经不起思维了。但是我宁愿当一个不幸的、可怜的病人，也不愿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乡绅那样活着。”

他的范围广泛的兴趣是无穷无尽的。他设法弄清楚，任何品种的猪同中国猪或那不勒斯猪杂交后，能不能生出纯种猪来。随后，他又研究了马、驴和斑马的古代祖先的毛色和斑纹。在他的草地里，他种了 16 种不同的种子，其中 15 种发了芽。在一小块两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地里，他每天给每一棵野草的实生苗做标记，这些实生苗已出土三个多月了。其中 357 株已经给吃掉了，主要是蛞蝓(kuòyú)干的。

什么动物吃蛞蝓呢，是行动缓慢、浑身黏滑的腹足纲软体动物呢，还是陆地小动物、爬行动物或鸟类呢？……这真是一场生存斗争，他的第五章就是以此为题的。在整理手稿的这部分内容时，他猛然想出了个副标题：“动物和植物的相互抑制”。他念着自己的手稿：

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的几乎全是动物抑制动物增加的方式。但是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重要，就像植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那样……所有动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以植物为生；而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又是植物的主要食物；所以，植物界和动物界之间有着巨大规模的联系，这是非常明显的。人们起初设想，草食动物吃一切相像的植物；但是对瑞典植物的研究表明，牛吃 276 种，拒食 218 种；羊吃 449 种，拒食 216 种；猪吃 72 种，拒食 271 种，等等。从拉普拉塔往南，对放牧牛群所引起的平原外貌的变化，我同别人一样感到惊讶。有一段时间我简直相信这块地方之所以如此，一定是因为发生过地质变化。许多小啮齿动物赖以生存的是哪些植物，还知道的不多，但是大家都一定听说过鼠和兔把整片种植园毁掉的情况……我有时设想，沙漠平原上灌木的多刺性是十分常见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比较有效地防



止那些必须以灌木为生的动物的吃食……弗斯卡尔也详尽地阐明了那些没有被牛群吃掉的植物在极大程度上遭到了昆虫的侵袭；有时竟有 30 到 50 个物种吃食一株植物。我设想，一种昆虫也吃、四足动物也吃的植物就要绝灭……

日月如梭，一晃眼，查理就到 48 岁了。他尽力使有关部门把“皇家勋章”授予年轻的科学家，以鼓励和促进他们的工作，而不主张把勋章授予年老的学者作为奖赏。科研工作犹如走山道，一路上布满了乱石和坑洼。昆虫对雌株冬青和其他植物的授粉是完全无效的，在自然界的错综复杂的构成中，这一过程与其说是毁灭生命，莫如说是赋予生命。他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研究。凡是在某种动物或植物的领域中还不曾有过目录时，他就亲自动手进行汇编。这是一项长期的、乏味的工作，稍不留心就会出错。当约瑟夫·胡克指出他编的植物区系目录之一并不完全时，他伤心地说：

“有时候我像你一样，从心里瞧不起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编辑者，虽然我并没有瞧不起我的全部工作。”

在划分新西兰的植物区分时，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认为是适用的分类法。他的聪明的邻居、非正式的学生、约翰·卢伯克爵士的年方 23 岁的银行家兼博物学者的儿子指出，他用这个分类法把一些属搞混了。他喊道：

“你使我避免了一个多么丢脸的大错啊！否则我非得撕掉全部手稿，绝望地放弃这项工作不可。衷心地感谢你。”

一向机警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托马斯·赫胥黎叫他注意，他支持的那个他所宠爱的理论是错误的。他对生气勃勃的赫胥黎说道：

“噫！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应有任何愿望，只应有铁石般的心肠。”

当轮到查理抓住通常一丝不苟的赫胥黎在假设中的一个错误时，他笑着大声说道：

“看到我把自己变成一个吓唬你的妖怪，我很开心；在我写完一个尖刻的但恰如其分的判决书后，你一定不高兴看到，我像恶煞般地抬起我的脸。”

由于查理在 1856 年 10 月亲切地答复了艾尔弗雷德·华莱斯寄自西里伯斯群岛的信，华莱斯又先后给他写了几封详尽的长信，这使查理开始觉察到，华莱斯已逐渐相信查理·达尔文是他的同志和朋友了，特别是自从查理愿意和他探讨物种理论以来，尽管是有限度地，他也对这点更加相信了。1857 年底，查理埋头写这部书已经一年半了，这时他意识到，当年赖尔、胡克和赫胥黎敦促他把自己的发现写出来，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呀。华莱斯的最近一封信是在 1857 年 9 月 27 日写的，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发表在《博物学年刊杂志》上的那篇论文中的叙述和图解，其实不过是为详细证明它的尝试揭开序幕而已；我已经安排好了方案，实际上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华莱斯已经掌握了他的物种理论的证据！他已经把它写出来了！但肯定不会是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吧？这样的巧合大概是不可能的：人类在经过数千年对自然法则的思索和论述之后，竟然会有两个人在历史的同一时刻偶然得出同样透彻的结论。假如华莱斯真的取得了查理·达尔文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已经把它写成了论文，那么，

华莱斯对“万谜之谜”的解答，岂不会登载在某一期刊的大量篇幅上并在几个月内寄到“达温宅邸”来吗？

他伫立在书房的窗前，向外凝望，眼睛正对着窗外的燧石围墙，却视而不见。好久，他的心绪才逐渐恢复了平静。

“我必须立即答复艾尔弗雷德·华莱斯，”他自言自语道，“并且十分明白地表示我对他的敬佩。勇敢的人啊，我期望他在那个原始的地方再待上三四年！”

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杂种状态”那一章。1858年年初，他开始写“动物的智力和本能”。他有堆积如山的材料需要筛选和核对；在这些材料中，不仅有他自己多年的观察结果，还有用一二十种文字写成的著作和论文。本能，真是一个奇妙的领域。他对埃玛说：

“我发觉有关本能的这一章很复杂。作者们在本能的定义上一直是众说纷纭，各执己见的。其实这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差不多每一种激情，以及那些诸如勇敢、胆怯、怀疑等最复杂的性情，也常常被说成是本能。”

他被卷入这个问题越深，他觉得身体状况就越差，特别是在夜间他本应该熟睡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打扰他。他对胡克议论道：

“哎呀，健康，健康，你真是搅得我日夜不得安宁的魔鬼；你夺去了我一切的生活乐趣。”

接着，为了不给人留下自怜的印象，他又补充说道：

“请原谅，我不应该这样哀叹，这是十分愚蠢和虚弱的表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沉重负担。”

使他忘掉自己身体困境的一种方法就是读新出版的通俗小说和伦敦《泰晤士报》。每星期，当达温村的信使去伦敦时，达尔文夫妇总是交给他一张打算买的或从图书馆借的书单。这一年的时光就像泰晤士河那样无情地缓缓流去了。

在他写的这本书里，“论本能”这一章是最激动人心的，同时又是最伤脑筋的。他把这方面的许多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因为这些故事确是些十分奇异的：蜜蜂建造的蜡质蜂房，显示出它们数学上的判断力是不可思议的。蚂蚁之间交流信息的能力，在和同一物种其他巢穴的蚂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使它们总是能够识别出自己的同伴。蜗牛的智慧表现在找到更好的草场后便返回去叫较弱的同伴，引导它们沿着一条事先分泌在路上的黏液直奔食源。牡蛎的智慧表现在它们从水里被取出后，便敏捷地闭上贝壳，以使自己多活一些时候。河狸总是积攒碎木，即使在不可能筑水坝的干燥地区也是如此。白鼬总的本能表现在专门咬老鼠脑袋的后部（即延髓），这正是最易置老鼠于死地的部位。查理还给孩子们讲了穴蜂如何在把食物带进穴里喂幼虫之前，先把食物丢下来巡查它们的洞穴；小牧羊狗如何在没人教的情况下，天生就会围着羊群跑来跑去，把它们拢在一起。此外，他还讲了幼鸟飞越辽阔海洋进行迁徙的这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小鲑鱼从淡水游入海水，然后又返回出生地产卵；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熔岩色海鬣蜥入海吃水底藻类，迅速返回岸边岩石，正好可以逃脱鲨鱼的危害等。

到3月初，他的“论本能”一章完成了。

4月底，他已经写完了大量手稿，差不多有2 000页，这时他真的感到精力衰竭了。这是进行一段水疗的时候了。

6月18日，查理收到了艾尔弗雷德·华莱斯的一封厚厚的来信，这封信寄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岛特尔纳特。他用开信刀裁开信封的一端，发现里面不仅有信，还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是“论变种无限偏离其原始模式的倾向”。

当他聚精会神地读华莱斯这篇文章的头几页时，感到那些用印刷体写的字在眼前旋转。是心痛还是胃疼，他也弄不清楚，瘫在身旁最近的一把椅子上，用模糊的视力读华莱斯的正文：

……野生动物的一生就是生存斗争的一生……在自然界里，有一条普遍原理，那就是许多变种比亲种存在得更长，并连续发生距离其原始模式愈来愈远的变异……

……简单的计算表明，历时15年，每一对鸟大概可以增殖到近一千万只！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任何地方的鸟的数量在15年或150年后会增加。生物的增殖力是非常巨大的，但生物的数量一定有它的限度，然后增殖逐渐停下来……这正是生存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最弱的和构造最不完善的个体必定归于消灭……

即使华莱斯有查理的1844年手稿，他也不能写出比上述更好的摘要！

查理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的情绪剧烈波动起来，从深深的怀疑到极度的愤怒，又到孤独凄凉，觉得被残酷的命运出卖了。只是凭着坚强的意志，他才逐渐冷静下来。于是他捡起落在地上的华莱斯的信，读了起来。华莱斯希望他会喜欢并赞成这篇文章，还说如果他真是这样，就请把这篇文章送交查理·赖尔，因为赖尔对他在《年刊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表示过赞许。

他走出书房，面色苍白，心烦意乱。他从门厅的衣橱里取出黑色的长斗篷和起皱的黑礼帽，从挂雨伞的架子上挑了一根粗手杖，然后大步穿过花园和田地，直奔沙径。他没有放置计算散步圈数的燧石，只是绕着林中的这块长方形地段走啊走啊，直到转得筋疲力尽才回家。在他的心目中，他的毕生工作就和“西蒂斯”号皇家军舰一样，沉船海底，彻底毁灭。

埃玛马上觉察到出事了。

“查理，出了什么事？”

他们坐在阳光下僻静处的那张长凳上；查理向她谈了华莱斯的论文。

“现在他用的措词都成了我写的各章的标题了！”他惊呼道。

“这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把你的著作的细节写信告诉他了？是不是赖尔或胡克无意中把你的材料泄露出去了？”

“看来他是不会剽窃我的，而且把他的手稿寄来让我评论。”

“那么，你怎么办呢？”

“按照他的请求，把文章寄给赖尔。”除了那篇文章，他还附带寄给赖尔一张便条：

你的预言完全实现了——那就是别人会抢先一步。当我非常简略地向你解释“自



然选择”依存于生存斗争这一观点时，你说过这样的话……请把这篇原稿退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说叫我发表，当然我要立即写信给他，建议把它寄给任何一家期刊去发表。这样一来，我的所有创见，不管它有多大价值，都将遭到粉碎……

我希望您会赞成华莱斯的草稿，这样我才可以把你的话告诉他。

他烦躁不安，坐立不宁，工作不下去，吃不香、睡不甜。他感到的不适已不仅仅是往常的恶心了。

星期天上午，一辆四轮马车停在“达温宅邸”门前，查理·赖尔和约瑟夫·胡克从马车里走出来。是赖尔请求胡克陪他一同到达温来的；他对胡克说，他们伟大的好朋友陷入了一场危机，因此必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对达尔文和华莱斯都公正的解决办法。查理看到他们俩人在前门时，大为吃惊，致使这一情景永远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其生动、鲜明就像他的壁炉架上面的那幅银版照相一般。

“我不打算问：‘怎样我才能获得这项荣誉’？”查理说，“多猜几次，我保证就能把它猜出来的。”

“如果你不问这个问题，那真是个傻瓜，”赖尔咆哮道，“当然了，所有天才在某一方面都是傻瓜。”

“我们来，不是为了进行理论的探讨，”胡克喊道，他的嗓音异常沙哑，“我已经读过华莱斯的文章。在从伦敦到这里的火车上，赖尔和我制订了一个可行的计划。”

查理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你们来帮助我摆脱窘境，真是盛情万千。我叫人把咖啡端进书房。”

沿着书房墙壁摆满了书架和文件柜，搁板上放着显微镜，几张桌子上放满了瓶瓶罐罐和药丸盒，还有一堆堆笔记和一把放大镜。查理他们坐在这里，就像在母亲的子宫内那样不受干扰。

查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

“华莱斯的这篇 15 页的文章没有任何地方比我的 1844 年草稿写得更充分，我的那篇草稿有 230 页左右，十几年前胡克就读过了。大约在一年前，我把我的观点的摘要寄给了阿萨·格雷，我可以确凿地证明，我没有从华莱斯那里抄袭任何东西。现在，关于我的基本观点，发表一篇摘要，十几页左右，我会十分高兴的，但我这样做，体面吗？华莱斯的确可以说：‘在你收到我的学说的纲要之前，你并没有打算发表你的观点的摘要。你利用我慷慨地——尽管你没有请求我——把我的概念告诉了你这一点，来阻止我抢在你前面发表，这公平吗？’人们会说，我的方便是私下知道了华莱斯在这方面的研究，因而导致我发表我的理论。我宁愿把我的全部著作烧掉，也不愿让他或其他任何人认为我在搞邪门歪道。你们难道不认为他把这篇草稿寄给我是拴住了我的手脚吗？”

“当然不这样认为，”胡克厉声说道，“你比他年龄大，而且在这个领域里比他多耕耘了 20 年。”

查理赞赏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虽然华莱斯对发表这篇文章没有说什么，但一想到我会因此被迫放弃在这方面多年来的领先地位，就感到伤心，不过我绝对不认为这会改变这件事的真相。”

奇怪，赖尔和胡克并没有被这番话所打动。

“你手头上有那篇 1844 年写的草稿吗？”胡克问。

“当然有。那上面还有你用铅笔乱画的笔迹呢。”他走到门旁一个较大的文件柜前。“这不是吗。”

胡克拿过来那篇草稿，埋头看起来了。赖尔问道：

“我可以看一下你写给阿萨·格雷的信吗？”

查理从存放阿萨·格雷信件的文件夹里取出那封信的副本，递给赖尔，让他看起来了。

查理嘟哝着：

“我可不能说服我自己……”

“住嘴，”赖尔说道，“否则你父亲的预言——你除了打猎、玩狗和逮耗子之外，不会干出什么好事的——就要实现了。”

几天来一直郁闷的查理第一次哈哈笑起来了。然后，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他颓然倒在坐垫上。赖尔和胡克对视了一下，然后会意地互相点点头。

“这下可好了，”胡克嚷道。

“没问题，”赖尔赞同地说道，“这封给阿萨·格雷的信，再加上 1844 年的论文，真是珠联璧合。”

“干什么？”查理问道。

“在 7 月 1 日召开会议之前，把它递交给林纳学会呀。”

“我不能这样做，”查理叫道，“我得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

赖尔不理睬他的抗议。

“我们还要在会上宣读华莱斯的论文。”

“我们还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呢，”查理气急败坏地说道，“而且就连我的论文到时候也赶不出来呀。”

“没问题，”胡克温和地答道，“我和赖尔将从你的 1844 年论文和致阿萨·格雷的信里摘出一份连贯而有说服力的论述，把它的篇幅弄得和华莱斯的论文差不多一样长。”

查理坐在那里，张口结舌。

“你们打算……替我做……做这一切吗？”

“这不会累死我们的，”胡克说道，“多年来你一直在向我们灌输你的物种理论。”

查理沉思了片刻，然后喃喃说道：

“你们俩是我相识的最善良的人。可是我们怎样向林纳学会说明这个奇怪的巧合呢？”

“我们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赖尔建议，“我和胡克在火车上写好了一份说明。”他从他外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开始读道：

我们荣幸地向林纳学会递交附去的两篇论文，它们论述了同一个问题，即“影响变种、族和物种之产生的诸法则”，这是两位努力不懈的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先生和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斯先生的调查研究结果。

两位先生在各自独立和互不知道的情况下，构想出一种完全相同的、有独创见解



的理论，以解释地球上的变种和物种诸类型的出现和永续性。他们在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内，可以被公平地视为同样有功的立论者。他们都没有发表过自己的观点，虽然在过去数年里我们曾再三敦促达尔文先生这样做。现在，两位作者无保留地把他们的论文交给了我们，因此我们认为，若在林纳学会宣读这两篇论文的摘要，将会极大地促进科学事业的利益。

查理把这封推荐信仔细咀嚼了一番，觉得对他大有帮助。

“妙极！我只需稍微花一点儿时间把以前那篇论文修改一下就是了……”

“你必须赶紧行动，”胡克提醒他，“现在离7月1日的会议只有几天时间了。”

“我将派帕斯洛把它们捆成一包给你送到基由去。”

帕斯洛敲开门说：饭已经准备好了。查理对他说：

“帕斯洛，到地窖把那两瓶最好的香槟酒拿出来。”在走向阳光充足的餐厅时，他对埃玛和几位朋友说：

“我不知道未来将怎样评论我们，但我们非常肯定的是庆祝现在。”

星期一那天下午，查理收到了胡克寄来的一封急信。胡克提醒他，离林纳学会开会只有两天时间了；假如他和赖尔把达尔文和华莱斯的联合报告准备出来，查理就必须立即把所有有关文件给胡克送去。在踌躇了一个小时后，查理把华莱斯的文章、他自己的1844年的论文和他致阿萨·格雷的信都捆在一个包里。然后他把帕斯洛叫来。

“请你马上换装。我要求你去基由植物园，把这个包交给胡克博士亲收。”

直到7月1日林纳学会开会为止，查理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那天，他在房子里待不住了，便像一匹鞍下夹着磨石的骏马似的绕着沙径疾驰。埃玛大胆转移他的情绪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问题。林纳学会的会员们对他和华莱斯的论文会有怎样反应？要知道这是两篇革命的、相互支持各自论点的论文啊。他们会不会拍案而起、斥责他渎圣呢？或讥笑他是个白痴呢？他们是否会怀疑他和华莱斯串通一气呢？他们会不会要求他退出林纳学会呢？他原想对自己的结论守口如瓶，直到经过多年的验证、使它们达到推翻不了的境地为止。但是命运托身于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斯，迫使他非如此干不可。

比起最悲惨的结局，期待本身就是那么不堪忍受了。他不想去伦敦参加这个会议。他觉得小儿子下葬^①刚两天，这似乎根本不可能。相反，他却哄着埃玛给他多弹几支曲子，然后把书丢在一旁，上床睡觉，但多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何时赖尔和胡克才给他写信，向他报告情况呢？

7月2日，一辆四轮马车转弯上了“达温宅邸”的车道，脸色苍白的约瑟夫·胡克走下车来。

“胡克，你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一下你要来呢？这样我会派我的四轮敞篷马车去接你的。”

^① 小儿子下葬，在前面删掉的一些段落中，达尔文的小儿子感染了猩红热而夭折了。

“我想尽快向你报告一下情况。”

查理周身不寒而栗。

“请照直说吧。”

“平安无事。”回答得直截了当。

“怎么回事？难道没有宣读那两篇论文？”

“宣读了，顺利得很。先读的是你的那篇。我和赖尔都想听一听人们对这两篇论文必然给予的深刻关注以及它们和未来的博物学的关系。因为这是必然的。可是，从表面看，根本没有进行讨论。”

“没有讨论？”查理大为吃惊。“难道这两篇论文没有激起他们的兴趣吗？”

“我以为可能激起了他们的兴趣。但对那些老派的学究们来说，这个题目太新奇了，是个不祥之兆，以致在他们把自身武装起来之前，还不敢应战。在那个冗长的晚间会议结束之后，是有一些零散议论的，但是由于赖尔的赞许，再加上我的助威，竟把那些家伙们镇住了，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对这个学说大张挞伐的。会议结束时，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掌声。随后，大家都回家了。”

胡克茫然地摇着头。

“这情景就像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当在巴黎爆发时，路旁咖啡馆里的常客竟没有一个烦神抬起头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是照样吃点心、喝咖啡。”

查理呆若木鸡，随即爆发出无法控制的狂笑。当他的冲动终于平静下来之后，感叹地说道：

“花了好几天来演自编自演的戏，时间都白费了。还不如跟约翰·亨斯洛^①去沼泽地捉蛤蟆来做蛤蟆肉馅饼呢！”

胡克可没有被逗笑。

“昨天夜里我和赖尔一致认为：眼下要紧的是，除了原来那份简短的报告之外，你还应该发表点儿东西。就是说，用你的材料写出一份摘要，由最有说服力的实例组成，以证明你的论点。在这个领域里，你必须确立你自己的权利。”

查理很快清醒过来了。

“我会这样做的。”

成堆的手稿放在书房远处的一个桌子上。试验研究用具、瓶子、罐子、箱子、试管、研钵、量具，堆满了一屋，使它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正如他的书中的材料，他被卷入其中已经20年了，充分表现出他的思想反复，有时他的信念处于自卑的状态，有时却又相信自己的天才，比一般人看得远，懂得多。他不停地兜圈子，一会儿至高无上的思想让位于凄惨失败的思想，一阵阵意气消沉代替了欢欣鼓舞。他极度渴望出版他的书，却又不愿他的书在生前问世。他公开宣称，他的书将获得成功并被普遍接受，跟着却又认为他的书一定会遭到失败。没有人会买它和读它。他告诉朋友们说，他对自己文章中的倒霉风格



^① 约翰·亨斯洛 (1796—1861)，著名植物学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期间蒙他传授过植物学、昆虫学的知识。

感到焦虑，却又不停地写了几千页，沾沾自喜于写下来的东西，并且肯定他对自然界普遍法则的揭露将是科学研究中心的一场革命。

在他写给朋友们的差不多每封信中，都提到他的精力所余无几了，他是一个病人，可是，甚至正当他紧张地全神贯注于写作、研究、计划时，也常常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在以前从未研究过的技术领域内相继组织好和记下来一章长而详细的内容；这种艰巨的成就可以同他爬上最高的安第斯山脉相匹敌。他的作品是可靠的，都经过“达尔文试验室”的检验。他的书的销售量还算适中，但不低于实验科学领域内任何其他作者写的书。他相信他决不会写得更好了。然而，他冷静地检查了这些成果，肯定地感到，自从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毁灭性的著作以来——它证明了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转的一个行星而已——还没有比得上他的概念、提出的证明和感性认识的。

他既有牢固的常识，也容易受骗。在思想深处，他知道亨利·霍兰医生是对的，他曾宣称带给他健康的是休息和变换环境，而不是在水疗站施行的水疗；他也知道查理·赖尔是正确的，他说带上埃玛去欧洲大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去度假将同样地使他安宁。在他的身体完全好转之后，只要恢复工作几天或几个星期，又常常会使他濒临死境。

他为研究材料，为书籍和标本，为显微镜和邮费，为抄写员缮清稿件，放手花了大量的钱；为了追踪探索藤壶^①的生活，他用了八年的时间和本钱，但他确实没有期望从中得到任何适当的报酬。然而，他吝啬地注意着他的账本，尽力节约有限的个人享受，不乱花一文钱……是保持金钱上的骄傲，还是必然迫近倾家荡产，他犹豫不定。

他需要友情，又需要避免一切社交；他要在“达温宅邸”闭关自守，又要找无数借口去伦敦。他不可避免地要懒散一个时期来进行酝酿。对他的著作的批评使他发抖，他坚持认为写一些辩驳的和解释的长信是重要的，即使在他完全相信批评会逐渐消失而创造性的著作会持久下去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喜爱称赞是转瞬即逝的，面对他的否定却是使他深深感到绝望的一个原因。他急于得到同时代的人和同等地位的人的承认，然而他探索的非正规的、激进的、难于相信和理解的问题非常肯定会被他们大肆地责骂。他经常感谢人们给予他的应得的支持，也经常感谢人们对他的著作以及他的著作对其他科学家们的价值所给予的过分表扬，然而他自己所追求的并不是这些，只是前所未有的知识而已……谦恭和自大携手并进。

他知道他就像门厅里落地大座钟的指针那样地转来转去吗？恰如钟的指针会指示中午12点，那么它在午夜大概也会放出和谐的钟声吧？虽然那些朦胧的、短暂的时刻，那些直觉的火花——就像大街上的磨刀人在磨刀石上磨刀剪时迸出来的火花那样，不会给他带什么好处，但他毕竟至少有过微弱的光明，他说过：

“我宁愿像现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受人轻视的病人，也不愿过游手好闲的乡绅生活。”

正如查理·达尔文所表示的，真理就在这句话之中！那么，为什么工作会使他病弱呢？几乎每一个人都工作，有时甚至比他的工作更为艰苦和消耗精力，而且这工作很少是

^① 藤壶，一种动物，生活在潮湿地带，常成群附着于岩石和水下建筑物上。

他们自己选择的。问题就在于他的真正的忧虑。在烦恼之夜的黑暗里，他焦虑和害怕他的学说会在大不列颠出笼问世，这是1837至1839年写在笔记本里的以及1842年和1846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应该知道，大不列颠的历史屡屡受到宗教动乱的折磨。他是从一个友善的、不与人争论的、随和的小伙子成长起来的，他去施鲁斯伯里学校，在基督学院，在“贝格尔号”舰上，人缘很好，他天生不喜欢和人冲突。他甚至没有参加过运动竞赛，而是喜欢沿着塞文河散步、骑马，在剑桥郡沼泽地带捉蛤蟆。虽然他相信阿加西斯所说的大自然从不说谎，但大自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就是挑选查理担当反基督的任务！

头晕目眩，心悸，肠胃胀气，干呕，就是他为了翻转乾坤所付出的代价。在他斤斤计较的精确支出表里，他并不认为这是太高的代价。在大多数英国科学家和他的某些朋友看来，这就可以把他称为一个无法医治的疑病症患者。这样也好。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他要坚持生命起源的研究。他的脑筋在不断地探索着自然界的终极真理；他的身体却同这种工作十分不协调！这是不治之症。他的身体普遍失调没有减少难以置信的研究工作量、长篇大论的通信以及发表原稿，他的吝啬并没有使他停止投下八年的生命和资本来完成蔓足亚纲的四卷集。当他的勇气退潮时，好像巴塔哥尼亚的圣克鲁斯河水那样——他们曾把“贝格尔号”舰搁浅在那里的河滩上来修理铜皮船底——所需要的只是把船再度浮起的一次潮水，就可完成工作了。

这会使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不想知道。

思考与探究

1. 这是一篇“小说化的传记”。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作者发挥想象，丰富了很多细节，使得达尔文的形象更加饱满。课文中哪些地方明显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和推测？找出来，并说说这样做是否损害历史人物的真实性。

2. 体会下列语言中所体现的达尔文的人生追求和科学精神。

(1) 我不过是对我的课题深深感到兴趣而已。尽管我希望不像现在这样地看重虚名，不论是今天的还是身后的，都不要看重。但是，我认为凡事都不要走极端。我心里明白，即使我知道我的书永远得匿名发表，我也会同样苦干下去的，虽然不会有那么高的热情。

(2) 是大自然否定了它。我不过是把我的观察材料记录下来而已。大自然是从不会扯谎的。

(3) 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应有任何愿望，只应有铁石般的心肠。

(4) 我宁愿像现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受人轻视的病人，也不愿过游手好闲的乡绅生活。

3. 在处理华莱士的稿件问题上，达尔文有过彷徨，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从他与赖尔和胡克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但他最终选择了坦白。这表现了达尔文什么样的品格？如果你碰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处理？

拓展与实践

从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学说到今天，人们对进化论的认识又有不少新的进展，比如关于自然选择、基因、生命起源，等等，都揭示了许多新的奥秘，有的地方甚至颠覆了达尔文最初的设想。有兴趣的

同学可以围绕“进化论新说”这一课题，在老师指导下，从书刊或网上查找并阅读有关的科普资料，梳理这方面的知识，有可能的话，在班上给大家做个小的“学术报告”。

有关资料

1. 相关传记作品

(1) 达尔文其他传记

《达尔文回忆录：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英]达尔文著，毕黎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达尔文与进化论》，[美]丽贝卡·斯泰福著，丁进峰、徐桂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达尔文传》，孙观清、刘丽群编著，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2) 其他科学家传记

《爱因斯坦传（上、下册）》，[美]亚伯拉罕·派斯著，方在庆、李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萨根传》，[美]凯伊·戴维森著，暴永宁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华罗庚传》，王元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江才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关于“小说化的传记”

“小说化的传记”是用小说的体裁和手法写成的传记，其所表现传主及其生平经历的事实基本是真实的，也常常引用有关传主的各种原始材料，但某些生活细节、人物对话和内心活动的描写，往往又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和一般偏重记述的传记不同，小说化的传记更加注重表现传主的性格、精神和独特的命运，从传主的生平事迹中特别抽取富于小说情趣的细节，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注重以文学的手段增加作品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如选入本书的欧文·斯通的《达尔文传》，其在史料上所下的功夫并不少，有关达尔文生活轨迹的叙述大都有事实根据，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传主的心理活动以及许多人物过往的背景描写，那种现实主义小说逼真的效果，强化了读者对传主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了解。



第五课

马克思



献身于实现人类理想的社会

——海因里斯·格姆科夫等



卡尔·马克思（1866年）

- ◆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 ◆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 ◆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阅读提示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起草了《共产党宣言》，用犀利的语言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揭示了资产阶级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现金交易”，“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人被异化为“商品”。他们提出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没有阶级对立、每个人都“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这个信念使20世纪地球上半数人口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据说西方许多大学要求学生阅读世界文化代表性的经典，马克思的著作往往是最基本的篇目，可见其影响之大。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精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更是根本的指导思想。阅读马克思的传记，可以让我们对影响中国命运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了解。

马克思的传记很多，这里选录的是德国传记作家海因里斯·格姆科夫等撰写的《马克思传》（易廷镇、侯焕良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拟。全书叙述了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和科学活动，包括其各个时期的代表著作，他与恩格斯的真挚友谊，他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等。全书共六章，这里选收了第二章的一部分，内容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的史实。

这是一部评传，对传主事迹包括马克思的著作有较多的评述，叙述与议论结合，比较注重学术评价，理论色彩也较浓，读起来可能有些难度。阅读时除了大致了解对马克思主要著作的评论，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对马克思革命事迹和人格力量的描写上。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才干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伟大的学者，是科学真理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早发现者，而且还是一位热情的革命代言人、英明的无产阶级战略家和策略家、无产阶级群众解放斗争的领导者。

被普鲁士反动政府及其法国帮凶逐出国境后，卡尔·马克思于1845年2月初来到布鲁塞尔。不久，他的夫人和9个月的女儿也随后到达，全家几乎已是一贫如洗。穷困的暗影始终紧紧追逼。由于布鲁塞尔的警察局迫使马克思保证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这就剥夺了他获得任何直接收入的来源。

这时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予了帮助。他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难而高兴。”^① 同时恩格斯向莱茵省那些两人都熟识的朋友和同志为马克思筹措款项。他自己还把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②一书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3页。

^②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根据自己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在英国居住期间的直接观察和各种官方及非官方文件的材料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到的第一批稿酬交给马克思使用。

由于这些友好的支援，初步不必为每天的面包发愁了。但仍是前途茫茫，因为普鲁士政府这时还在对比利时内阁继续施加压力，迫使它把这位令人畏惧的革命家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别无其他选择，只好在1845年底脱离普鲁士国籍，因为这个国籍给他带来的唯一特权，不过是被“本国”政府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跟踪迫害罢了。

然而普鲁士反动派愈是在国外对马克思追踪胁迫，在德国人民的代表人物中就有愈来愈多的人成为马克思的朋友。1845年2月他结识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①，这是一位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歌手，一年以前就已明显地站到革命力量一边了。几个月后，格奥尔格·维尔特^②于7月间来访。恩格斯曾称维尔特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③，他终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斗伙伴。但使马克思最感欣慰的是他的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5年4月迁居布鲁塞尔。有这样一位友人在身旁，流亡生活的苦难就较易忍受，何况同他并肩战斗，总是那么得心应手呢。

在布鲁塞尔这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一家又“增添”了一个成员——海伦·德穆特（琳蘅）。她是一位坚毅聪明的、来自摩塞尔的农家女儿，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生活在冯·威斯特华伦^④家中。1845年4月她到这对年轻夫妇家中来了，帮助马克思夫人燕妮操持家务。琳蘅非常巧妙地处理好日常生活中各种使人烦恼的琐事，在这方面，燕妮也比不上她，马克思就更不用说了。她讲求实际，谨慎而又果断，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处处节约，这一切都有助于克服最恶劣的困苦境况。直至燕妮逝世之前，琳蘅一直同燕妮分担一切忧愁，共享各种欢乐。

当恩格斯还在巴门^⑤，尚未迁居布鲁塞尔的时候，就曾极力催促马克思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要趁热打铁。”^⑥马克思也知道他的朋友是多么正确，但还是不能下决心这样匆匆结束自己在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使他感到不满足的是，自己还没有充分熟悉新近的英国文献和这些文献所依据的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

因此他和恩格斯于1845年7月中旬动身前往英国，作为期数周的考察旅行。他在伦敦曾和正义者同盟^⑦的几个领导成员会晤。但两位朋友留英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曼彻斯特度过的。在这里，马克思用整周整周的时间阅读各种经济和政治文献，作了摘录，并充分熟悉英国工人运动的思想财富和实际经验。

^①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又译作“斐迪南·弗赖利格拉特”。

^②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德国诗人。又译作“格奥尔格·韦尔特”。1845年从英国来到布鲁塞尔，成为马克思的朋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成为无产阶级的歌手，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③ 见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页。

^④ 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

^⑤ 巴门，德国的一个城市，恩格斯的故乡。

^⑥ 见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页。

^⑦ 正义者同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由侨居法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于1836年在巴黎组成的国际性秘密革命组织。1847年，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回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投入工作。着手对自己业已在《神圣家族》^①中开始讲述过的唯物史观作深入的论述。他们感到从事这一工作现在是更为紧迫了，因为有人对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所阐述的思想发动了论战性的攻击。

两位朋友用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内容广博的手稿，他们给它加上《德意志意识形态》^②的标题。尽管多次力图在德国寻找一个出版人，但一切努力竟属徒劳。这部手稿不得不像马克思日后辛酸而幽默地提到的：只好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③。这一著作直到1932年才得以问世，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尽管遭遇如此，这部论著毕竟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它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弄清他们直到当时的理论见解，并将自己新创的观点运用到各个不同的科学领域中去。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著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它既和当时盛行于德国的哲学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④的唯物主义的一些弱点。像任何真正的科学的思想斗争一样，从这一论战中也产生了新的思想认识。在和当时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展开斗争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以广博而系统的方式拟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们在理论创造时利用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积聚起来的人类知识宝藏，特别是利用了直到当时为止在欧洲先进思想中的如下最大成就：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国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他们来说，认真考虑和评价一切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任何真正科学家和人本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必须遵循的准则。

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⑤使自然、人和社会环境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相脱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情况恰恰相反，精神源出于自然界、源出于物质。费尔巴哈虽然也有过这样的认识，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唯物主义向前发展了，不仅将之应用于自然界，而且应用于社会。与此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之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恢复辩证法的根本特色，使之成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想在运动、结构和发展方面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样一来，就创造了一种在性质上完全崭新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申言，世界及其合乎规律的运动绝不像唯心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源出于精神、源出于观念，而是源出于物质、源出于世界及运动本身。两人的出发点是：不仅一切自然现象是以物质原因作为基础，而且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以物质力量及其发展作为基础。他们论证了：各种事物和现象并不是固定和毫不变动的，而是处于永恒发展和变化之中；这些发展不是千篇一律、始终如一的，而是从量变到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全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写于1844年9—11月。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③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④ 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⑤ 青年黑格尔派，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激进派，亦称黑格尔左派，活动中心在柏林。



质变的飞跃，并从正面走向反面；事物和现象本身所包含的内部矛盾和由这些矛盾所引起的对立斗争，推动一切向前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创造性的、革命的；它和一切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格格不入的。辩证唯物主义以革命的活动代替消极的静观。

早在 1845 年春，马克思就曾把他的哲学中这种革命化的新特点用这样一句简明而又确切的话表述出来了：“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当时他曾把这些想法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几十年后才作为《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之一发表出来并为人所知。这一简短的句子中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②。

两位朋友这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把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用于自然界——费尔巴哈和他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曾这样做过的，而且还应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这样一来，他们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迈出了费尔巴哈未能迈出的带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内容广博的几百页手稿中阐明了：人类在他们能够从事任何政治、科学、文化和宗教活动之前，必须有吃有喝，有地方住和有衣服穿；生活必需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因而也就是某个民族当时所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构成该民族历史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两位朋友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哲学的、历史的和其他方面的思想观念，连同法的关系、政治状况和政体，都不能从它们本身得到解释，而是像人类社会全部发展过程一样，归根结蒂都是以人类在其中生活的经济环境为其最后的根源。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告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③ 一切历史变化和社会变革，也都可以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存在找到其最终极的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又论证了，就生产的方式和方法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言，它们都是源出于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指出，在生产力（他们认为其中包括人及其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以及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他们指的是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合乎规律的关系和相互作用。马克思日后曾把这种业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定下来的思想作了如下的综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zhigù)。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④

^① 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 页。

^②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09 页。

^③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0 页。

^④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8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解答了以前哲学家和社会学理论家所提出而未能解决的一切历史哲学问题。这样一来，社会科学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科学基础。此外，关于现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本质，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作用，现在也比在《德法年鉴》^① 或在《神圣家族》的论述中有了更为广泛详尽的根据。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虽然看到工人们对自己的历史作用还是几乎毫无例外地缺乏觉悟，但两人并不因此而稍有迷惑。他们从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客观地位出发，根据这种客观地位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推翻国家这种“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组织形式”^②，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③，要“通过革命，在革命中……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将被打倒”^④。就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表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夺取政权。

当两位朋友于 1846 年 5 月结束《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时，他们在哲学上已基本拟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以科学的精确分析，并通过同社会实践反复进行对照，论证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⑤。

在人类思想史上，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种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业绩。直到当时为止，哲学总是否定人民，即物质财富的生产者的作用，这时由于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工人群众被宣告为“社会的中坚”。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断言：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给全人类带来自由、正义、和平和福利的力量，他们将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来做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敌人总是妄图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找出一些尚未完全成熟的思想硬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借以歪曲马克思的学说。当然，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许多在上述几部论著里间或略作提示的地方，作出了更肯定和更加明确的表述。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早期作品中这些思想的革命内容。马克思本人在开始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就充满自信地宣布说，他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⑥，同时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共产主义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马克思于是着手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在那些能够将革命理论变为革命实践的人们当中进行传播，即在工人中间进行传播。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悲惨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由于统治阶级拥有教育特权，工人们自己不可能在广博的领域学习各种经济著作，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科学理论知识只能由有产阶级中那些受过教育的代表和先进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拟定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一些藐视物质上的穷困，不怕诽谤迫害，在认定是正

① 《德法年鉴》，马克思和卢格合作创办的德文刊物。1844 年 2 月在巴黎出版。

②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 一、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70 页。

③ 同上书，第 38 页。

④ 同上书，第 76—77 页。

⑤ 见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86 页。

⑥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 一、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8 页。

确的道路上同工人们一起英勇无畏地继续向前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使理论不至于成为空谈，工人们的斗争不再在茫无目的和毫无计划的道路上徘徊，必须把科学共产主义同当时业已存在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

但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多次亲身经历中早有体会，单靠杂志和书籍去传播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而要创立一个新的工人组织，对于少数几个政治流亡者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出路只有一条：利用现存的条件，满怀信心地做到使欧洲工人阶级——首先最主要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真理，摒弃当时流行的各种非科学见解。

1846年2月，当马克思还在紧张地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两位朋友就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打算通过活跃的通讯活动，“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① 马克思认为，这是一条在既定条件下最有成功希望的途径，可以通过广泛的国际共产主义宣传工作逐步做到使各种真正革命的力量围绕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纲领聚集起来，从而为创建必须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好准备。事件的进程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

布鲁塞尔委员会的通讯活动很快就扩展到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通讯工作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菲力普·日果（一个比利时共产主义者，职业是档案管理员）进行的。他们三人组成了狭义的委员会。但为了处理决定一些重要问题，讨论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住在布鲁塞尔的一些信仰共产主义并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流亡者还共同组成一个较大的团体。在这些人当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威廉·沃尔弗^②，他是一位教师，以前当律师时就在西里西亚织工、小农和工人中间很有名望。他于1846年4月逃脱普鲁士警吏的缉捕来到布鲁塞尔，迅即和马克思熟悉起来并成为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马克思后来把自己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献给这位忠实的战友。此外还有：新闻工作者路易·海尔堡、塞巴斯蒂安·塞莱、斐迪南·沃尔弗、裁缝兼作家威廉·魏特林^③、燕妮·马克思的弟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以及——尽管联系间或有过中断——约瑟夫·魏德迈^④。魏德迈以前曾当过军官，现在是新闻工作者和土地测量员，他终生和马克思一家十分友好。

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在书信和通告中所阐述的观点虽然并不总能获得别人的同意，有时还遭到反对，但反应始终是热烈的。情况迅速表明，人们普遍感到这种思想交流是必要的和有用的。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不久就建立起国际上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友人

^① 1846年5月5日马克思致比·约·蒲鲁东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页。

^② 威廉·沃尔弗（1809—1864），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早期领导人。

^③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④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德国和美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的组织者。

同宪章派^①的革命代表人物、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的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取得了联系，或者在已有接触的情况下加强了联系。马克思特别关注的是先进的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及其在伦敦和巴黎的两个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5月建议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在伦敦也成立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②和卡尔·沙佩尔^③答应以伦敦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并利用他们现有的联系，在许多已经建立了正义者同盟区部（大多还是秘密组织）的地方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由于上述多方面的辛勤努力，几个月后终于在伦敦、巴黎、勒阿弗尔、哥本哈根、科伦、爱北斐特、汉堡、基尔、布累斯劳、莱比锡和其他城市相继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尽管这些委员会拥有的成员为数很少，但它们对弄清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走什么道路的有关思想问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就这样逐步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中心。

但这时马克思的健壮体格（他早年有一次写信给他父亲时曾谈到这一点）由于常常工作到深夜不得休息而大受损害。不过按当时一个拜访过他的人的亲笔描述，他仍然给同伴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充满着毅力、意志力和坚强信心的人”^④。1845年9月第二个女儿劳拉出世，1847年初全家盼望已久的男孩子埃德加尔诞生了，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维持全家生活所带来的忧虑日益扰人。甚至通讯所必需的费用也只能通过向友人筹款来解决。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情况日益清楚地表明，在正义者同盟和其他工人组织中进行一次思想上的澄清工作是多么刻不容缓。当时，空想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的思想在正义者同盟中传播得非常广泛。马克思对这位德国裁缝帮工曾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热情而又无私的辩护人。他感到自豪的是，这个德国无产阶级的儿子在他的最佳论著中已经接近于达到这样的认识：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并要通过革命的行动解放自己。但魏特林在论及走什么道路和用什么手段才能实现这一解放时，却依然囿于空想主义的观点。

当魏特林于1846年春天来到布鲁塞尔时，马克思曾竭尽全力争取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马克思力图使他摆脱那些空想主义的、仅从个人主观愿望而不是从客观条件出发的观念，力图使他理解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科学的理论，而不是单纯诉诸他们的感情和朴素阶级本能的宣传，需要的是由一个政党领导的政治运动，而不是自发的起义和宗派主义的密谋策略。

在1846年3月30日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马克思在他的友人支持下，又一次试图说服魏特林，但终属徒劳。魏特林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如下纯属幻想的主张：在德国，共产主义革命马上就要到来，无产阶级在进行这一革命时需要的仅仅是热情，而不是科学的见解和系统的组织工作。他未能从自己那些虽然一度曾是进步的、但这

^① 宪章派，19世纪30—5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一场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工人运动，称为“宪章运动”。其拥护者和参加者被称为“宪章派”。

^② 约瑟夫·莫尔（1813—184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

^③ 卡尔·沙佩尔（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

^④ 见巴·安年科夫：《随笔〈美妙的十年〉的片断》。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10页。



时业已陈腐不堪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于是马克思不得不毅然坚决反对这些宗派主义的观点，因为它们会把工人引入歧途。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必须从客观条件出发，而绝不能从假激进的主观想象出发，因此他强调说，在德国，通过下一次革命夺取政权的将不是无产阶级，而首先是资产阶级。任何反科学的先知式的预言将会驱使工人们去作毫无意义的牺牲。针对魏特林对理论的藐视，他宣布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①

魏特林固执于自己的观点，在布鲁塞尔委员会完全陷于孤立。他在正义者同盟的影响也迅速消退，并且越来越同革命的工人运动隔绝了。

几个星期以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成员再次开会议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次是围绕某些德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展开讨论的，这些人曾被马克思恩格斯讽刺地称为“真正的”或“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曾对若干同盟区部有过暂时的影响。马克思激烈反对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家，他们在哲学上是一些唯心主义者，企图用普遍的人类之爱代替阶级斗争，宣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和睦相处，并打算将共产主义理论转变为一种新的宗教。马克思论证了，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并不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在于人们的利己主义，而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任何掩盖阶级对抗的做法，都必然会把无产阶级引上邪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在一封通告信中以恰如其分的锋利语言谴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径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被接受，必然会“使工人们的意志颓废”^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反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斗争终于有了成果。马克思在1846年6月接到来自伦敦的消息说，该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已同魏特林及其观点实行决裂一事表示完全同意。在伦敦的人们说，革命不是下达一道命令就可以招之即来的。列宁说，“物质上的革命”必须通过“精神上的革命”预先为之做好准备。他们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我们的任务是开导人民和宣传财产共有……”^③ 这些说法向马克思表明：在正义者同盟内部，首先是在其领导人中间，已越来越认识到，迄今大家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认识确有缺点错误，并且是不成熟的。

马克思十分关切地注视着这些逐步发生的思想转变，并为此感到高兴。他一向相信，有觉悟的工人是没有成见的，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正义者同盟在伦敦的领导人（这时除了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之外，还有来自图林根的裁缝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和来自海尔布隆的工笔画匠卡尔·普芬德）大力号召同盟的各个区部进行一场从理论上弄清思想的战斗。在1846年11月发出的告同盟盟员书中，他们把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和拟定新纲领列为最重要的任务。正是为此必须进行的各种筹备工作使得他们确信，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加就不能取得任何进展。这样一来，在正义者同盟的发展过程上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

1847年初，约瑟夫·莫尔来到布鲁塞尔拜访马克思，受同盟的委托向他宣称：同盟

^① 见巴·安年科夫：《随笔〈美妙的十年〉的片断》。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8页。

^②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页。

^③ 见1846年6月6日卡尔·沙佩尔等人致马克思的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手稿第1000号。

的领导人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一般是正确的，确信有必要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宗派主义传统。莫尔请求马克思加入同盟和帮助同盟进行改组，并向马克思保证：他可以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阐述自己的科学理论，而且还可以把这些理论认识作为同盟的纲领公开发表。不久，莫尔又到巴黎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同样的建议。恩格斯为了在巴黎的同盟盟员中进行工作，这时已迁居巴黎，在该地已经住了一些时候了。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作为加入同盟的必要条件：同盟必须“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① 马克思嫌恶个人迷信，因为这一类的做法都是和正在发展中的科学世界观有抵触的，并且妨碍群众的干劲。一向受他重视的首先是事业的本身，政治工作的成果，对工人阶级的贡献。他终生对狂热的崇拜持有反感。

正义者同盟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是正确的，它同意这一要求。于是两位朋友握住伸出来请求入盟的手。他们成了同盟盟员。他们过去对同盟提出的批评，同盟的领导已经认识到了，看到确实存在这样的缺点和错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所从事的活动尽管持续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和卓有成效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科学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现在开始结合了。

马克思忠于自己在《德法年鉴》所发布的“向德国制度开火！”^② 的口号，从布鲁塞尔就近密切注视着德国局势的发展，特别是普鲁士王国局势的发展。对于反对派运动所取得的任何进步，哪怕是多么微小的进步，他都表示衷心的欢迎。他热烈盼望着有朝一日德国的同胞终将奋起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者，并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祖国。如今在 1847 年，看来这一天的到来已不会太遥远了。反封建运动这时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投入这个运动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

1845 和 1846 两年连续歉收引起了德国农业的一次严重危机。数十万人饥肠辘辘，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很多地方由于饥荒引起暴动，反动当局甚至不得不使用军队进行镇压。1847 年年中，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一次危机迅速蔓延到德国。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群众日益愤懑。严重的不满情绪在一些地方已爆发为政治游行示威。

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也同样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这时已特别明显地感到业已僵化的封建制度是如何不堪忍受。国库异常空虚。国王还喊着要钱。但只有他的对手——资产阶级——拥有金钱，而直到当时为止，他一直拒绝让这个阶级分享任何政治权利。至于钱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看来，正如它的一个代言人——莱茵地区的大资本家汉泽曼——直截了当地说，是“没有情面可言的”。^③

于是在德国，由于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这种公开冲突的推波助澜，革命的局势逐渐酝酿成熟。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和国王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统治；被统治的阶级也不再甘心像现在这样继续任人摆布了。

^① 见 1877 年 11 月 10 日马克思致威·布洛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289 页。

^② 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 页。

^③ 见《联合省议会第一届会议，1847 年》，王室秘书处拉特·爱德华·布莱茨监督刊印。第三部分，1847 年柏林版，第 1507 页。

面对着已经露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在正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在共产主义者中间，还有在那些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当中，这时对这个问题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看法。人们在激烈的辩论中权衡着应该赞同或反对哪种意见。应该相信封建阶级像海妖西壬所唱的美妙歌声^①，说什么资产阶级是贵族和工人的共同敌人呢？还是应该支持那些仍在残酷地剥削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去反对国王和贵族呢？抑或最好是作为微笑的第三者，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争斗中袖手旁观呢？此外还有些急性子的人，又说什么工人们应该利用两个剥削阶级彼此之间的纷争，一举把两者统统打倒，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难道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吗？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提了出来，而迄今历史只对它们提供一些不完整的答案。但德国工人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答案，——现在由于他们的最先进代表正在着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政党，也就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这样一个答案。

当然，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最渴望要做的事情，莫过于尽快地把苦难深重的同胞从重重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了。但他绝不沉湎(mǎn)于单纯向往美好未来的空想。他看得很清楚：即将到来的革命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当时在德国，也只有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强大到足以取代封建贵族，接管政权。然而马克思已洞察到，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的革命，即工人们的革命将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而认为自己思想行动的最高目的就是为这一革命铺平道路。正是这一点使他不同于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看来这一切好像是十分简单明确的，但在当时要给工人阶级和年轻的工人运动详细制定一个在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应该如何行动的作战计划却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更为困难的是还要建立起一支唯一能够实现这个作战计划的力量。而这样一支力量只能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点已为迄今一切阶级斗争的经验所证实，并由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所充分证明。工人阶级要采取政治上的独立行动，这样一个政党是不可缺少的。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给年轻的无产阶级在业已赫然在目的阶级搏斗中指明目标和方向，才能把现有的各种力量组织起来，并在群众中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是一项万分火急的任务。时间紧迫，已经有了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绝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面前赤手空拳，没有武装，没有纲领，没有进军的路线。

马克思于是全力以赴地为创立这样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他帮助筹备预定于1847年夏天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必须按照自己新近总结出来的理论和见解去草拟一个新的章程，并在这个新章程中明确规定组织原则、同盟盟员的义务和同盟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做到了把自己的主要思想写进新的章程。

同盟应是一个民主的但组织严密的战斗联盟，它的领导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和担任全盟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① 古希腊神话中传说在意大利的西南某海岛上有个女妖（称为“海妖西壬”），专以美妙的歌声诱惑过路的水手，受惑者皆被害身死。



作为同盟的最高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这就是后来一切工人政党所独具特色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各个支部由至少3个盟员至多不超过20个盟员组成，——由于同盟当时必须秘密活动并尽可能做到不被警察发现，就不得不规定支部成员的最高数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规定同盟盟员义务这件事情有着重大意义。不言而喻，每个盟员必须承认共产主义并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但他们还有义务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作风，以及在政治活动上处处成为自己的阶级兄弟的模范，并证明自己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每个盟员应该表明自己在掌握并传播共产主义这门科学时具有革命毅力和热忱。这些都是道德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标准要求。

同盟的目的和宗旨被宣布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①为了和这些目的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把同盟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以新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人人皆兄弟！”这个旧口号。新的口号公开宣布了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和国际主义性质。

在为同盟代表大会做好准备的同时，马克思一刻也不曾忘记，在政治上最成熟的工人当中还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过去曾在正义者同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种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这时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思想，妨碍着制定一个共同的科学纲领，从而也妨碍着党的建立。法国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②是一个有学识的排字工人，但囿(yòu)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念，竟力图在他的著作中以娓娓动听的语言劝说无产阶级接受通过和平道路去改革资本主义的思想。他幻想着可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就能消除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残酷后果，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计划。如果跟着蒲鲁东走，就意味着终将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斗争。当然不能听任这种富于欺骗性的见解到处流传而不加驳斥。马克思于是着手进行这件“不讨好的工作”^③，要在非常广博的领域批判蒲鲁东的著作《贫困的哲学》，还要在批判中申明自己的观点。

1847年1月至6月，马克思集中精力从事《反蒲鲁东论》的著述。这部著作于7月在布鲁塞尔以法文出版。印数为800册。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书名，讽刺性地把自己这部著作命名为《哲学的贫困》^④。论证蒲鲁东的哲学观点的反科学性，也就是说，论证其“贫困”，在马克思看来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他绝不仅仅限于在论战中驳斥错误的见解。他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把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思想公之于世（虽然在此以前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也曾论述过这些理论，但该书一直未能公开发表）。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还总结了迁居巴黎以来对

^① 见《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② 蒲鲁东（1809—1865），法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

^③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5页。

^④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的论战性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马克思的成熟作品。全名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审查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他指出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意义，指出罢工和工人同盟（工会）的意义，并阐明它们对于在政治上教育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他在这部著作中还第一次阐述了这样一个对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有着重大意义的原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政治斗争，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有可能实现。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是马克思用来直接帮助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指示。这些理论直到今天还丝毫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和现实性。

马克思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不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他和他的家人再一次陷于穷困，连维持生活最必需的东西都感匮乏，朋友们对对此也几乎爱莫能助，因此就更谈不上去做一次费用高昂的旅行了。但马克思知道在伦敦有自己最好的代表，因为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廉·沃尔弗以正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名义参加大会。

沃尔弗回到布鲁塞尔时给他带来好消息：章程草案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草拟的，已获大会同意，并将提交同盟各支部进行讨论，同盟的新名称和新口号已被批准。大会的代表们谴责了魏特林的空想主义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和同盟盟员的身份不能相容，并宣布将制定一个纲领。

由于通过了这些决议，大家非常迫切需要的、拥有一个科学纲领的党已经打下了创建的基础，但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组建工作。

8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组织起来了。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并被选入区部的领导机构——区部委员会。他敦促这个已经成立并需要马上开展工作但还不得不非法进行活动的党，利用一切机会去扩大并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他自己带头和恩格斯一起于1847年年底建立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这是一个处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支部影响之下的合法组织，并且很快就拥有了100个会员。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日的晚上，工人协会的会员就在“天鹅饭店”（即坐落在宏伟广场的那家布鲁塞尔屠宰同业公会的旧会所）聚会。马克思经常参加这些集会，因为他认为“尽管公开活动还很有限，但它对每个人都起着非常振奋的作用”。^① 星期三晚上有关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报告会和讨论会。星期日晚上通常由威廉·沃尔弗对一周政治形势作综述，随后就开始社交性的娱乐活动，节目表上有唱歌、朗诵、跳舞或演剧。会员的妻子也参加这些晚会。有时燕妮·马克思在会上朗诵，给晚会增添了光彩。

人们应该感谢卡尔·马克思，因为他使工人协会发展成为一所共产主义的学校。马克思做了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的报告，并向他的听众阐明为什么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不可调和地互相对立。马克思在向工人们做报告时还使自己的教学才能变得更加完善。他还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在随后几十年间曾一再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公开活动，他赢得了那些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布鲁塞尔工人的信任。工人们尊敬地称这位29岁的青年为“马克思老爹”，他们不仅认为他在各种政治问题上是一个明智的顾问，

^① 见1847年10月26日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95页。

而且把他看作自己的朋友，因为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在细心倾听工人们诉说自己的疾苦。

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这几个月里为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做的一切，是和山雨欲来的欧洲革命，特别是迫在眉睫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找到了正确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钥匙。但现在还必须把自己在方法论上的原则应用到一个历史上的具体局势，应用于当前的现实。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必须完成，必须使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连同整个工人阶级，都用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武装起来，以应付即将到来的革命并经受考验。不过如果这些正确的科学理论不能迅速在工人中传播，不能用出版物公开发表出来，如果共产主义运动不能创办一份自己的公开机关报，那么这些科学见解还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仍然缺少这样一份机关报。曾经试图出版一份月刊，但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办成。

1847年夏末，马克思和他的友人对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赢得了决定性的影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份有四个版面每周出版两次、并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走私方法越过国境运进德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斗争的看法。在他们的影响下，该报逐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马克思是从论述在德国以革命手段推翻垂死的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必要性开始的。他向工人们阐释说，资产阶级在其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只想把无产阶级当作炮灰使用，大家对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但工人们在制定自己的策略时仍然不要受感情的支配，不要受自己那种理所当然的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所支配，而只能以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认识为指导。他说，英国和德国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①因此，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帮助了资产阶级）是为了扫除封建制度，为了获得像出版自由、陪审法庭、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或人民代表制度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权利，也是间接为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的确，甚至可以这样说：哪里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群众而不把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进行到底，哪里的工人，以共产主义者为先锋，就必须成为保卫民主主义的最坚定的战士，并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在一起，共同行动。

当然，工人阶级同时还有远远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目的。马克思向工人们阐释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解决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一切问题。对工人们来说，为民主制度而进行斗争只不过是为了创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马克思通过这些建议（在这些地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一再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强调了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密切相关这样一个原则，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始终是革命工人政党的战略和策略。

当卡尔·马克思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公开发表这些思想的同时，还和他的战友们着手实现共产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他加入了布鲁塞尔的民主协会，在这个协会中，无产阶级革命者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结在一起。人们如

^① 见马克思：《〈莱茵观察报〉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0页。

何极力推崇他是一个彻底的维护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战士，可以从下面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证明：他在 11 月 5 日被选为协会的副主席。在主席团里，马克思的身边还有来自比利时和法国的著名革命家和民主主义者，以及赫赫有名的波兰民主派历史学家兼政论家约阿希姆·列列韦尔。

马克思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加强民主协会，他看出在这个协会里有可能把反封建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切思潮汇合在一起，并给它确定一个明确的方针和目的。他帮助争取新的会员，协助筹备那个计划于 1848 年召开的国际民主派代表大会，并引导这个协会同伦敦的一个民主协会，即“民主派兄弟协会”（他早在 1845 年夏天就同这个“民主派兄弟协会”有个人联系了）共同合作。正是由于他的协助，使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虽然人数不多但举足轻重的国际民主运动的据点。

普鲁士、比利时和奥地利三国政府都以日益增长的疑虑密切注视民主协会的不断壮大，特别是马克思的活动。没有什么事情比之共产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结成联合阵线对三国政府那种与人民为敌的政策更为危险的了。柏林政府不断增强压力使《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遭到镇压并将马克思驱逐出比利时。

1847 年的最后几个月，是马克思直到当时为止从事革命活动最活跃最紧张的时期。尽管他在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和民主运动中几乎担负了全部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但丝毫没有忽视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好准备。他和恩格斯（这位朋友当时仍在巴黎）在书信中交换意见时，讨论了同盟的纲领，这个纲领在伦敦将提交大会讨论。恩格斯草拟了一个草案并和巴黎的共产主义者进行了讨论。11 月 27 日，他把这个题为《共产主义原理》的著名手稿带到奥斯坦德，在那里同马克思会晤，再从该地共赴伦敦。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总区部的代表，恩格斯则作为巴黎区部的代表出席大会。这一次马克思尽管还得向亲戚们提出不愉快的要求，但毕竟成功地筹到出席同盟代表大会的旅费了。在大家非常殷切的期待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1 月 28 日到达伦敦，来自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同盟盟员代表都在这里汇集。11 月 29 日，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了。大会进行了将近两个星期。由于大多数代表白天不得不为谋生而劳动，会议只能在晚间举行。

党纲成了会议的讨论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党纲草案，这个纲领综合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两人详细申述了他们这些见解的依据，提请工人代表们讨论。马克思所发挥的有力论证使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完全信服。他的思想路子也使大会代表们感到同他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完全一致。经历了至少八个晚上的透彻辩论之后，全体代表都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申述的纲领性原则和策略原则，以及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已提出来的章程草案。这次大会一致通过了同盟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①。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就大功告成了。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意味着自己多年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辛勤努力获得了

^①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72 年单行本，第 3 页。

胜利，使无产阶级确信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实践上建立了这样一个政党。马克思毕生都是致力于实现这样一个目的。在马克思逝世前几年，恩格斯鉴于有人对他自己和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性立场的误解，曾这样写道：“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 1847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① 这一重要见解是马克思主义的顶梁柱，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全世界胜利的前提。

不管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小的组织（当时盟员至多只有 500 人），马克思后来曾一再明确指出：它的建立为革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基石。共产主义者同盟不仅就其纲领而且就其成员来说，都称得上是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同时也是第一个德国工人党。参加这个组织的首先是德国工人和无产阶级手工业帮工，此外还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德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已成为欧洲各种社会、政治和民族矛盾的中心。于是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就开始了德国工人党的历史。

马克思在 1847 年 11、12 月逗留伦敦期间，还非常活跃地参加这个英国首都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在这里也像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样，他始终遵循自己的这一原则：“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的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②

马克思同宪章派的领导人讨论了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问题；同“民主派兄弟协会”商讨了如何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更加紧密合作，并在 1848 年秋天召开一次国际民主派代表大会。

他和恩格斯一起在 11 月 29 日参加了许多国家的民主派为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③ 17 周年而举行的一次集会。马克思在会上大声疾呼，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战争政策。他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废除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并永远消除战争。马克思宣告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④ 由此可见，马克思当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在摇篮时期就已指出：和平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任何其他阶级能像无产阶级那样始终如一地为本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前途进行斗争。

正义者同盟于 1840 年在伦敦建立的一个合法组织——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们对马克思表示衷心的热烈欢迎。他以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向工人们阐释了自己的工作，并详细地报告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活动。

在伦敦的协会里，当时正在流行着一些把共产主义追溯到基督教的想法——这正和魏特林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马克思和工人们讨论了宗教的历史性质和作用，并使他们熟悉

^① 见 1889 年 12 月 18 日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321 页。

^② 见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 页。

^③ 1830 年波兰起义，1830 年 11 月，处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民，发动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并在华沙建立了政权。1831 年 9 月，由于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

^④ 见马克思：《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09—410 页。



当代对宗教进行批判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德国的无神论文献。他用这种方法引导工人们逐步走近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又丝毫没有把问题庸俗化。

在他的听众当中有帮工裁缝弗里德里希·列斯纳^①，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可靠的朋友。列斯纳描述这些日子他所得到的印象说：“马克思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大约 28 岁。但我们大家全都对他非常敬服。马克思中等身材，肩膀很宽，体格结实有力，举止处处显示着精力充沛。前额很高而且丰满，满头浓密的黑发，目光炯炯，能洞察一切。就在那时他的尖锐的讽刺已足使论敌丧胆。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领袖。他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他不说一个无用多余的字；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马克思身上嗅不到一点儿空想家的气息。我越是深刻地了解魏特林时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越是清楚地感到马克思是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②

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马克思于 1847 年 12 月中回到布鲁塞尔。恩格斯则重返巴黎。由于分居两地，山水相隔，给两人共同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党纲这一任务带来了不少困难。还发生这样的情况：1848 年 1 月底，马克思收到伦敦中央委员会发来的一封带有警告意味的敦促书，要他尽快把草稿送去，“否则将对他采取进一步措施”^③。不过此时这部珍贵的手稿已在寄往伦敦的途中了。它是在伦敦比索普门利物浦大街 46 号的一家规模很小的印务所里印刷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为付印做了各种必要的工作。卡尔·沙佩尔审阅了校样。在 2 月的最后几天里，《共产党宣言》出世了。外表并不华丽，是一本只有 23 页的小册子。印数也不过几百本，是直接送交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然后再一手交一手地转发出去的。虽然这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的却是一部开创历史的著作，就开创历史的确切涵义来说，的确还没有第二本书能做到这一点。这部著作直至今天仍然显示，并且每天都在显示出它所蕴藏着的无比生命力。

什么东西使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具有这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呢？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在这部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卓越的语言概括了 1843 年至 1848 年间得出来的科学见解和实际经验——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和他们本人的经验。他们还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作了扼要的系统论述。为了驳斥各种反对共产主义的谎言和诽谤，粉碎种种关于共产主义的传奇和空想，他们毅然公开宣布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斗争方法和斗争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纲领性文献是以扣人心弦的几句话开始的：

^①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② 见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八四八年前后。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07—108 页。

^③ 见 1848 年 1 月 26 日中央委员会致布鲁塞尔总区部。载《卡尔·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导言及有关文献。第四版，附有弗兰茨·梅林的引言及注释》，1914 年柏林版，第 14 页。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①和基佐^②、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③。……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④

宣言的第一章论证了阶级斗争对推动人类历史前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在其发端时期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曾对社会生活实行过革命的变革，那时资本主义还是进步的，但以后却不可避免地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经济危机和战争——这时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就是充分的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描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本质和无产阶级在其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各个阶段的特点。他们详细阐明了：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也以不可阻挡之势不断成长，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斗争也越来越尖锐。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正以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产生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组织起来。他们在政治上不断成长，并将意识到自己的权势和力量存在于本阶级的团结和革命的统一之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⑤。

这样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里向工人阶级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不可避免；而最为重要的是，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发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他们还向工人阶级指明，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和途径，去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并完成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建者的使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⑥，就是夺取政权。他们还强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真正的民主性质，并指出上升为统治阶级就是“争得民主”^⑦，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一小撮剥削者的统治。正如列宁所说，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思想”^⑧的阐述。

然而工人阶级必须如何利用国家政权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着重强调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⑨

^① 梅特涅（1773—1859），曾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和神圣同盟组织者之一，力图在欧洲恢复封建专制统治，镇压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② 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曾任法国首相，赞成君主立宪制。

^③ 神圣同盟，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欧洲多数国家参加的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于1815年成立。

^④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单行本，第23页。

^⑤ 同上书，第35页。

^⑥ 同上书，第44页。

^⑦ 同上书，第44页。

^⑧ 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参阅《列宁选集》第3卷，第190页。

^⑨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单行本，第44页。



他们还要求劳动人民时刻记住首先要坚定地运用这一政权，并全力支持自己的国家所制定的各项措施。特别重要的是，对经济领域的措施要给予最大的关注，因为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的国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必须运用全部力量去扩大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按照总的计划”^①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向工人阶级指出：在进行经济大变革的同时，必须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思想生活实行革命的转变。无产阶级必须废除统治阶级的教育特权，必须使儿童的教育同物质生产劳动相结合。两位朋友写道：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②

《共产党宣言》向工人阶级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要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 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人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第一次能够成为真正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个由于实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而出现的时代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将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④。它担任了民族的领导，就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完全崭新的前途，充满乐观的远景。因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以往和当时的现实进行科学的透彻观察，曾这样预言说：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中，将不会有各国人民之间的血腥战争，因为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工人阶级将给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这样一来，也就证实了：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本国人民的忠实儿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坚定地重申他们业已付诸实践的这一理论认识：工人阶级如果要担当得起历史和民族赋予他们的伟大责任，他们在斗争中就必须有一个思想上明确和组织上严密的政党。党的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⑥。党把工人阶级中能力和本质都最为优秀的人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先锋部队，在斗争中冲锋在前，并领导整个阶级前进。革命的工人党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⑦。

如果工人阶级的党要想成功地引导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就绝不应使自己陷入宗派主义的小圈子里，而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并学习群众的经验。同样，党还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对

^①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单行本，第45页。

^② 同上书，第44页。

^③ 同上书，第46页。

^④ 同上书，第42页。

^⑤ 同上书，第43页。

^⑥ 同上书，第36页。

^⑦ 同上书，第37页。

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和各种陈腐、反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及“体系”，给予了充满机智和辛辣讽刺的批判。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还论证了：各国工人的相同境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同利益和目的，必然要求共同一致的行动和国际上的团结。因此宣言强调说：“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必须维护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必须使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同国际工人运动的普遍目的保持一致。因此共产党人要“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还论述了当时德国必须完成的革命任务。他们首先强调指出，共产党人的义务就是“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③。他们说：“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④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给德国工人阶级制定了在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中有所遵循的指导原则。

他们始终把德国革命同欧洲的整个革命运动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当时他们希望英国的革命将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而法国的革命浪潮将很快导致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期待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⑤。这一看法后来被证明是提得过早了，因为在1848年，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中，经济发展的状况——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后来所说——“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⑥。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理论思想，对于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来说，始终具有永恒的价值。

在这篇用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语言撰写的宣言中，每行每句都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鲜明的党性。好像要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吹奏进军号一样，这个战斗纲领在其结束语中响彻云霄地宣告说：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⑦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明书。它的作者是德国人民的儿子。这是他

^①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单行本，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③ 同上书，第58页。

^④ 同上书，第57—58页。

^⑤ 同上书，第58页。

^⑥ 见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

^⑦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单行本，第58页。

们都应该并必定引以自豪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世界各国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并利用这些领域中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对历史上的和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实践进行了批判研究。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发展了德国人民最优秀的人道主义、科学和革命的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使理论知识不断向前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的革命思想。正是这些思想使人类各个不同知识领域第一次获得了科学的基础。正是通过这些思想所提供的科学的精确依据，使革命理论得以提高到一个完全崭新的阶段。他们这些使一切发生革命变化的理论知识，都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了经典性的表述。

思考与探究

- 节选的这一部分评述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期间的思想建设和革命活动。请总结一下马克思这段经历。
- 课文用大段篇幅评述了马克思的两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根据课文内容，说说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影响。
- 革命理论在传播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需要澄清，马克思用了很大精力与之进行论战。课文中叙述了几次这样的论战？各有什么样的意义？

拓展与实践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斗争方法和斗争目标，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篇幅不长，但极精粹。建议和同学们一起朗读《共产党宣言》，并结合《马克思传》中相关的评述，互相交流阅读心得。

有关资料

- 相关传记
 - 马克思其他传记
《马克思传》，刘建军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其他共产主义者传记
《恩格斯传》，[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易廷镇、侯焕良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列宁传》，季正矩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 关于评传
评传是带有研究与评论性质的传记。这类传记偏重对传主的生平事迹的评价，一般按生平顺序梳理和记述，在叙述中常常插入评论。强调材料严谨，对原始资料进行认真的研究、考证，注明出处，不容许虚构或杜撰，如果有必要的推测或推论，也要加上严格的论证说明。



略读

第六课

沈从文



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

——沈从文



- ◆ “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我……不相信命运，不承认目前形势，却尊敬时间。我不大对生活中的得失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
- ◆ 我的心总对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 ◆ 照我思索，能认识“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

阅读提示

读过沈从文作品的读者，对他笔下原始、神奇而又富于生命活力的湘西世界，大概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位穿着草鞋从边地走来，没有上过多少学，却最终成为教授和大作家的“乡下人”，自身就极富传奇色彩。

这篇传记节选自《从文自传》（收入《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记载的是沈从文从出生到他离开湘西为止近20年的人生经历。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凭着自强不息的生活信念和毅力，沈从文从边远底层农村，一步步走进一个个新的世界。而他早年的生括阅历与经验却始终滋养着他的灵魂，转化为他后来观察与批判都市文明弊病的一种角度，成为他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我们从传记中可以了解沈从文艰难曲折的经历，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还可以把这篇自传看作关于人在逆境中成长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困难和艰辛可以转化为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锻造人坚韧的性格，激励人追寻生活的意义。

沈从文在生活中常常举步维艰，可是进入文学写作却又如鱼得水。在这篇自传中，他用舒缓的笔触很自然地唤醒了年轻的记忆，打开那被尘封的久远的时光，虽然其中有诸多苦难与曲折，但经过情感的“过滤”，一切又都变得那么迷人。其中有不少神秘的风俗描写，阅读时注意不要只是猎奇，最好能想想这“奇”中的文化含义，“奇”中所寄寓的批判意识。

这是一篇文学性传记，用散文笔法写成，叙述与描写并重，故事性较强，应多留意其取材的用心与文字的质朴。

我读一本小书又读一本大书

我从不用心念书，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许多书总是临时来读十遍八遍，背诵时节却居然朗朗上口，一字不遗。也似乎就由于这份小小聪明，学校把我同一般同学一样待遇，更使我轻视学校。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地利用自己的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儿，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稀奇。最稀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子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太多了。

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儿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



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插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刺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里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稀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将近 20 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我得看许多业已由于好询问别人，以及好自己幻想所感觉到的世界上的新鲜事情新鲜东西，结果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就只好做梦。

照地方风气说来，一个小孩子野一点儿的，照例也必须强悍一点儿，才能各处跑去。因为一出城外，随时都会有一样东西突然扑到你身边来，或是一只凶恶的狗，或是一个顽劣的人。无法抵抗这点儿袭击，就不容易各处自由放荡。一个野一点儿的孩子，即或身边不必时时刻刻带一把小刀，也总得带一削光的竹块，好好地插到裤带上，遇机会到时，就取出来当作武器。尤其是到一个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看木傀儡戏，不准备厮杀一场简直不成。你能干点儿，单身往各处去，有人挑战时，还只是一人近你身边来恶斗。若包围到你身边的顽童人数极多，你还可挑选同你精力相差不大的一人，你不妨指定其中一个说：

“要打吗？你来。我同你来。”

到时也只那一个人拢来。被他打倒，你活该，只好伏在地上尽他压着痛打一顿。你打倒了他，他活该，把他揍够后你可以自由走去，谁也不会追你，只不过说句“下次再来”罢了。

可是你若根本上就十分怯弱，即或结伴同行，到什么地方去时，也会有人特意挑出你来殴斗。应战你得吃亏，不答应你得被仇人与同伴两方面奚落，顶不经济。

感谢我那爸爸给了我一份勇气，人虽小，到什么地方去我总不害怕。到被人围上必须打架时，我能挑出那些同我不差多少的人来，我的敏捷同机智，常常占点儿上风。有时气运不佳，不小心被人摔倒，我还会用方法翻身过来压到别人身上去。在这件事上我只吃过一次亏，不是一个小孩，却是一只恶狗，把我攻倒后，咬伤了我一只手。我走到任何地方去都不怕谁，同时因换了好些私塾，各处皆有些同学，大家既都逃过学，便有无数朋友，因此也不会同人打架了。可是自从被那只恶狗攻倒过一次以后，到如今我却依然十分怕狗。（有种两脚狗我更害怕，对付不了。）

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儿，不要太近！”嘱咐小孩子稍稍站开点儿罢了。本地军人互相砍杀虽不出奇，行刺暗算却不作兴^①。这类善于殴斗的人物，有军营中人，有哥老会^②中老幺，有好打不平的闲汉，在当地另成一帮，豁达大度，谦卑接物，为友报仇，爱义好施，且多非常孝顺。但这类人物为时代所陶冶，到民五^③以

① 作兴，方言词，多用于否定，指情理上许可。

② 哥老会，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种秘密结社组织。四川称袍哥。在组织内部排行分五个等级：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十排统称老幺。

③ 民五，指中华民国五年。

后也就渐渐消灭了。虽有些青年军官还保存那点儿风格，风格中最重要的一点儿洒脱处，却为了军纪一类影响，大不如前辈了。

我有三个堂叔叔两个姑姑都住在城南乡下，离城四十里左右。那地方名黄罗寨，出强悍的人同猛鸷（zhì）的兽。我爸爸三岁时在那里差一点儿险被老虎咬去。我四岁左右，在那里第一天，就看见四个乡下人抬了一只死虎进城，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我还有一个表哥，住在城北10里地名长宁哨的乡下，从那里再过去10里便是苗乡。表哥是一个紫色脸膛的人，一个守碉堡的战兵。我四岁时被他带到乡下去过了三天，20年后还记得那个小小城堡黄昏来时鼓角的声音。

这战兵在苗乡有点儿威信，很能喊叫一些苗人。每次来城时，必为我带一只小斗鸡或一点儿别的东西。一来为我说苗人故事，临走时我总不让他走。我欢喜他，觉得他比乡下叔父能干有趣。

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学成立，民四我进了新式小学，民六夏我便离开了家乡，在沅水流域13县开始过流荡生活，接受另外一种人生教育了。

我考进了新式小学后，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只是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先生见及，也不加以约束，七天照例又还有一天放假，因此我不必再逃学了。可是在那学校照例也就什么都不曾学到。每天上课时照例上上，下课时就遵照大的学生指挥，找寻大小相等的人，到操场中去打架。一出门就是城墙，我们便想法爬上城去，看城外对河的景致。上学放学时，便如同往常一样，常常绕了多远的路，去城外边街上看那些木工手艺人新雕的佛像贴了多少金，看看那些铸钢犁的人一共出了多少新货。或者什么人家孵了小鸡，也常常不管远近必跑去看看。一到星期日，我在家中写了16个大字后，就一溜出门，一直到晚方回家中。

半年后，家中母亲相信了一个亲戚的建议，以为应从城内第二初级小学换到城外第一小学，这件事实行后更使我方便快乐。新学校临近高山，校屋前后各处是大树，同学又多，当然十分有趣。到这学校我仍然什么也没学得，生字也没认识多少，可是我倒学会了爬树。几个人一下课就在校后山边各自拣选一株合抱大梧桐树，看谁先爬到顶。我从这方面便认识约30种树木的名称。因为爬树有时跌下或扭伤了脚，刺破了手，就跟同学去采药，又认识了十来种草药。我开始学会了钓鱼，总是上半天学钓半天鱼。我学会了采笋子，采蕨菜。后山上到春天各处是野兰花，各处是可以充饥解渴的刺莓，在竹篁（huáng）^①里且有无数雀鸟，我便跟他们认识了许多雀鸟，且认识许多果树。去后山约一里左右，又有一个制瓷器的大窑，我们便常常到那里去看人制造一切瓷器，看一块白泥在各样手续下如何就变成为一个饭碗，或一件别种用具的生产过程。

学校环境使我们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上多十倍。但在学校也学会了一件事，



^① 竹篁，竹林。

便是各人用刀在座位板下镌雕自己的名字。又因为学校有做手工的白泥，我们就用白泥摹塑教员的肖像，且各为取一怪名：“绵羊”“耗子”“老土地菩萨”，还有更古怪的称呼。总之随心所欲。在这些事情上我的成绩照例比学校功课好一点，但自然不能得到任何奖励。学校已禁止体罚，可是记过、罚站还在执行。

照情形看来，我已不必逃学，但学校既不严格，四个教员恰恰又有我两个表哥在内，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时，我便请假。看戏请假，钓鱼请假，甚至于几个人到三里外田坪中去看人割禾、捉蚱蜢也向老师请假。

那时我家中每年还可收取租谷 300 石左右，三个叔父两个姑母占两份，我家占一份。到秋收时，我便同叔父或其他年长亲戚，往 20 里外的乡下去，督促佃户和临时雇来的工人割禾。等到田中成熟禾穗已空，新谷装满白木浅缘方桶时，便把新谷倾倒到大晒谷簟（diàn）^①上来，与佃户平分，其一半应归佃户所有的，由他们去处置，我们把我家应得那一半，雇人押运回家。在那里最有趣处是可以辨别各种禾苗，认识各种害虫，学习捕捉蚱蜢分别蚱蜢。同时学用鸡笼去罩捕水田中的肥大鲤鱼鲫鱼，把鱼捉来即用黄泥包好塞到热灰里去煨熟分吃。又向佃户家讨小小斗鸡，且认识种类，准备带回家来抱到街上去寻找别人公雏作战。又从农家小孩学习抽稻草心织小篓小篮，剥桐木皮作卷筒哨子，用小竹子作唢呐。有时捉得一个刺猬，有时打死一条大蛇，又有时还可跟叔父让佃户带到山中去，把雉媒^②抛出去，吹唿哨招引野雉，鸟枪里装上一把黑色土药和散碎铁砂，猎取这华丽骄傲的禽鸟。

为了打猎，秋末冬初我们还常常去佃户家。看他们下围，跟着他们乱跑。我最欢喜的是猎取野猪同黄麂。有一次还被他们捆缚在一株大树高枝上，看他们把受惊的黄麂从树下追赶过去。我又看过猎狐，眼看着一对狡猾野兽在一株大树根下转，到后这东西便变成了我叔父的马褂。

学校既然不必按时上课，其余的时间我们还得想出几件事情来消磨，到下午 3 点才能放学。几个人爬上城去，坐在大铜炮上看城外风光，一面拾些石头奋力向河中掷去，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就是到操场一角沙地上去拿顶^③翻筋头，每个人轮流来做这件事，不溜剧^④的便仿照技术班办法，在那人腰身上缚一条带子，两个人各拉一端，翻筋头时用力一抬，日子一多，便无人不会翻筋头了。

因为学校有几个乡下来的同学，身体壮大异常，便有人想出好主意，提议要这些乡下孩子装成马匹，让较小的同学跨到马背上去，同另一匹马上另一员勇将来作战，在上面扭成一团，直到跌下地后为止。这些做马匹的同学，总照例非常忠厚可靠，在任何情形下皆不卸责。作战总有受伤的，不拘^⑤谁人头面有时流血了，就抓一把黄土，将伤口敷上，全不在乎。我常常设计把这些人马调度得十分如法，他们服从我的编排，比一匹真马还驯服规矩。

放学时天气若还早一些，几个人不是上城去坐坐，就常常沿了城墙走去。有时节出城

① 晒谷簟，摊晒粮食所用的竹席。

② 雉媒，为猎人所驯养用以诱捕野雉的雉。

③ 拿顶，又称“拿大顶”，一种技巧运动，双手撑在地上或物体上，头朝下，两足向上竖起。

④ 溜剧，方言词，做某事比较熟练。

⑤ 不拘，不论、不管。

去看看，有谁的柴船无人照料，看明白了这只船的的确确无人时，几人就匆忙跳上了船，很快地向河中心划去。等一会儿那船主人来时，若在岸上和和气气地说：

“兄弟，兄弟，快把船划回来。我得回家！”

遇到这种和平讲道理人时，我们也总得十分和气把船划回来，各自跳上了岸，让人家上船回家。若那人性格暴躁点儿，一见自己小船给一群胡闹的小将送到河中打着圈儿转，心中十分忿怒，大声地喊骂，说出许多恐吓无理的野话，那我们便一面回骂着，一面快快地把船向下游流去，尽他叫骂也不管他。到下游时几个人上了岸，就让这船搁在河滩上不再理会了。有时刚上船坐定，即刻便被船主人赶来，那就得担当一分惊险了，船主照例知道我们受不了什么簸荡，抢上船头，把身体故意向左右连续倾侧不已，因此小船就在水面胡乱颠簸，一个无经验的孩子担心会掉到水中去，必惊骇得大哭不已。但有了经验的人呢，你估计一下，先看看是不是逃得上岸，若已无可逃避，那就好好地坐在船中，尽那乡下人的磨练，让一身衣服给水湿透。你不慌不忙，只稳稳地坐在船中，不必作声告饶，也不必恶声相骂，过一会儿那乡下人看看你胆量不小，知道用这方法吓不了你，他就会让你明白他的行为不过是一种不带恶意的玩笑，这玩笑到时应当结束了，必把手叉上腰边，向你微笑，抱歉似的微笑：

“少爷，够了，请你上岸！”

于是几个人便上岸了。有时不凑巧，我们也会为人用小桨竹篙一路追着打我们，还一路骂我们。只要逃走远一点点，用什么话骂来，我们照例也就用什么话骂回去，追来时我们又很快地跑去。

那河里有鳜(guì)鱼，有鲫鱼，有小鲇鱼，钓鱼的人多向上游一点儿走去。隔河是一片苗人的菜园，不涨水，从跳石上过河，到菜园里去看花、买菜心吃的次数也很多。河滩上各处晒满了白布同青菜，每天还有许多妇人背了竹笼来洗衣，用木棒杵在流水中捶打，訇(hōng)訇的从北城墙脚下应出回声。

天热时，到下午4点以后，满河中都是赤光光的身体。有些军人好事爱玩，还把小孩子、战马、看家的狗，同一群鸭雏，全部都带到河中来。有些人父子数人同来，大家皆在激流清水中游泳。不会游泳的便把裤子泡湿，扎紧了裤管，向空中急急地一兜，捕捉了满满的一裤空气，再用带子捆好，便成了极合用的“水马^①”。有了这东西，即或全不会漂浮的人，也能很勇敢地向水深处泅去。到这种人多的地方，照例不会出事故被水淹死的，一出了什么事，大家皆很勇敢地救人。

我们洗澡可常常到上游一点儿去，那里人既很少，水又极深，对我们才算合式。这件事自然得瞒着家中人。家中照例总为我担忧，唯恐一不小心就会为水淹死。每天下午既无法禁止我出去玩，又知道下午我不会到米厂上去同人赌骰(tóu)子，那位对于拘管我侦察我十分负责的大哥，照例一到饭后我出门不久，他也总得到城外河边一趟。人多时不能从人丛中发现我，就沿河去注意我的衣服，在每一堆衣服上来一分注意，一见到了我的衣服，一句话不说，就拿起来走去，远远地坐到大路上，等候我要穿衣时来同他会面。衣裤既然在他手上，我不能不见他了，到后只好走上岸来，从他手上把衣服取到手，两人沉沉



^① 水马，一种轻快的船，多供竞渡之用。

默默地回家。回去不必说什么，只准备一顿打。可是经过两次教训后，我即或仍然在河中洗澡，也就不至于再被家中人发现了。我可以搬些石头把衣压着，只要一看到他从城门洞边大路走来时，必有人告诉我，我就快快的泅到河中去，向天仰卧，把全身泡在水中，只露出一张脸一个鼻孔来，尽岸上哪一个搜索也不会得到什么结果。有些人常常同我在一处，哥哥认得他们，看到了他们时，就唤他们：

“熊澧（lǐ）南，印鉴远，你见我兄弟老二吗？”

那些同学便故意大声答着：

“我们不知道，你不看看衣服吗？”

“你们不正是成天在一堆胡闹吗？”

“是呀，可是现在谁知道他在哪一片天底下。”

“他不在河里吗？”

“你不看看衣服吗？不数数我们的人数吗？”

这好人便各处望望，果然不见到我的衣裤，相信我那朋友的答复不是谎话，于是站在河边欣赏了一阵河中景致，又弯下腰拾起两个放光的贝壳，用他那双常若含泪发愁的艺术家眼睛赏鉴了一下，或坐下来取出速写簿，随意画两张河景的素描，口上嘘嘘打着唿哨，又向原来那条路上走去了。等他走去以后，我们便来模仿我这个可怜的哥哥，互相重复着前后那种答问。“熊澧南，印鉴远，看见我兄弟吗？”“不知道，不知道，你自己不看看这里一共有多少衣服吗？”“你们成天在一堆！”“是呀！成天在一堆，可是谁知道他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于是互相浇起水来，直到另一个逃走方能完事。

有时这好人明知道我在河中，当时虽无法擒捉，回头却常常隐藏在城门边，坐在卖荞粑的苗妇人小茅棚里，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等到我十分高兴地从大路上同几个朋友走近身时，他便风快地同一只公猫一样，从那小棚中跃出，一把攫住了我衣领。于是同行的朋友就大嚷大笑，伴送我到家门口，才自行散去。不过这种事也只有三两次，从经验上既知道这一着棋时，我进城时便常常故意慢一阵，有时且绕了极远的东门回去。

我人既长大了些，权利自然也多些了，在生活方面我的权利便是，即或家中明知我下河洗了澡，只要不是当面被捉，家中可不能用爬搔皮肤方法决定我应否受罚了。同时我的游泳自然也进步多了。我记得，我能在河中来去泅过三次，至于那个名叫熊澧南的，却大约能泅过五次。

下河的事若在平常日子，多半是3点晚饭以后才去。如遇星期日，则常常几人先一天就邀好，过河上游一点儿棺材潭的地方去，泡一个整天，泅一阵水又摸一会儿鱼，把鱼从水中石底捉得，就用枯枝在河滩上烧来当点心。有时那一天正当附近十里长宁哨苗乡场集^①，就空了两只手跑到那地方去玩一个半天。到了场上后，过卖牛处看看他们讨论价钱盟神发誓的样子，又过卖猪处看看那些大猪小猪，查看它，把后脚提起时必锐声呼喊。又到赌场上去看那些乡下人一只手抖抖地下注，替别人担一阵心。又到卖山货处去，用手摸摸那些豹子老虎的皮毛，且听听他们谈到猎取这野物的种种危险经历。又到卖鸡处去，欣赏欣赏那些大鸡小鸡，我们皆知道什么鸡战斗时厉害、什么鸡生蛋极多。我们且各自把

^① 场集，即农村定期买卖货物的市场，到“场集”买东西称为“赶场”。

那些斗鸡毛色记下来，因为这些鸡照例当天全将为城中来的兵士和商人买去，五天以后就会在城中斗鸡场出现。我们间或还可在敞坪中看苗人决斗，用扁担或双刀互相拼命。小河边到了场期，照例来了无数小船和竹筏，竹筏上且常常有长眉秀目脸儿极白奶头高肿的青年苗族女人，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口笑，使人看来十分舒服。我们来回走二三十里路，各个人两只手既是空空的，因此在场上什么也不能吃。间或谁一个人身上有一两枚铜元，就到卖狗肉摊边去割一块狗肉，蘸些盐水，平均分来吃吃。或者无意中谁一个在人丛中碰着了一位亲长，被问道：“吃过点心吗？”大家正饿着，互相望了会儿，羞羞怯怯地一笑。那人知道情形了，便说：“这成吗？不喝一杯还算赶场吗？”到后自然就被拉到狗肉摊边去，切一斤两斤肥狗肉，分割成几大块，各人来那么一块，蘸了盐水往嘴上送。

机会不巧不曾碰到这么一个慷慨的亲戚，我们也依然不会瘪了肚皮回家。沿路有无数人家的桃树李树，果实在把树枝压得弯弯的，等待我们去为它们减除一份负担。还有多少黄泥田里，红萝卜大得如小猪头，没有我们去吃它，赞美它，便始终委屈在那深土里！除此以外，路塍(chéng)上无处不是莓类同野生樱桃，大道旁无处不是甜滋滋的地枇杷，无处不可得到充饥果腹的山果野莓。口渴时无处不可以随意低下头去喝水。至于茶油树上长的茶莓，则长年四季都可以随意采吃，不犯任何忌讳。即或任何东西没得吃，我们还是依然十分高兴。就为的是乡场中那一派空气，一阵声音，一分颜色，以及在每一处每一项生意人身上发出那一股不同臭味，就够使我们觉得满意！我们用各样官能吃了那么多东西，即使不再用口来吃喝，也很够了。

到场上去我们还可以看各样水碾水碓(duì)^①，并各种形式的水车。我们必得经过好几个榨油坊，远远地就可以听到油坊中打油人唱歌的声音。一过油坊时便跑进去，看看那些堆积如山的桐子^②，经过些什么手续才能出油。我们只要稍稍绕一点儿路，还可以从一个造纸工作场过身，在那里可以看他们利用水力捣碎稻草同竹篾(xiǎo)^③，用细篾帘子舀取纸浆作纸。我们又必须从一些造船的河滩上过身，有万千机会看到那些造船工匠在太阳下安置一只小船的龙骨^④，或把粗麻头同桐油石灰嵌进缝罅(xià)里修补旧船。

总而言之，这样玩一次，就只一次，也似乎比读半年书还有益处。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地方尽我拣选一种，直到如今我还觉得不必看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色香俱备内容充实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

保 靖

目的地到达后^⑤，我住在一个做书记的表弟那里。无事可做等事做，照本地话说名为

^① 碓，舂米用具，用柱子架起一根木杠，杠的一端装一块圆形的石头，用脚连续踏另一端，石头就连续起落，去掉下面石臼中的糙米的皮。

^② 桐子，油桐的种子，可榨油。

^③ 篾，小竹子。

^④ 龙骨，指船的像脊椎和肋骨一样起支撑和承重作用的结构。

^⑤ 目的地指的是辰州。沈从文在民五时进入预备兵的技术班训练，后以补充兵的名义进入军队，跟随部队到怀化驻防。后来，又离开怀化到了常德，一直无所事事，接着跟随一只押运棉服的帆船到辰州去。



“打流”。这名词在吃饭时就见出了意义。每天早晚应吃饭时，便赶忙跑到各位老同事、老同学处去，不管地方，不问情由，一有吃饭机会总不放过。这些人有做书记的，每月大约可得5块到10块钱。有做副官的，每月大约可得12块到18块钱。还有做传达的，数目比书记更少。可是在这种小小数目上，人人却能尽职办事，从不觉得有何委屈，也仍然在日光下笑骂吃喝，仍然是有热有光地打发每一个日子。职员中肯读书的，还常常拿了书到春天太阳下去读书。预备将来考军官学校的，每天大清早还起来到卫队营去做操。一般高级军官，生活皆十分拮据，吃粗粝的饭，过简陋的日子，然而极有朝气，全不与我三年前所见的军队相像。一切都得那个精力旺盛的统领官以身作则，擘(bò)画^①一切，调度一切，使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这统领便是先一时的靖国联军一军司令，直到现在，还依然在湘西抱残守缺，与一万余年轻军人同过那种甘苦与共的日子。

当时我的熟人虽多，地位都很卑下，想找工作却全不能靠谁说一句话。我记得那时我只希望有谁替我说一句话，到那个军人身边去做一个护兵。且想即或不能做这人的护兵，就做别的官佐护兵也成。因此常常从这个老朋友处借来一件干净军服，从另一个朋友又借了一条皮带，从第三个又借了双鞋子，大家且替我装扮起来，把我打扮得像一个有教育懂规矩的兵士后，方由我那表弟带我往军法处、参谋处、秘书处以及其他地方拜会那些高级办事员。先在门边站着，让表弟进去呈报。到后听说要我进去了，一走进去时就霍地立一个正，做着各样询问的答复，再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只记着“等等看，我们想法”，就出来了。可是当时竟毫无结果，都说可以想法，但谁也不给一个切实的办法。照我想来，其所以失败的原因，大体还是一则做护兵的多用小苗人和乡下人，做事吃重点，用亲戚属中子侄，做事可靠点儿；二则他们都认识我爸爸，不好意思让我来为他们当差。我既无办法可想，又不能亲自去见见那位统领官，一坐下来便将近半年。

这半年中使我亲亲切切感到几个朋友永远不忘的友谊，也使我好好地领会了一个人当他在失业时萎悴无聊的心情。但从另外一方面说来，我却学了不少知识。凭一种无挂无碍到处为生的感情，接近了自然的秘密。我爬上一个山，傍近一条河，躺到那无人处去默想，漫无涯涘去作梦，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生活虽然那么糟，性情却依旧那么强。有一次因个小小问题，与那表弟吵了几句，半夜里不高兴再在他床上睡觉了，一时又无处可去，就走到一个养马的空屋里，爬到有干草同干马粪香味的空马槽里睡了一夜。到第二天去拿那小包袱告辞时，两人却又讲了和，笑着揉到地上扭打了一阵。但我那表弟却更有趣味。在另外一个夜里，与一个同事说到一件小事，互相争持不下时，就向那人说：“你不服吗，我两人出去打一架看看！”那人便老老实实同他披了衣服出去，到黑暗无人的菜园里，扭打了一阵，践踏坏了一大堆白菜，各人滚了一身泥，鼻青脸肿悄悄回到住处，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上饭桌时，才为人从脸目间认出夜里情形来，互相便坦白地大笑，同时也就照常成为好朋友了。这一群年轻人，大致都那么勇敢直爽，十分可爱。但十余年来，却有大半早从军官学校出身做了小军官，在历次小小内战上死去腐烂了。

^① 擘画，筹划、布置。

当时我既住到那书记处，几月以来所有书记原本虽不相识，到后也自然都熟透了。他们忙时我便为他们帮帮忙，写点儿不重要的训令和告示，一面算帮他们的忙，一面也算我自己玩。有一次正在写一件信札，为一个参谋处姓熊的高级参谋见到，问我是什么名义。我以为应分受责备了，心里发慌，轻轻地怯怯地说：“我没有名义，我是在这里玩的。帮他们忙写这个文件！”到后那书记官却为我说了一句公道话，告诉那参谋，说我帮了他们很多的忙。问清楚了姓名，因此把我名单开上去，当天我就做了四块钱一月的司书。我做了司书，每天必到参谋处写字，事做完时就回到表弟处吃饭睡觉。

事情一有了着落，我很迅速地便在司书中成为一个突出的书记了。不久就加薪到六元。我比他们字写得实在好些。抄写文件时上面有错误处，我能纠正那点儿笔误。款式不合有可斟酌处，我也看得出说得出。我的几个字使我得到了较优越的地位，因此更努力写字。机会既只许可我这个人在这方面费去大部分时间同精力，我也并不放下这点儿机会。我得临帖，我那时也就觉得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王羲之。我常常看报，原只注意有正书局的广告，把一点点薪水聚集下来，谨谨慎慎藏到袜统里或鞋底里，汗衣也不作兴有两件，但五个月内我却居然买了17块钱的字帖。

一分惠而不费的赞美，带着点儿幽默微笑：“老弟，你字真龙飞凤舞，这公文你不写谁也就写不了！”就因为这类话语，常常可以从过足了烟瘾的文书主任那瘪瘪口中听到，我于是当着众人业已熄灯上床时，还常常在一盏煤油灯下，很细心地用《曹娥碑》^① 字体誊录一角公文或一份报告。

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八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不明白什么叫作疲倦。这份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做书记的习惯和命运。

我不久因工作能力比同事强，被调到参谋处服务了。

书记处所在地方，据说是彭姓土司^②一个妃子所住的花楼。就搬去住的参谋处房间，梁架还是年前从一个梁姓苗王处抬来的。笨大的材头，笨大的柱子，使人一见就保留一种稀奇印象。四个书记每天有训令命令抄写时，就伏在白木做成的方桌上抄写，不问早晚多少，以写完为止。文件太多了一点儿，照例还可调取其他部分的书记来帮忙。有时不必调请，照例他们也会赶来很高兴地帮忙。把公事办完时，若那天正是10号左右发饷的日子，各人按照薪水多少不等，各领得每月中三分之一的薪饷，同事朋友必各自派出一份钱，亲自去买狗肉来炖。或由任何人做东，上街去吃面。若各人身边都空空的，恰恰天气又很好，就各自手上拿一木棒，爬上后山顶上去玩，或往附近一土坡上去玩。那后山高约一里，并无什么正路，从险峻处爬到顶上时，却可以看到许多地方。我们也就只是看那么一看，不管如何困难总得爬上去。土坡附近常常有号兵在那里吹号，四周埋葬了许多小坟。每天差不多总有一起小棺材，或蒲包裹好的小小尸首，送到这地方来埋葬。当埋葬时，远近便已蹲了无数野狗同小狼，埋人的一走，这坟至多到晚上，就被这群畜生扒开，小尸首



^① 《曹娥碑》，碑帖名，又名《孝女曹娥碑》，汉元嘉元年（151）立，明人传为王羲之书。小楷，二十七行，结字扁平，用笔多不藏锋，有隶书笔意。

^② 土司，元、明、清各朝中央政府授给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官职。

便被吃掉了。这地方狼的数量不知道为什么竟那么多，既那么多为什么又不捕捉，这理由不易明白。我们每次到那小坡上去，总得带一大棒，就为的是恐怕被狼袭击，有木棒可以自卫。这畜生大白天见人时也并不逃跑，只静静地坐在坟头上望着你，眼睛光光的，牙齿白白的，你不惹它它也不惹你。等待你想用石头抛过去时，它却在石头近身以前，曳着个长尾飞奔跑了。

这地方每当月晦阴雨的夜间，就可听到远远近近的狼嗥，声音好像伏在地面上，水似的各处流动，低而长，忧郁而悲伤。间或还可听到后山的虎叫，“昂”的一声，谷中回音可延长许久。有时后山虎豹夜里来人家猪圈中盗取小猪，从小猪锐声叫喊情形里，还可分分明明知道这山中野兽从何处回山，经过何处。大家都已在床铺上听惯了这种声音，也不吃惊，也不出奇。可是由于虎狼太多，虽窗下就有哨兵岗位，但各人皆担心当真会有一天从窗口跃进一只老虎或一只豺狼，我们因此每夜总小心翼翼把格子门窗关好。这办法也并非毫无好处，有一次果然就有两只狼来爬窗子，两个背靠背放哨的兵士，深夜里又不敢开枪，用刺刀拟^①定这畜生时，据说两只狼还从从容容大模大样地从中门并排走去。

我的事情既不是每天都很多很多，因此遇无事可做时，几个人也常常出去玩。街上除了看洋袜子、白毛巾、为军士用的服装，和价值两元一枚的玩具镀金表，别的就没有什么可引起我们注意的了。逢三八赶场，在三八两天方有杂货百物买卖。因此，我们最多勾留的地方，还是那个河边。河边有一个码头，长年湾泊 50 号左右小木船。上面一点儿是个税局，扯起一面大大的写有红黑扁字桐油油过的幡旗。有一只方头平底渡船，每天把那些欢喜玩耍的人打发过河去，把马夫打发过河去，把跑差的兵士打发过河去，又装载了不少从永顺来的商人及由附近村子里来做小买卖的人从对河撑回。那河极美丽，渡船也美丽。

我们有时为了看一个山洞，寻一种药草，甚至于赌一口气，也常常走十里八里，到隔河大岭上跑个半天。对河那个大岭无所不有，也因为那山岭，把一条河显得更加美丽了。

我们虽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做事，却生活得十分健康。有时即或胡闹，把所有点点钱完全花到一些最可笑事情方面去，生活也仍然是健康的。我们不大关心钱的用处，为的是我们正在生活，有许多生活，本来只需我们用身心去接近，去经验，却不必用一笔钱或一本书来做居间介绍。

但大家就是那么各人守住在自己一份生活上，甘心尽日月把各人拖到坟墓里去吗？可并不这样。我们各人都知道行将有一个机会要来的，机会来时我们会改造自己变更自己的，会尽我们的一分气力去好好做一个人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

一个转机

调进报馆后^②，我同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房子里。房中只有一个窗口，门小小的。

① 拟，指向、比画。

② 沈从文所在的部队筹备了个定期刊物，设立了一个报馆，沈从文被临时调进去做校对。

隔壁是两架手摇平板印刷机，终日叽叽格格大声响着。

这印刷工人倒是个有趣味的人物。脸庞眼睛全是圆的，身个儿长长的，具有一点儿青年挺拔的气度。虽只是个工人，却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之先，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了个进步工人。他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削了几块白木板子，用钉子钉到墙上去，就把这些古怪东西放在上面。我从司令部搬来的字帖同诗集，却把它们放到方桌上。我们同在一个房里睡觉，同在一盏灯下做事，他看他新书时，我就看我的旧书。他把印刷纸稿拿去同几个别的工人排好印出样张时，我就好好地来校对。到后自然而然我们就熟悉了。我们一熟悉，我那好向人发问的乡巴佬脾气，有机会时，必不放过那点儿机会。我问那本封面上有一个打赤膊人像的书是什么，他告了我是《改造》^①以后，我又问他那《超人》^②是什么东西，我还记得他那时的样子，脸庞同眼睛皆圆圆的，简直同一匹猫儿一样：“唉，佢俐，怎么个末朽？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吗？”“我只知道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新的呢？”“我知道随园女弟子。”“再新一点儿？”我把头摇摇，不说话了。我看他那神气，我觉得有点儿害羞，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我可就知道了，因为我顺从他的指点，看了这本书中一篇小说。看完后我说：“这个我知道了。你那报纸是什么报纸？是老《申报》吗？”于是他一句话不说，又把刚清理好的一卷《创造周报》^③推到我面前来，意思好像只要我一看就会明白似的，若不看，他纵说也说不明白。看了一会，我记着了几个人的名字。又知道白话文与文言文不同的地方，其一落脚用“也”字同“焉”字，其一落脚却用“呀”字同“啊”字；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少越好，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多越好。我自己明白了这点区别以后，又去问那印刷工人，他告我的大体也差不多。当时他似乎对于我有点儿觉得好笑。在他眼中，我真如长沙话所谓有点儿“朽”。

不过他似乎也很寂寞，需要有人谈天，并且向这个人表现表现思想。就告我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思想，觉得十分忸怩。若猜得着 10 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的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没有思想”时，我即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当时似乎也就不必怎样惭愧了。

这印刷工人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反复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最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④，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⑤

^① 《改造》，中国现代著名时政刊物，由张东荪于 1919 年创刊，原名《解放与改造》。

^② 《超人》，冰心的一部短篇小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 12 卷 4 号。

^③ 《创造周报》，现代综合性刊物，1923 年创刊，终刊于 1924 年，共出 52 号，由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

^④ 《花间集》，晚唐五代词选集，10 卷，收录唐末五代词 500 首，编者为赵崇祚。

^⑤ 《新潮》，“五四”文学革命初期重要的文学刊物，1919 年 1 月开始出版，1922 年 3 月停刊。以“文艺复兴”相号召，刊登了许多鼓吹文学革命的论文、小说、诗歌等白话文作品。



《改造》了。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悉。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

我常常看到报纸上普通新闻栏说的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等记载，便想，自己读书既毫无机会，捐款兴学倒必须做到。有一次得了 10 天的薪饷就全部买了邮票，封进一个信封里，另外又写了一张信笺，说明自己捐款兴学的意思。末尾署名“隐名兵士”，悄悄把信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去，请求转交“工读团”。做过这件事情后，心中有说不出的秘密愉快。

那时皮工厂、帽工厂、被服厂、修械厂组织就绪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规模的标准出品。师范讲习所第一班已将近毕业，中学校、女学校、模范学校，全已在极有条理情形中上课。我一面在校对职务上做我的事情，一面向那印刷工人问些下面的情形，一面就常常到各处去欣赏那些我从见到过的东西。修械处的长大车床与各种大小轮轴，被一条在空中的皮带拖着飞跃活动，从我眼中看来实在是一种壮观。其他各个工厂亦无不触目惊人。还有学校，那些从各处派来的青年学生，在一般年轻教师指导下，在无事无物不新的情形中，那份活动实在使我十分羡慕。我无事情可做时，总常常去看他们上课，看他们打球。学生中有些原来和我在小学时节一堆玩过闹过的，把我请到他们宿舍去，看看他们那样过日子，我便有点儿难受。我能聊以自解的只一件事，就是我正在为国家服务，却已把服务所得，做了一次捐资兴学的伟大事业。

本军既多了一些税收，乡长会议复决定了发行钞票的议案，金融集中到本市，因此本地顿呈现空前的繁荣。为了乡自治的决议案，各县皆摊款筹办各种学校，同时造就师资，又决定了派送学生出省或本省学习的办法。凡学棉业、蚕桑、机械、师范，以及其他适于建设的学生，在相当考试下，皆可由公家补助外出就学。若愿入本省军官学校，人既在本部任职，只要有意思前去，即可临时改委一少尉衔送去。我想想，我也得学一样切实的技能，好来为本军服务。可是我应当学什么能够学什么，完全不知道。

因为部中的文件缮写，需要我处似乎比报纸较多，我不久又被调了回去，仍然做我的书记。过了不久，一场热病袭到了身上，在高热糊涂中任何食物不入口，头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摊地流。我支持了 40 天。感谢一切过去的生活，造就我这个结实的体魄，没有被这场大病把生命取去。但危险期刚过不久，平时结实得同一只猛虎一样的老同学陆弢，为了同一个朋友争口气，泅过宽约一里的河中，却在小小疏忽中被洄流卷下淹死了。第四天后把他尸体从水面拖起，我去收拾他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对自己发生了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我知道见到的实

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闷闷沉沉地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地想了四天。到后得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儿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儿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儿？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去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做别的打算了。

当我把这点意见，这样打算，怯怯地同我上司说及时，感谢他，尽我拿了三个月的薪水以外，还给了我一种鼓励。临走时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我于是就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27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份勇气，离开了我那个学校，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19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儿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很可笑地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入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1932年8月在青岛作

思考与探究

1. 作者所谓的“那一本大书”指的是什么？联系他的创作生涯及有关作品（如《边城》《湘西散记》），说说这本“大书”对他人生的意义。

2. 品味下列语句，体会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对人生的思考。

(1)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2) 我们虽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做事，却生活得十分健康。有时即或胡闹，把所有点点钱完全花到一些最可笑事情方面去，生活也仍然是健康的。我们不大关心钱的用处，为的是我们正在生活，有许多生活，本来只需我们用身心去接近，去经验，却不必用一笔钱或一本书来做居间介绍。

(3) 我们各人都知道行将有一个机会要来的，机会来时我们会改造自己变更自己的，会尽我们的一分气力去好好做一个人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



(4)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

3. 这篇自传在回忆往事时，有时是很概括地叙述生活的过程，有时又有很细致的生活细节描写。试从课文中找出一些例子，体会这种写法的特色与好处。

有关资料

1. 相关传记

《沈从文传》，凌宇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 关于作者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城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开始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文学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第七课

杨振宁



合璧中西科学文化的骄子*

——吴学东等



工作中的杨振宁

- ◆ 我沉重地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我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共同产物。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自豪，一方面将工作奉献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 ◆ 创新比诺贝尔奖更重要。

阅读提示

1957年12月，杨振宁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授奖仪式上，杨振宁作了充满激情的演讲。演讲结尾说到：他在科学上的成功，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他为自己的中国血统以及中国文化的背景而自豪。他认为，近代以来饱受凌辱的中国人正在丢掉自卑感，必将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大显身手。这种对父母之邦的热忱让人动容。

的确，从这篇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杨振宁的成功得益于中西科学文化的“合璧”，也得益于他献身科学的精神。杨振宁始终认为科学研究离不开文化底蕴，从事科学的研究者的见识、胆略、态度以及鉴赏力、洞察力，都和文化涵养有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杨振宁在许多场合都告诫青年朋友，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根”。杨振宁提醒我们，中国和西方的教育和文化有许多不同，各有千秋，要注意扬长避短，融合中西文化，发挥自己的潜能。杨振宁宝贵的教学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这篇作品属于人物小传，用不多的篇幅就大致描画出传主的生平事业轮廓，叙述中常常插入评论，对传主事迹的梳理总是扣紧基本的评价指向。报刊上常常能看到这种“压缩型”的传记。该传记选自《预约成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生涯》一书（吴学东、梁国钊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957年12月，在象征着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坛上，第一次写下了两位中国人的名字——杨振宁和李政道。亿万炎黄子孙为自己的同胞在世界科学圣殿上做出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在颁奖仪式上，杨振宁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演讲词的最后一段话是：“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事实，我沉重地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我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共同产物。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自豪，一方面将工作奉献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为什么杨振宁如此明确地说明他是中西方文化的共同产物？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究竟怎样孕育了这位中国出身的科学家？

家学渊源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诞生于安徽合肥，他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大。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黑暗，军阀混战，国破民贫，百姓颠沛流离。幸运的是，杨振宁出身于一个以读书立业为价值取向的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学养，使他得以健康成长。

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杨振宁10个月大的时候，他考取省官费负笈（jí）^①美国，历时五年，获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于1928年归国。归国后，先后执教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学校。

杨武之先生是一个学养深厚，为人光明磊落，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人。他的一生，就是不畏艰苦、努力读书、正直做人的一生。他9岁丧母，12岁丧父，寄于亲戚篱下，阅尽人间冷暖，从而发奋读书，坚持不与纨绔（wánkù）子弟和不求上进者为伍。他常以此告诫和教育他的孩子。他还经常给孩子们讲中国历史，讲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让孩子们了解和热爱自己的祖国；他本人颇具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也常让孩子们诵读优秀的中国古典诗词名曲，令他们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中国大地发生战乱而孩子们无法坚持到学校学习的情况下，他会亲任家庭教师，从一切可能之处借阅画报书籍，督促孩子们读书学习。家里的客厅时常挂着一块黑板，那是父亲和孩子们讨论难题，传授知识的工具。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主张凡教育者，首要处就是要知人，认识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短处，充分发挥学生的长处，克制短处，才有成大器的可能；他还主张教师除了教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也应教学生思想方法、学习方法、品德和道德修养。毫无疑问，他的这些教育思想将首先对自己的儿女实施。杨振宁的母亲是一个意志坚强、贤惠、克勤克俭的妇女，为了一家七口人的冷暖温饱，她日夜操劳，凡事亲力亲为，把一个家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也颇有见识，反复嘱咐儿女奋斗万不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杨振宁从小就成为聪颖好学、品行端正、奋发向上、兴趣广泛的孩子。尽管由于父亲工作的变换、战乱的影响，杨振宁的中小学转换了好几所学校，但他一直是学校里的佼佼者。

小时候的杨振宁就有远大志向。有一次，父亲给他讲历史、数学、诺贝尔奖，他认真地对爸爸说：“我长大了也要争取得诺贝尔奖。”父亲慈祥地笑了：“好好学吧！”父亲欣喜地看到孩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智慧超群，见识过人，热情而有毅力，他从心底里盼望儿子能成为一块好料，一个有出息的人！

中学时代，杨振宁的数学学得非常好。父亲是研究数论^②和群论^③的数学家，他便从父亲那里接触了群论初阶。他常常被父亲书架上一本群论书中美丽的插图所迷住，引发了许多遐想。这一切对他日后醉心于物理世界对称性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一种潜在的启蒙作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合并办学，称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科学教育中心。

清华大学南迁，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父亲也随校南迁。杨振宁跟随父母辗转跋涉，先回合肥三个月，然后又取道汉口、广州、香港、越南的海防和河内、云南的河口，最后到达昆明。在父亲的鼓励下，只读过高中二年级课程的杨振宁，以同等学力参加了大学统一招

^① 负笈，指游学在外。笈，书箱。

^② 数论，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整数性质以及和它有关的规律。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属于数论的范畴。

^③ 群论，研究群的性质的理论，是抽象代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群是数学中重要的概念之一，指的是只具有一个运算的抽象代数结构。



生考试。在全国两万名考生中，他以榜上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西南联大录取。

奠定基业的西南联大

杨振宁报考西南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因为他没有读过高中物理。但是，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更有兴趣，于是转入了物理系。

杨振宁转换专业是很有根据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时间虽只过去了四十多年，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人类几千年认识的总和。令人激动万分的新发现、新理论，环环相扣，继往开来，未有穷尽。1895年，伦琴关于X射线的发现，揭开了现代物理发现的序幕；1896年，贝可勒尔发现了放射性；1897年汤姆生发现了电子；1900年普朗克提出了量子论；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11年卢瑟福通过著名的 α 粒子散射实验，建立了原子结构的太阳系模型……30年代前后，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有了迅猛发展。1929年，狄拉克^①提出了空穴理论，预见了正电子的存在；1934年费米^②提出了 β 衰变理论；1934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当杨振宁正准备上西南联大学习之际，世界科坛正在为开创核能时代而进行着最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核裂变即将发现。正是这些在经典物理中难以想象的重大科学成果，使杨振宁把目光和兴趣转向了物理。

这一转，转出了他一生的辉煌。

由于战争，西南联大的生活条件和教学条件非常差。教室屋顶是铁皮做的，窗户是用纸糊的，地面用土填平夯(hāng)实，大家都风趣地把这种教室称为“冬冷夏暖”屋。每当下雨，雨点在铁皮上敲得叮当乱响，无法讲课。实验设备更是少得可怜，大部分仪器因长途跋涉难以搬运，仍留在北京、天津，较贵重的仪器往往要放在大口径空油桶里，不用时放于地下掩体，以避敌机轰炸。上实验课时，老师只能把仅有的仪器放在讲台上，或挂在墙上，让大家看，然后由教师做示范实验，讲解实验的方法、步骤。学生几乎没有条件自己动手做实验。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空袭警报一响，同学们就要蜂拥而出，到野外或防空洞躲避。敌机遁去，再三三两两回到教室来。日常用的笔记本、作业本都是未经漂白的粗纸所订，厚薄不均，很容易破。

更严重的是书籍奇缺，所订杂志往往一两年以后才能收到。为了向图书馆借一本参考书，要很早去排队，而且多半还借不到。不少学生一旦借到了书，就常常过期不还。尽管学校做出规定，凡过期不还者要受行政处分，但仍有许多学生宁愿受处分也不按期还书，结果布告栏上为此贴上了许多处分通告。

教授的生活、工作条件也非常艰苦。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38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共赴国难，他在回忆中写道：

“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

^① 狄拉克(1902—1984)，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由于对量子力学的贡献，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② 费米(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对原子能的利用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芯；为了节省点儿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扬之清，而高则未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读书，苦心钻研。”

条件如此艰苦，能否吃饱饭都是个问题。教授们常饿着肚子给学生们讲课，下课了还要去设法为自己和家人弄点儿糊口的食品。菜蔬奇缺，营养不良，学生们也常吃不饱，某些有经验的同学，开饭时，第一碗装半碗，狼吞虎咽吃掉，赶紧去盛第二碗，才能勉强吃个半饱，去晚了，就没饭了。

杨振宁曾回忆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漫长的浩劫，与中国悠久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降临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头上的是难以名状的灾难……1940年9月30日，我家在昆明租赁的房屋正中日本轰炸机投下的一枚炸弹。我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儿家当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全家人都已躲在防空洞里，免于遭难。几天之后，我带着一把铁锹回去，挖出了几本压歪了的但仍可用的书本，欣喜若狂。今天已很难了解在那种困苦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

然而，极端恶劣的条件并没有压倒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他们仍以饱满的学习热情和上下一致的爱国精神，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三所著名大学的一批教授聚集在一所学校教书，西南联大可谓名家云集，高手荟萃。他们学识渊博，专业精深，思想活跃，治学严谨，是一个在中国科学史、教育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教育集团。他们在艰难竭蹶中认真教课，敬于业务，使教学质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知识精英，成为日后国家的栋梁之材。

西南联大保持着清华大学把国文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的传统，杨振宁的国文本来不错，经过名教授的培养熏陶，更使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教过杨振宁国文课的教授，很多位都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散文家朱自清教授，诗人、学者闻一多教授，语言学家罗常培、王力教授等。

西南联大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教授的专长，打破了传统的由一位教授开一门课的教学法，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位教授只讲一两周课。这样，尽管初看起来似乎缺少系统性，但由于每位教授都讲授他本人最精彩、最拿手的部分，因而非常吸引学生，使学生受益匪浅。

数学是理论物理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受到了极为严格的数学基础训练，历年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在西南联大里，不仅有像杨武之、姜立夫、江泽涵等中年数学家，还拥有一批像陈省身、华罗庚那样的青年数学家。当时，华罗庚刚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在堆垒素数论的研究上声名卓著。专长几何，在矢量丛连络论研究领域已很有造诣的陈省身教授，也刚从德国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归来，他不仅与杨武之有师生之谊，而且与杨振宁又是师生关系，感情十分深厚。

物理系的教师队伍更是群星灿烂。叶企孙、吴有训、饶毓(yù)泰、赵忠尧、任之恭、王竹溪、吴大猷(yóu)、马仕俊、周培源等，都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界的风云人物。杨振宁十分幸运，大学一年级由赵忠尧教授讲授普通物理课程。赵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末便在美国进行了硬 γ 射线的吸收和散射实验，是最早接触到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没过程的实

验物理学家。二年级则由吴有训教授讲授电磁学，周培源教授讲授力学。吴有训 1928 年起就先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与杨振宁的父亲同为芝加哥大学学生，又同为清华大学同事，杨振宁从小就认识这位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也是大家熟悉的著名学者。三年级时则由张文裕教授讲授原子物理学。张教授的原子物理研究工作居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是近代著名核物理大师卢瑟福的门生。量子力学课由王竹溪教授讲授。用当时这门课程的标准看，王竹溪教授的讲义取材十分新颖，内容十分丰富，讲解十分深透，与国外名牌大学的名教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几年后，杨振宁到了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上量子力学课时，发现所讲授的内容他早跟王竹溪先生学过，而且学得更深入，因此常常充当助教的角色。西南联大教学水平之高，杨振宁基础之扎实，可见一斑。

西南联大的老师中，对杨振宁影响最大的是吴大猷、王竹溪两位先生。杨振宁大学毕业之前，需要写一篇学士学位论文，他请吴大猷先生做论文导师。其时，吴大猷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专长于原子分子理论及实验光谱研究，对当时原子、分子光谱学的前沿问题非常清楚。他便要求杨振宁用群论的方法把分子光谱的有关问题理出个头绪。杨振宁在写这篇论文时，对吴大猷刚翻译的一本 E. Wigner 著的《群论与其在原子光谱的应用》进行了潜心钻研。加上杨振宁的父亲就是专于群论的专家，杨振宁自学了他父亲留美的老师狄克逊写的《近代代数理论》。在那本书里，狄克逊用十分明晰简洁的语言把群论的“表示理论”讲得非常透彻。杨振宁从中进一步感受到了群论无与伦比的美妙，启发了他在物理学中深入地应用群论。就这样，杨振宁接触了群论以及对称性概念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为他以后在对称性原理的研究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杨振宁回忆说，当年吴大猷教授“对我发生很大影响”，“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以写这篇论文为契机，激发了杨振宁对研究物理学中对称问题的兴趣，导致日后取得“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的研究发现（为此获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奖）和建立“杨振宁-米尔斯规范场论”这两个方面的辉煌成就。

大学毕业后，杨振宁进了西南联大研究院，师从王竹溪教授研究统计力学。王竹溪教授在西南联大开过统计物理、热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理论力学等多门课程。他每涉猎一个新领域，就总是要整理成很厚且又很工整的笔记。他的许多著名的统计物理学著作、热力学著作、和他人合著的特殊函数著作，都是根据他的笔记进一步加工发展完成的。在西南联大和后来的清华大学，历代学生相传着一条重要的经验：谁要想学习理论物理，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借阅王竹溪先生的笔记，以至他的各门课的笔记，都为他的历代弟子所“必读”。

王竹溪教授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工作刻苦，功底极深。杨振宁当时正是在蓬勃发展、有着广阔应用前景的统计物理的召唤下，在王竹溪教授的治学风范吸引下，请王竹溪教授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的。王竹溪教授把杨振宁带进物理学这一引人入胜的领域，从此，统计力学一直是杨振宁最感兴趣的物理学分支之一。他后来在尹辛模型、相变理论等统计物理学问题方面的出色工作，其渊源正在于此。因此，杨振宁始终没有忘记这两位先生的指引。他说：“在王（竹溪）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硕士）论文，是

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 40 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西南联大的生活，不但为杨振宁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而且他还形成了自己的物理学结构感和好恶感。他开始思考物理学理论的总体结构以及同这种结构相联系的美，也开始接触和考虑对称性在物理学中的基本作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他试着用全局的观点来审视各种物理学理论，开始孕育把已有的理论从一个局部的领域推广出去的念头。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很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的工作及风格。杨振宁对爱因斯坦推崇备至，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认为，爱因斯坦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是与牛顿齐名的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巨人之一。他用两个字来评论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那就是“深”与“广”。

他喜欢狄拉克的特殊风格，认为狄拉克对问题的物理本质的认识常常能够一语中的。他觉得狄拉克研究物理学时，每一步都有他自己的特殊逻辑。虽然他的逻辑跟别人的不一样，但却非常富有吸引力。只要你跟他走一步，你就感到非跟他走到底不可，最后，总是忽然得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好像是一种“神来之笔”。杨振宁觉得，跟着狄拉克一步步往前走不啻 (chì) 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

至于费米，杨振宁认为他是物理学史上最后一位既从事理论研究，又做实验工作，而且在这两方面都有第一流贡献的伟大物理学家。费米对什么是物理，什么不是物理，有一个很清晰的价值观念。杨振宁承认自己受费米的影响非常之大。最重要的一点是，费米使他了解，物理不是形式化的东西。

总之，杨振宁认为，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都具有把一个物理概念，一个理论结构或一个物理现象的本质提炼出来的本领，并且都能够正确地把握住其精髓。

他后来说：“在每一个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好恶，加上他的能力、脾性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了他的贡献。乍听起来，一个人的好恶和风格竟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物理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理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对另一些特点的憎恶，正是形成他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好恶和风格之于科学的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这是一段隽永而饱含真知灼见的话。

每当回忆起西南联大的岁月，杨振宁都倾注了深情。他此生在物理学上的见识、眼界、胆略、鉴赏能力和基本态度，都是年轻时在中国获得的。参天的大树，离不开根本。杨振宁物理学的茁壮根系，在西南联大这片沃土往深里钻，往广处长，为大树的繁茂，汲取着丰富的营养。

万里寻名师



1945 年 8 月下旬，杨振宁动身赴美国留学。

在此之前，西南联大中的原国立清华大学于 1943 年成立考试委员会，拟继续以“庚

款”选送少部分公费生赴美国留学。1944年第六届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22人中，“物理学”为杨振宁。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学生暂时还不能启程，杨振宁遂到联大附中教书，以待行期。当时中美之间没有商船和航线往来。当行期终于到来时，这批留学生只能先乘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等候美国的运兵船。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亟待从亚洲返回美国。每条运兵船只能空余一二百个床位让非美国军人搭乘。杨振宁这批留学生在加尔各答等候了两个半月后，终于坐上了船。船舱极为拥挤，中国学生们住在船最下面的“统舱”里。不足三米高的统舱，居然搭了四层铺，只能睡，不能坐。历尽艰辛，他们终于在1945年11月底到达纽约。杨振宁上岸无暇观光市容，用两天时间买了西服、大衣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旋即辗转投师。

投拜什么样的名师，投拜哪一位名师，杨振宁曾考虑过很长时间。他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形成的对物理学的好恶感，也根据他在联大时所了解到的世界物理学前沿的状况，他认定爱因斯坦、狄拉克、费米三位物理大师是他要追随的名师。但在当时，爱因斯坦年事已高，他不便麻烦、打扰他，狄拉克又不在美国，于是杨振宁认定要追随费米教授。

然而，他的万里寻师并不顺利。他到达美国后，立即去费米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寻找费米，不料费米当时正从事绝密的原子弹研究，哥伦比亚大学无人能告诉他费米的去向。他又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找威格纳教授，而威格纳教授正巧要休假一年，不开课。杨振宁抱着失望的心情到原定的普林斯顿大学报到，但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打听费米的踪迹，渴望师从费米的念头始终没有改变。

很幸运的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遇到了张文裕教授。张教授此时正应邀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核物理研究和教学工作。当杨振宁将自己的心事告诉张教授，张教授即向他透露，费米教授不久就要到芝加哥大学主持一项研究，并在那里任教。得到张教授的指点，杨振宁决定到芝加哥大学去寻师。经过又一次长途跋涉，杨振宁终于在芝加哥大学明亮的教室里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费米教授。费了一番周折，他终于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杨振宁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是理论的源泉。他知道西南联大的实验条件太简陋，因此他最初希望能够在费米指导下弥补自己的缺陷，写一篇实验论文。但当时费米还没有完全结束战时秘密的研究工作，对像杨振宁这样初到美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不能参与此事的，因此，费米介绍杨振宁到艾里逊实验室去工作。于是，杨振宁从1946年秋天开始，便开始了在艾里逊实验室的学习。当时，艾里逊实验室正在建造一套40万电子伏特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

费米还建议杨振宁跟泰勒教授做一些理论方面的研究。

杨振宁第一次去见泰勒时，刚一见面，泰勒就提议道：“我们散散步去吧。”走着走着，泰勒突然发问，问杨振宁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这是量子力学中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对基础扎实的杨振宁来说，这个问题易如反掌，因为在西南联大已经学过量子力学，所以一下子就答出来了。泰勒听完马上说：“好吧，你通过了，我接受你为研究生。”照泰勒看来，许多人都学得很好，却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只有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才是可以造就的。经过这种别开生面的口试，杨振宁就成了泰勒的研究生。而泰勒何以成为杨振宁的正式论文导师，却还有另一层原因。

泰勒对杨振宁影响很大，帮助良多。在泰勒的指导下，不出一个月，杨振宁就取得了第一个研究成果。泰勒要杨振宁就这个研究成果作一个专题报告，听众中有费米、泰勒、迈耶夫妇等著名物理学家。他们对杨振宁的报告很满意，泰勒也感到很高兴。泰勒对群论在原子、分子物理学方面的应用有一种敏锐的直觉了解，而杨振宁对物理学的对称性、对群论的应用等有着特殊的爱好。通过泰勒的指导和自学，杨振宁学到了更多的群论知识及它们在物理学上的应用。1948年，杨振宁在泰勒指导下写成了《核反应》一文，该文用群论这个工具解释为何在计算各种角关联时，常常发生令人惊异的各项抵消的情形。

但是，杨振宁在艾里逊实验室前后20个月的工作，却并不很成功。这倒不完全是杨振宁的过错，给杨振宁的课题本来就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杨振宁惊愕地发现，在实验技巧方面，他缺乏其他同学那种解决实际问题的近乎本能的直觉——一种他戏称为神秘莫测的第六知觉。实验仪器出了故障，别的同学很快就能找到原因修好，甚至踢一脚就解决问题，杨振宁则束手无策，到处涂抹肥皂泡也找不出原因，修不好。同学们见到杨振宁做实验时手忙脚乱的窘相，往往善意地开他的玩笑，其中一个最有名的玩笑是：“凡有爆炸的地方，就一定有杨振宁。”这个玩笑甚至把艾里逊教授也给逗乐了。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杨振宁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杨振宁小时候用泥巴做了一只鸡，而在他的爹妈看来却像一节藕，为了鼓励他，还要加以赞赏。

有一天，泰勒来到实验室，关切地询问杨振宁的工作情况，看到杨振宁愁眉苦脸，心里便明白了一半。泰勒教授以他对杨振宁才能和特长的了解，建议他说：“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经写了理论论文，而你在理论上是擅长的，我建议你就写一篇理论论文作为毕业论文，我可以做你的导师。”

杨振宁此时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十分失望，一方面也觉得力不从心。也许是该正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了。经过两天的考虑，他决定放弃写实验论文而转向理论论文。

由于这一抉择，杨振宁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他的朋友开玩笑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但转过来说，这个抉择又何尝不是理论物理学的大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些与生俱来，我们称之为天赋，有些能力经后天培养获得；有些天赋自然而然显现，有些则藏而不露。老师的职责在于授业和解惑。能够启发学生扬长避短，因材施教的老师，是好老师；能够帮助学生发挥潜能，就更是很好很好的老师了。我们十分佩服泰勒独具慧眼，能清楚看到杨振宁做理论研究有很高的天赋，在关键时刻引导学生走上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在泰勒教授的推荐下，杨振宁以那篇《核反应》论文申报博士学位，获得通过。

至于一代宗师费米，杨振宁通过耳濡目染，也深受其影响。费米对杨振宁最重要的影响，是他那种善于抓住物理现象本质的风格。他讲起课来，总是那么通俗易懂，推理简洁明快，解释单刀直入，击中要害。这除了他精心准备、反复推敲外，主要在于他的风格是直觉明快的，不是形式化的，不搞烦琐教学。

费米对杨振宁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要有广泛的兴趣，扎实的基础。杨振宁看到，长期以来，费米在物理学的各个不同领域——从纯理论物理到纯实验物理，从三体问题的最佳坐标这样的简单问题，到深奥的广义相对论，都怀有广泛的兴趣。作为一个物理大师，他



不仅涉猎各个领域，而且始终做着详尽的笔记。由于兴趣广泛，深入钻研，根基扎实，所以费米触类旁通的创造性火花经常迸射出来。这是他能首创用慢中子做实验，首先成功领导核裂变链式反应，在原子弹爆炸时用碎纸片受冲击波抛撒的距离测量爆炸量，以至在多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的又一原因。这使杨振宁懂得了，物理就像万丈高楼要从平地起；要善于创造，就应爱好广泛，知识广博；要善于概括综合，必须重视基础，尊重事实……

费米坦荡诚恳、竭诚奉献的精神，给杨振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上课，费米每周总要抽出一两个晚上与几位研究生做不定题的讲演。只要学生提出问题，他就很快翻动他的笔记本，而后给大家讲解，引导大家注重问题的本质和应用，掌握直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杨振宁在这种“小灶”中受益匪浅。在几年时间里，他看到费米几乎把所有的午餐时间都奉献给了研究生，与研究生们进行各种题材的午餐谈话……

在费米结束原子弹研究，完全回到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得到费米更多的言传身教。费米很器重这位聪明而有志气的中国青年。他们师生情投意合，经常在一起探讨新理论。1949年春天，费米因有事离开芝加哥，就把他讲授核物理课的任务交给了杨振宁。临行前，费米把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交给了他，并和他一起把要讲的内容和推导作了详细解释。杨振宁看到费米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过去每堂课的准备细节，深深为费米这种认真、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所感动。

1949年，费米与杨振宁共同写了一篇文章《介子是基本粒子吗？》，为以后著名的坂田模型奠定了基础。

费米生前也曾高度称赞杨振宁：“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够结识他，深以为荣。若说他是我的学生，诚愧不敢当。当我们在一块儿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确能举一反三的科学家。在普林斯顿近代物理研究院的许多专家中，我最赏识杨振宁博士那种不怕难，在解决问题时那种坚定持重和沉静的态度。这乃是从事科学的研究的青年人应该学习的。”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两年半的求学生活，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度过的。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实验室，同时又贪婪地从泰勒、费米那里汲取理论的营养，并在泰勒的具体指导下做出很多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可以想象，这需要过人的毅力与努力。两年半的时间，他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由于受到当时芝加哥大学热烈的研究气氛的感染，他认识到了一些最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

杨振宁好比一棵树，在西南联大扎下了根，在芝加哥大学长出了繁茂的枝叶。

成功之路初探

杨振宁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应校方聘请，留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当了一年教员。1949年，他到了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的研究，一干就是17年。在这里，他创造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科学成就。主要有：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共同发表了被称为“杨振宁-米尔斯规范场论”的非阿尔贝规范场的理论，被世界物理学家们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结构之一（许多人曾建议要给杨振宁第二次诺贝尔奖）。1956年，杨振



宁和李政道一起，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次年经吴健雄教授的实验证实。他们两人由此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后，杨振宁还在统计物理学的伊辛模型、相变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串串光辉夺目的科学成就。杨振宁完全可以称为当今健在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作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科学家，人们都关注着他成功的原因。在这方面，确实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究。

抓住机遇，追随名师。杨振宁自己曾这样感慨过：“我回想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和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这是杨振宁平实而谦虚的总结。

的确，杨振宁家学渊源，他是幸运的；就读西南联大阶段，虽遇国难当头，但因此接受了中国许多最著名学者的授业解惑。这些教授时至今日都还是中国科学界、知识界的风流人物。名教授所站位置在巅峰之上，也就给杨振宁带来了高起点。他一生的研究内容、研究风格和作风始终没有偏离他在西南联大时所形成和确立的方向，是王竹溪、吴大猷、张文裕这些名教授领着他奠定物理学发展的基础的。当他赴美留学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不在美国，因此，各国大量的科学家流向美国。像费米、泰勒等都是在本国受到迫害而离开自己的国家的。他们在美国得到了重视和发展，费米成为原子弹的开山祖，泰勒则被称为“氢弹之父”。杨振宁直接在这些誉满全球的大师的麾下，周围又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共同学习，确是幸运之至。

中国有句古话：“名师出高徒。”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也这样说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秘诀之一就是有名师的指点。”它说明一个年轻人初踏上科学征途时，得到名师指点的重要性。据统计，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中，有师徒关系的获奖者比例占40%以上，跟前辈诺贝尔奖获得者学习过的比其他人获奖时间提前了七年。

名师之所以能对高徒起指点作用，就在于名师的指导可以使年轻人在攀登科学高峰时缩短路程。因为名师是站在科学发展最前沿，他们能随时了解变化着的科学的新形势并能掌握研究的新方向。同时名师能及时地掌握该学科领域中新的情报信息，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对相邻的学科关系也看得清楚。

然而，杨振宁并非简单地面对机遇，从杨振宁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看到他孜孜不倦、奋力追求的历程。杨振宁以高二同等学力报考西南联大获得成功，报读硕士研究生、报考留美博士生顺利通过，这都包含了他平时的勤奋、刻苦及对学习的付出。杨振宁刚到美国，连费米的面也见不着，但他矢志不渝，以拜费米为师为既定目的。他“踏破铁鞋”去寻找，终于如愿以偿，跻身于名师门下，饱受学界泰斗的熏陶。对一般人来说，能去到美国，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名牌大学学习，也该心满意足了；何况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相通，亲人全都远在万里之外，要实现追随名师的目标，又该遭遇多大困难。但是，“机遇只垂青于那些不断追求它的人”。杨振宁没有等候，他不懈地争取、努力。这种事例在杨振宁的一生中是屡见不鲜的。因此，良好的机遇和环境，好的老师，杨振宁都靠

自己去把握，去争取。与其说杨振宁碰上了好机遇，不如说杨振宁争取和抓住了好机遇。抓住机遇，追随名师，这才是杨振宁成为幸运儿的重要原因。

扬长避短。杨振宁走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之路，并不是他的初衷。他赴美时念念不忘中国的实验物理基础太薄弱，想要在这方面多学一点儿，以报效祖国。事实上，他的特长并不在实验室。在艾尔逊实验室的近两年里，他的动手能力捉襟见肘，暴露了他这方面的不足，被同事们传为笑谈。在泰勒教授的指引下，他才开始反思自己，正确评价自己，正确把握自己。时至今日，杨振宁对那段历史性的转折仍不能忘怀。当时那种决定使他如释重负，其实是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再没有心理上的负重感。这表明，大凡立志成才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奋斗历程中如何正确把握自己，确实极为重要。一个被大家关注的学科，一个被炒得火热的课题，实际上并不一定就有自己的优势。把握自己正是把握未来，未来也许就在自己手中。

一次在中国科技大学讲学时，杨振宁这样谈到这个转折：“我在实验物理方面不如人家，但是在学习理论物理方面因为基础好，读得也比较好。到学校两年之后，我写了两篇理论文章。泰勒教授就找我谈，让我去搞理论研究，把文章作为学位论文。当时，我对老师要我放弃实验物理非常失望。过了两天，我考虑了自己的具体条件，感到自己确实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实验物理学家，因此思想搞通了，就高高兴兴地请泰勒教授当我的导师，专心从事理论研究。两个月以后，我就得到了博士学位。我讲这段经历的意思是：选择专业的决心，应该随着自己的了解而变动。如果当时我不离开实验物理，那么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收获！”

中西合璧。杨振宁还这样总结他获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汲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他从他的切身体会中，从他对中西方教育体制、培养人才的方式的观察和反思中，总结了中西方的不同点。

从教学方法看，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让学生啃大量的书本，做大量的习题，学生学习很刻苦，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方法。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孩子，基础训练显然不如中国扎实，学生的知识体系也漏洞百出，正确和谬误纠缠在一起。但教师鼓励学生提问，鼓励学生大胆怀疑，学生们也热衷于讨论和辩论，在讨论和辩论中迅速剔除自己知识体系中的谬误，从而得到长足的进步。这是一种跳跃式的学习方法。

从研究方法看，中国教育的研究方法比较注重演绎法，即从一般到个别的研究方法。从物理学来说，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到达美国后，杨振宁从费米、泰勒等导师处，又学到了另一种研究方法，这就是归纳法，即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方法。从物理学来说，是从物理现象引导出数学表示的方法。杨振宁还特别体会到，研究问题从物理现象、物理事实出发，能使物理研究不至于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不至于陷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潭，易使物理研究充满朝气蓬勃的活力。

许多年后，杨振宁回忆这些经历时说：“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刚才已提到过方法了：归纳法。方向呢？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我接触到

思考与探究

- 这篇小传没有铺开描写传主事迹，而是围绕一条主线选择材料，结构非常紧凑。阅读课文，说说这条主线是什么，文章选择了哪些材料来表现这一点。
- 这篇传记中说，“杨振宁好比一棵树，在西南联大扎下了根，在芝加哥大学长出了繁茂的枝叶”。从文化融合以及青年人的文化修养等角度，思考并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 杨振宁学习和科学的研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你觉得对自己最有启发的有哪些？

有关资料

1. 相关传记

《杨振宁传》，徐胜蓝、孟东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关于人物小传

人物小传一般篇幅较短，往往只能从传主一生中选取几个重要的段落，特别是那些最能体现传主人格精神的事迹，通过这些闪光的“点”来勾画出传主的生平事业轮廓。也常常穿插一些能抓住人物性格、心理特征的“特写镜头”，用简洁的文字，做生动的描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教领航®

我们与收入本书的作品（包括照片、画作）的作者进行了广泛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但仍有部分作者未能联系上。烦请作者与我们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权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电话：(010) 58758861 58758863

如反映教材内容问题，请与责编联系。

电话：(010) 58758619

电子邮箱：jcfk@pep.com.cn

